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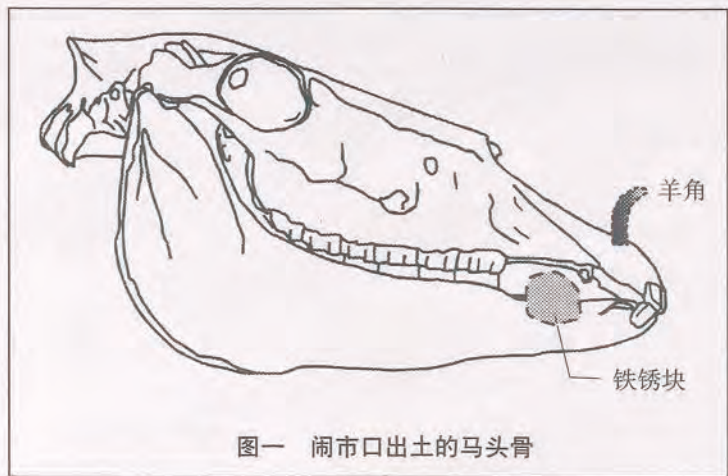


- 编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
关于文物保护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 加强展陈经费的管理 促进两个效益的发挥
- 试论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分类分级管理
- 北京碑帖收藏概述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2002·1

西城区闹市口出土的马头遗骨



今年是马年，在北京的历史上曾有过以马著称的时期，北京的地下常常出土马的遗骨，甚至有马陪葬或祭祀的现象，在琉璃河西周墓地和大葆台汉燕王墓中都有车马坑出土。本文所介绍的是辽代墓地中出土的一具用来随葬或祭祀的马头骨，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俗。

1998年开工的西城区闹市口道路扩展工程，为我们调查当地古河道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跟随工程进行古河道调查时，发现大量历史遗迹。不但有多条人工河道，而且有战国时期的瓮棺葬、唐辽金时期的砖室墓群、不同时代的陶井和砖井，以及金代的砖券下水道遗迹和道路遗迹等。其中最使人感兴趣的，则是一具完整的马头骨，以及它的附属物。

马头出土地点位于闹市口路北口西侧，西长安街南侧。当地地表以下4米为金元以来的渣土堆积，4-9米为细砂层，砂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含有汉代陶片，包括夔云母灰陶博山盖、瓦当残片、绳纹瓦片等。该砂层被唐代和辽代墓葬所打破，说明它是汉代或汉唐之际的大水所形成。该砂层在部分地段的下切深度达到地表以下8米，有明显的交错层理。下砂层富含粘土颗粒、具有交错层理，不含文化遗物，是早期的河道沉积物。9-11米为粘土质粉砂，11米以下是晚更新世的砂砾石层。

马头埋在上砂层中，距地表深度约5米余。头北向，摆放端正，头骨保存完整。据北京大学考古系黄蕴萍教授鉴定，该马为公马，第三门齿已全部长出，马龄在4岁左右。同时出土的骨头包括马的舌骨、蹄骨和尾骨，以及一对山羊角。出土时，马

嘴两边各有一块锈蚀严重的铁疙瘩。汉史游《急就篇》卷三云：“镮即马轡之衔也，……或曰镮者，衔两旁之铁，今之排沫是也。”可知铁疙瘩应是马镮的遗迹，马头下葬时应是带着生前的装配的。在马头后面摆放着马的蹄骨和尾骨，蹄骨包括了前蹄骨和后蹄骨，它们按照其原有的顺序摆放在一起。可知马在下葬时并没有被整体埋葬，而是砍下了马头、马蹄和马尾，以此来代表整匹马。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头前端两侧各有一个小羊角，直立于鼻的两旁，角略有弯曲，角尖朝前上方。古代曾有在马镮处安放动物角的习俗，但此羊角并不在镮处，而是在鼻孔两翼，且羊角上没有穿孔，有可能是马头前部的一种装饰物，以显示马的威猛(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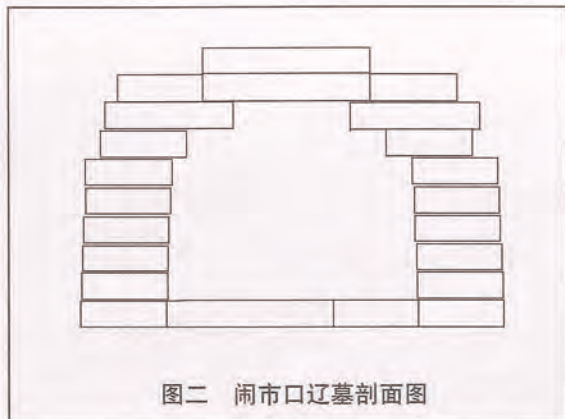
在马头骨的西北边和西边相距约5-15米的地方各出土一座砖墓，墓的埋深与马头相仿，墓向西北，墓坑打破了砂层。墓为单砖平砌，内宽45厘米，外宽77厘米，高约70厘米，残存长度约1.4米。墓底铺砖，上部内收，顶用双层砖封盖(图二)，墓内有人骨。当时墓葬已被民工掏空，一端被挖掉，据民工反映墓中出土有铜镜一面。墓砖青灰色，有的呈褐色，长33.5厘米，宽16厘米，厚5.5厘米，砖的一面有条纹，与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出土的墓砖相同。在马头的东边还出土有

唐代砖的砌物和用砖做成的类似排水道的遗迹,惜发现时已被施工单位破坏,无法知其形制。从上述状况可以推测,这里是一处辽代的墓地,马头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坐骑,宰杀后将有代表性的部位埋在墓前用于随葬或祭祀。这种马头的葬法使我们联想到北京地区时常出土的一种明清时期的埋藏物,即在用砖围成的圆形小穴中,将灯碗、犁头、砚台或砖码成人面或马头的形状,它可能是代替真马的一种方法,两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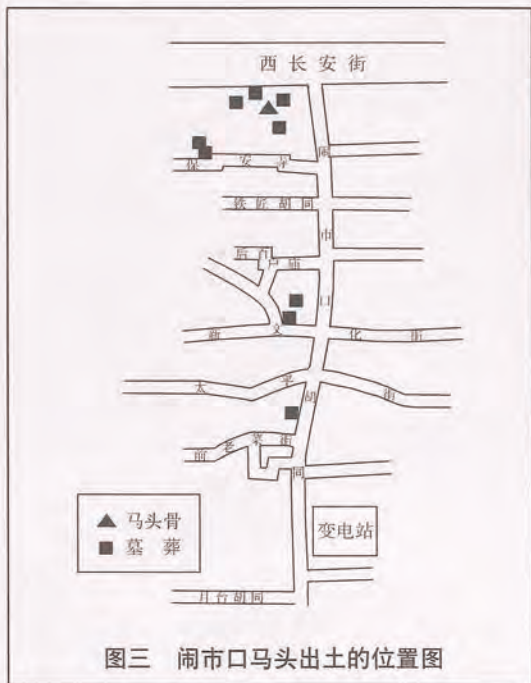
马头骨墓地旁临金中都崇智门外的大道,这条大道就是今天的闹市口胡同和赵登禹路。赵登禹路的一段大道在元代成为向大内引水的金水河河道,这条道路至今仍可见出古道的形态。一般认为,金中都在扩建时只扩建了东、南、西三面城墙,北面的城墙仍是利用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北城墙的旧址,崇智门也是对辽拱辰门的继承,因此这条大道也是辽南京城拱辰门外的大道。根据50年代末的金中都勘察图和此次调查的结果可知,金代崇智门位于老菜街处。调查中发现,这里的城市堆积物最薄,生土更接近地面,应是城墙所在的地方。由此向北生土地势渐低,在太平街胡同下为金中都及辽南京城的北护城河,该胡同地势低洼,在与闹市口胡同相交处有一个向北的弯曲,体现出城门外护城河的形态(图三)。

从施工中显示的地层剖面看,老菜胡同南,以不同时期的城市堆积为主,大量的水井、建筑和下水道遗迹,以及城市道路遗迹等。例如位于闹市口南段路东的变电站工地,在2千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陶井及砖井等不同类型的水井约17口(图四)。闹市口路西的月台胡同北侧,出土有由金代条纹砖砌成的下水道遗迹,下水道筑于排水沟中,挖出部分残长8米,砖墙,砖衬底,内有灰色淤泥。下水道东侧有道路遗迹。在老菜胡同以南还出土有建筑物遗迹,有辽代铺地砖和唐辽时期的水井。在老菜胡同北数米处出土一口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灰细绳纹陶瓮棺,两瓮相合,内有残骨,发现时仅剩半边,悬于施工现场的土壁之上。在新文化街以北至西长安街之间,出土物以唐辽时期的墓葬为多。在新文化街北出土汉代陶罐多只及唐代砖室墓一座,墓室早年已残,工程中仅露出了墓室东壁,有拣瓷片者从墓室中掏出一些唐代的陶器碎片。闹市口胡同北部,除了上面述及的辽代墓葬外,在它的西面,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工地靠近闹市口胡同的一侧,也出土过多处辽代砖砌墓室和水井,内中出土有大安六年(1090年)款“十二缘”铭文砖,“崇宁重宝”钱币和铜镜等(已上报文物部门收回),此距马头出土处仅数十米。上述现象说明,在闹市口胡同中段和北段的西侧,自汉代至辽代曾是幽州城北的墓葬区,在这片墓区的北部有辽代的墓葬群,埋葬马头的墓地是其组成部分。到了金中都时期,闹市口胡同南北都已成为城市区域,其南部为城区,北部为关厢,有着分布广泛的金代地层,在城市街区的扩展下,墓葬逐渐远离城门,闹市口一带已不再有墓葬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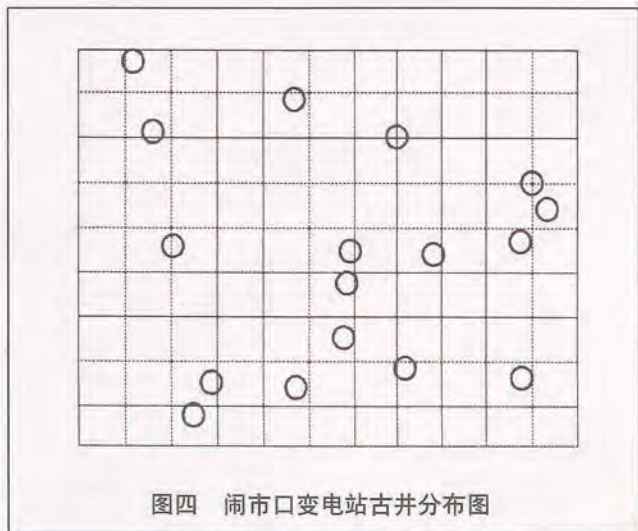
(文、图:岳升阳)



图二 闹市口辽墓剖面图



图三 闹市口马头出土的位置图



图四 闹市口变电站古井分布图

广安大街将建成中国近现代史迹街

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位于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清末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谭嗣同曾住在此院五间西房的北套间内,自题“莽苍苍斋”;里院北屋是维新志士开会之所。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此被捕后,于菜市口就义。



广安大街是北京内城南部的一条重要东西向交通主干道,沿街及周边地区地上、地下文物遗存非常丰富,分布着许多重要的文物古迹,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

该区域现存的部分文物古迹如康有为故居、谭嗣同故居、梁启超故居、陕学会(杨深秀故居)、蜀学会(杨锐故居)、滇学会、粤东新馆(保国会旧址)、杨椒山祠(公车上书的出发地)、京报馆(邵飘萍故居)等,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保护好这些文物古迹并对外开放,开辟新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将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对教育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百年前所受的压迫和苦难,学习近现代革命志士救亡图存的爱国行为、变法图强的献身精神,及生生不息、死而后已的思想,激励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进取,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但这些文物古迹,因历史原因现状保护情况很差,大部分是居民杂院,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火险隐患严重。进一步保护利用,必须将文物腾退与环境整治相结合,逐步改善文物及周边环境。

在“两广大街”开工伊始,为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有关部门就曾规划调整建设方案,以尽可能的保护广安大街周围的文物古迹。为进一步挖掘文物内涵,促进南城的文化发展,更好地建设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市规划委、市文物局及宣武区、崇文区的有关部门于2001年两度召开协调会,计划将广安大街建成中国近现代史迹街。目前,市政府已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编制保护利用规划,将史迹街的规划范围确定为北到前门西大街、南到南横西街、东到广渠门、西到广安门,经调研后再提出需保护整治的文物名单和方案。



京报馆：在魏染胡同30号和32号。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于宣武门外珠巢街创办《京报》。“五·四”运动时，因执行“必须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宗旨，遭到查封。1920年复刊于今址，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在此被捕就义。1928年其夫人汤修慧女士又复刊《京报》，直到1936年停刊。汤女士居于后面住宅一直到1986年3月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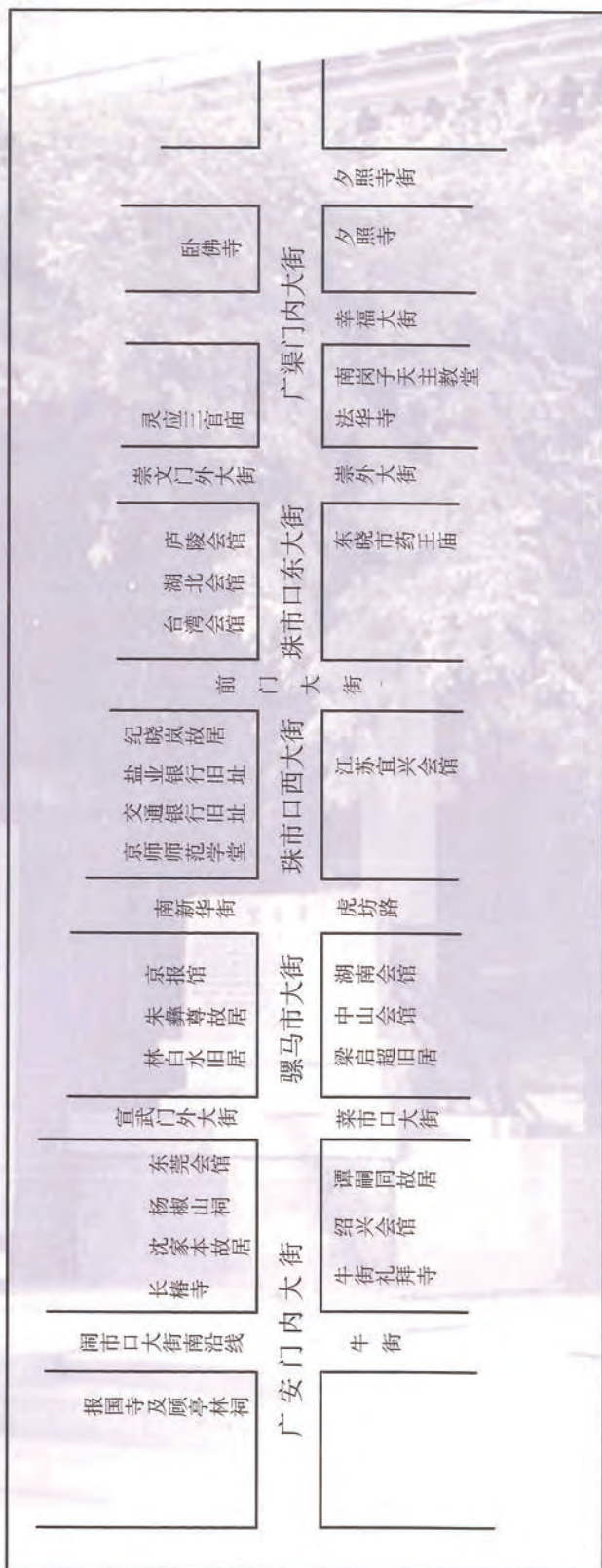


绍兴会馆：位于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亦名山会会馆，鲁迅先生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曾居住于此，先后住过“藤花馆”和“补树书屋”，写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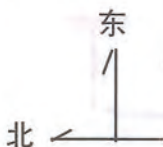


纪晓岚故居：在珠市口西大街241号，为一座两进四合院，现存书房“阅微草堂”，及当年旧物前院藤萝与后院海棠。

广安大街沿线 重要文物古迹



梁启超旧居: 位于宣武区粉房琉璃街113号。1898年,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成为维新派领袖前后, 曾居住于此。



(图、文: 李树丛)

北京文博

樣
初
題

目 录

(2002 年第 1 期)(总第二十七期)

文物工作

编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关于文物保护的

几个问题的思考 孔繁峙(5)

加强展陈经费的管理 促进两个效益的发挥 舒小峰(13)

北京市文物监管物品市场现状调查报告 傅公钺(17)

博物馆学

试论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分类分级管理 李学军(21)

大慧寺——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的建设构想 王晓军(27)

文物研究

北京碑帖收藏概述 张 展(32)

北京地区织绣艺术 赵秀珍(41)

北京史地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周氏藏拓整理记 叶 芷(48)

金门闸与清代永定河水患治理 杨亦武(57)

独具特色的禁采煤碑	刘义全(65)
北京东岳庙香会综述	陈巴黎(71)
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	刘之光(78)

文物保护

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关键柱”保护报告	王 丹 卢迎红 董玉刚(80)
在北京文物建筑保护工程中应重视传统工艺和恢复传统规制	王效青(90)
析传统材料在文物建筑修缮中的使用	付卫东(93)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01 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李树丛(96)
-------------------------------	---------

封面:清·乾隆 青花蒜头瓶

封底:清代 白玉龙带钩

封二、彩插一:西城区闹市口出土的马头遗骨

彩插二、三、四:广安大街将建成中国近现代史迹街

封三:延庆明代摩崖造像重现天日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白 副 主 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刘超英 张 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赵其昌 侯 明 晋宏逵 徐 伟 徐 明 高凯军 舒小峰
韩 永 韩 扬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铎

主 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张 岩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1, 2002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 Reflections on Some Relics Protection Problems in Making *The Protection Plan for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of Beijing* by Kong Fanzhi(5)
-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Exhibitions Budget for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al Benefits
..... by Shu Xiaofeng(13)
-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Market for Cultural Relics Under State Supervision in Beijing ...
..... by Fu Gongyue(17)

MUSEOLOGY

-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and Levels of Museums in Beijing by Li Xuejun(21)
- Designs for Building the Museum of Ancient Sculptural Art at Dahui Temple
..... by Wang Xiaojun(27)

GEM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SERIES

-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Collection of Tablet Rubbings in Beijing by Zhang Zhan(32)
- The Art of Knitting and Embroidery in Beijing by Zhao Xiuzhen(41)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Classification of the Rubbings Collected by Zhou Zhaoxiang Preserved in Beijing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by Ye Zhi(48)
- The Jinmen Floodgate and Flood Control of Yongding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 by Yang Yiwu(57)

Unique Coal-Mining Prohibition Steles ... by Liu Yiquan(65)

Short Account of Beijing's Dongyue Temple Fair

..... by Chen Bali(71)

Discussions of the Positions of Dahuguorenwang Temple and

the Xizhenguo Temple of the Yuan Dynasty

..... by Liu Zhiguang(78)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Repor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Key Pillars in the Watergate

Ruins of the Central Capital of the Jin Dynasty(Beijing)

..... by Wang Dan, Lu Yinghong, Dong Yugang(80)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al Standards in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Pro-

jects

by Wang Xiaoqing(90)

The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in Beijing in the

Repair of Ancient Buildings

by Fu Weidong(93)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4th

Quarter of 2001)

(96)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ü

Jimin, Li Xueqin

Chairman: Su Bai

Vice - chairmen: Mei Ninghua,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li,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Zhao Qichang, Hou ming, Jin

Hongkui, Xu Wei, Xu Ming,

Gao Kaiju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

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Zhang Yan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编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 关于文物保护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孔繁峙

具有重要意义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下简称《名城规划》),目前,已由市文物局、市规委、市规划局编制完成初稿,《名城规划》的研究与制定,既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件大事,也更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和文物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正以飞跃性的发展速度进入国际性大都市行列,北京市将逐步展现出对外开放的、高度现代化的新貌;同时,北京作为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古都,必须全面保护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历史遗产,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名城规划》的制定,是在首都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全面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大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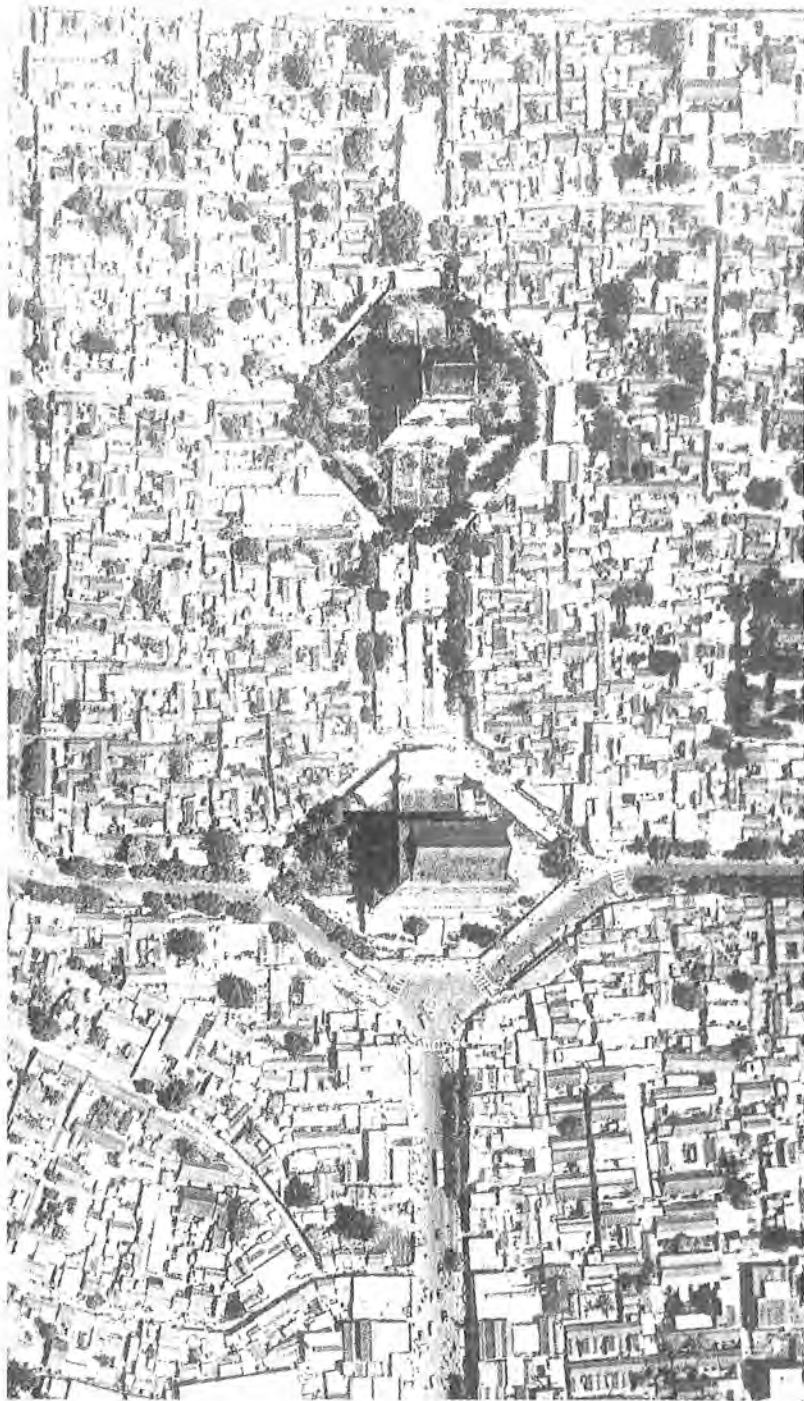
《名城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在全面分析研究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工作现状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了北京历史名城的传统特色和历史内容,其规划重点是以继承古都的传统格局,注重整体保护为原则,突出了北京旧城的风貌特点,特别是在首都北京日益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着重提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传统建筑保护发展的目标;制定了历史名城保护的实施措施。《名城规划》的公布与实施,将对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的整体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结合《名城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联系我市文物保护现状及发展趋势,对我市《名城规划》的研究制定有如下几点认识:

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与 《北京市总体规划》的关系

国务院 1993 年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是首都城市总体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规划方案,其目的是为了确定首都城市的性质、规模和整体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 and 各项建设所做的综合部署,涉及首都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广泛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名城规划》是北京古都传统文化保护的专项规划,其目标是历史文化遗产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国务院在 1993 年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要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通过不懈努力,将北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十分明确,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该看到,按照国际化的城市标准,今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世界存在密切交流并且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



国际性城市的整体结构、功能的发展趋势是:城市的经济、物质生活、政治社会生活、科技教育生活、休闲娱乐生活及文化艺术等方面,均向国际化发展;城市的交通、市政等

公用设施和各种生活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将突破原有的城市格局和城区界限,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速度和规模,将突破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和政治单位的狭隘空间,历史传统城市将出现高度现代化的新貌,《名城规划》编制工作还是从这个变化出发,在北京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前提下,研究编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

同时,还要看到,《总体规划》对《名城规划》的研究制定具有指导作用。《总体规划》在确定首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同时,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中提出:要从整体上考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要从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城市中轴线、旧城街巷、胡同、城市控高等方面入手,开展历史名城保护工作。可以看出《名城规划》与《总体规划》的原则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名城规划》是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研究和编制的:

1. 突出了北京旧城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北京从 3000 年前西周时期的北方重镇,至元、明、清封建王朝的国家都城的漫长历史中,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物古迹,不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且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文物保护价值。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不可能把北京旧城中的一切都统统列入名城规划中原样加以保护,明清北京城除了与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具有众多重要的历史遗存和有特色的名胜景区外,其最为突出的价值是,明代初期经过精心规划而建造的完整、严谨的都城本身,这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发展的最后结晶,它最集中、最突出地体现了我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思想、理念和当时先进的营造技法,它完美地把都城建设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城市的功能融为一体,在世界都城规划史上,达到了古代城市建设的高峰。因此,古都北京最有价值,最值得保护和继承的就是依据特定的都城规划理念,采用独特的传统规划设计和高超的艺术手法,结合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而创造的一个最杰出的、具有传统特色的城市空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研究与制定,着重突出了北京旧城的传统格局和框架,其中最主要的内容:

(1)是皇城的保护。将皇城列为名城保护的核心区域,《名城规划》中对皇城的整体保护采取了严格措施,要注重保护皇城区自民国以来形成的街巷、胡同和传统平房四合院;整治和恢复原有的景观环境;限制新建新的建筑,保护皇城区整体的传统风貌等。

(2)是保护和继承北京旧城的中轴线。宏伟壮观的南北中轴线是北京历史名城的一大特色,全长 7.8 公里的旧城中轴线自南至北纵贯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在这条中轴线上建有一系列气魄宏伟的城楼和宫殿建筑,是目前北京名城最为重要、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组古都遗存,是列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3)是保护北京明清城墙遗迹及标志性建筑。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北京明清城墙其整体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其城墙的原有

位置,城墙的轮廓、走向、遗迹仍能向世人展示出北京旧城的原有规模,特别是在城墙的不同地段保留的城楼、箭楼、城墙遗迹等,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是北京旧城存在的见证。

(4)是保护和延续旧城内传统街巷及历史文化街区。旧城内原有的胡同、四合院是极具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以往,我市在东、西城区保留有十几片大面积的四合院平房区,这些区域内,还依稀保留了旧城的生活气息和传统特色;同时,还有一批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传统商业街、风貌街、文化街等风格独特的区域,如南北池子大街、琉璃厂大街、前门商业街、国子监街等等,都具有不同的民俗、传统特色,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的重点内容。

2. 在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上《名城规划》对《总体规划》进行了深化和细化。

一是,在旧城传统格局的保护上,提出全面保护北京旧城的原有格局。要重点保护北京旧城整体布局严谨的突出特点,特别要注意保护好最具特色的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城相套的规划构思和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和五坛八庙分布四周的城市布局体系,这对皇城的保护工作和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皇城的整体保护;

二是,在旧城中轴线的保护上,《名城规划》突出了中轴线在全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保护中轴线上现有传统建筑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和完善中轴线的原有建筑:复建旧城中轴线南端起点历史建筑——永定门城楼,使中轴建筑整体达到历史的原貌;创造条件复建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使中轴建筑得以完善。同时,要开展前门外中轴线两侧和地安门至钟鼓楼地段的环境整治,恢复两侧沿街的传统建筑风格,以实现中轴线的传统风貌。

三是,在明清城墙的保护上,在保护好现有城楼、城墙遗迹的前提下,提出了恢复部分城楼的目标。如恢复西便门角楼,复建安定门城楼等,以展示北京旧城的原有轮廓;对北京现有城墙采取局部修复的方法,

以展示旧城走向,如修复东南角楼北侧延伸的城墙;原状保护和局部维修东南角楼至崇文门段长达千余米的城墙残迹,这样,历史上的北京内城的南侧城墙,通过东南角楼及城墙残迹,经正阳门城楼、箭楼、瓮城至西便门角楼及城墙,即可向世人展示出原内城南城墙的走向及轮廓。永定门城楼复建后,可创造条件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遗址处复建一段城墙,通过左安门、右安门的城墙遗址和外侧的护城河,可以反映出北京外城南城墙的大体轮廓。

四是,在宏观环境的保护上,从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景观保护的角度出发,要着重做好两个城圈的保护:一是皇城外围环境的保护,为维护皇城的整体环境,严格控制皇城外围的建设高度和建筑形制,采取整治措施,创造条件逐步恢复皇城外围的传统景观环境;二是旧城圈外围环境的保护。北京明清城墙已从整体上被拆除,应对原城墙的位置、走向作为重要遗址加以保护,以展示北京旧城的规模和轮廓,同时,要严格控制各城门、城楼所在位置的建设项目,应预留出各城门的原箭楼、城楼、瓮城的所在位置,为以后复建城楼创造条件,其周围的建筑高度要有控制规定。

二、文物建筑的保护目标与发展目标的定位

1. 文物建筑保护现状的分析

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经过几十年来的建设发展,北京城的原有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政府在全市历史遗产的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在逐年加大,但因历史及现实的多种原因,几十年来,北京历史文物建筑的总量及保护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一是,几十年来,全市仍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总量,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据普查资料,我市在1957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市文物普查结果是,全市共有各类文物8060项,其中古建筑占3282项,在1984年开展的第

二次文物普查,全市共有各类文物是7309项,其中文物建筑类为2714项;在1999年完成的全市第三次文物大普查,全市文物的总量为3551项(其中有计算方式等因素在内),其中文物建筑类仅为1382项。可以看到,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全市传统建筑的总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和创造的,随着首都大规模的建筑、城乡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传统建筑的自然损毁、缺少维修保护等因素,全市古建筑存量的总趋势是在减少的;

二是,旧城内大面积的危旧房改造和道路展宽工程,将使成片的平房四合院快速消失,其中部分有一定价值的四合院等建筑,因过早地消失,也会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三是,在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方面,我市的历史欠账过多,特别是占用文物建筑的单位、住户的搬迁、文物建筑的修缮开放等任务更为艰巨。据1999年统计,我市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的区级以上文物的保护情况面临以下三类状况:

一类是经过修缮后保护现状较好的文物保护单位,有124项。如天安门、故宫、太庙、社稷坛、景山、北海、天坛、正阳门、雍和宫、广化寺等,此类文物单位保护措施完善,建筑完整无险情;

二类是经过部分维修,保护状况一般,无大险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97项,如南新仓、孙中山逝世纪念地、段祺瑞执政府、清海军部、陆军部、东南角楼等;

三类是被社会、居民占用或缺乏维修资金,保护状况较差、存在不同险情的文物保护单位,如宣仁庙、火德真君庙、阳平会馆、中山会馆、袁崇焕祠、李大钊故居、明城墙遗址等,有77项,急需开展修缮抢险工程。

我市文物建筑保护中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长期被单位和民居所占用,使文物建筑长期得不到维修。由于不合理使用,很多文物单位或因私搭乱建,破坏了原有格局;或因在古建内用火使用煤气等存在严重的火险隐患,

据1999年统计,我市旧城区内,区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管理开放的41项;自然开放的6项;宗教活动使用的14项;学校使用的29项;各类办公使用的85项;作为工厂、仓库使用的11项;民居、宿舍使用的79项;商贸使用的33项。上述文物的不合理使用状况,是我市研究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不可回避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2. 文物保护的规划目标

文物单位的保护措施与发展目标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自公布后,每个单位都制定和建立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从目前的状况看,都普遍缺少长远的保护规划目标。在《名城规划》编制中,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及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文物单位保护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突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着眼于文物的完善与发展;追求文物的开放利用的社会效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目标是:

(1)全面解决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合理利用问题,实现对占用单位和居民的搬迁,从而实施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和对外开放。要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工厂、仓库、机关、学校、居民等社会部门占用文物建筑的状况,要着重解决一批被社会和单位占用的重点文物单位,如恭王府、孚王府、袁崇焕祠、宣仁庙、火德真君庙、中山会馆、大高玄殿、夕照寺等。

(2)恢复文物保护单位的原格局,实现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完整性的保护,彻底解决我市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文物单位的“残缺不全”的问题。如白塔寺东路、智化寺东路和西路、万寿寺东路等,都是在民国时期被局部拆除后,而逐渐改成民居的。在今后几年内,将结合周边区域的危改工程,通过搬迁住户、拆除民居、腾出用地,逐步恢复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有建筑 and 传统格局,除恢复白塔寺东路和山门,智化寺东、西两路建筑、万寿寺东路建筑外,还将恢复建国后拆除的历代帝王庙门前的三座牌楼、旱桥

等1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复建项目。

(3)实施文物单位周边传统环境的景观整治与保护,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求,研究制定全市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环境景观的保护规划,以体现北京历史名城的传统特色。如:天坛的保护规划目标是,创造条件逐步搬迁并拆除天坛东、南、西三面近年形成占用外坛的居民住宅楼区和数十个各类占用单位的楼房建筑,复建天坛外坛的东、南、西三面坛墙,全面恢复天坛的历史原貌;先农坛的保护规划目标是:维修、复建先农坛的外坛南、西两面的坛墙,创造条件逐步外迁占用古建筑和坛内的占用古建筑和内坛的占用单位,拆除后期添建的现代建筑,恢复先农坛的原有格局和历史景观;明北京城东南角楼及城墙遗迹的保护规划目标是:搬迁遗址区域内的全部住户和占用单位,整治环境,拆除各类办公用房和民居住宅楼、厂房等各类建筑,维修城墙遗址,周边实现绿化带,建成明城墙遗址的展示景区;天宁寺的保护规划目标是:搬迁占用文物区域的住户和单位,维修和复建天宁寺的历史建筑,建成对外开放的文物景点,同时,创造条件拆除其西侧的高大烟囱,彻底改变其目前的景观环境……,通过对全市重点文物单位及周边区域的整治,使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风貌得以展现和延续。

三、关于对皇城整体保护的规划思考

北京皇城,是与北京城同时修建的一座与外界相隔绝的皇家建筑,是拱卫紫禁城安全和为帝王统治服务的皇宫外围城,曾是我国明清时代封建帝王对全国的统治中心。在历史上,皇城内除中心区域的皇宫、太庙、社稷坛、三海、景山等御园外,还分布有二十四署及各种监、局、厂、作、库等为皇家服务的制做、管理机构。经过乾隆十九年对皇城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后,确定了皇城的最终规模。只是进入民国后,皇城的禁地被打破,皇城内逐步成为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域。由于当时政治上的原因和城市交通发展的需

要,不断对原封闭的皇城墙进行拆除和改造,至民国十六年,皇城墙仅存南侧的长安街一线,其余三面城墙及城门均已拆除,目前基本保存了民国以来皇城的面貌。

1. 皇城在北京历史名城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认定

北京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与国内所有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北京是延续 700 余年的国都之城。北京城的建设,整体布局严谨,规划构思独特。其突出特点:一是,全城以皇城为中心,分别有宫城、皇城、内城、外城依次围城的四道方城,皇城是全城的核心;二是,一条南自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纵贯全市的中轴线,仍以皇城、宫城居中,左祖右社,对称布置,天、地、日、月坛分布四周,其上述规划布局所体现的,正是封建帝王的皇帝至高、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的礼制法度与传统城市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北京皇城,虽历经 500 余年的沧桑岁月,但仍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上象征国家之都——皇城的布局特色和建筑规模,这是我国目前惟一保存完整的体现封建国都的——皇城建筑群,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国都建筑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北京《名城规划》中的核心内容。

2. 皇城整体保护的规划目标

一是,以紫禁城的全面保护为中心,皇城内的故宫、太庙、社稷坛、北海、景山等共同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代表中国建筑最高水平的皇帝“治居之所”的宫殿建筑群,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成功杰作,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名城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完整地保护上述文物建筑的历史、艺术价值,其维修工程,要设法保存古建筑的原有部分,维修工程要严格采用传统材料、工艺,使其原有历史传统价值得以延续。

二是,原貌保护和恢复皇城内的传统四合院。尤其是紫禁城两侧的四合院区域,是明清时代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的二十四署

和为其服务的各种监、厂、局、作、库等管理机构所在地,民国以后才逐渐成为民居四合院,其原有的建筑形制体现了皇城内一种固有的建筑特色。《名城规划》对皇城内,特别是对故宫两侧的南、北长街,南、北池子,景山东、西街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划内容,明确要求,这些街区传统建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要从原建筑的外观风貌和整体格局上继续保持四合院、街巷、胡同的固有特色,作为紫禁城外围的建筑衬托,发挥皇城内景观协调的重要作用。

三是,重新调整皇城内的土地使用性质。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皇城的整体保护缺乏应有的重视,使皇城区内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高大建筑,有的区域还开发为楼房小区,破坏了皇城的整体性,这些现代化建筑在高度、体量和形制上,与皇城内的传统特色格格不入。研究和制定历史名城保护规划,应按皇城整体保护的要求,重新调整皇城内的土地使用性质,应把原先制定的皇城内的建设开发区全部调整为皇城保护区,今后不得在皇城范围内设立开发区,目前开展的建设项目应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防再产生新的现代化高大建筑。

四是,严格限定皇城及周边的建设控制高度。近年来,我市对故宫、景山周边的四合院平房区,依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要求,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目前基本保持了原有四合院格局和以平房为主的建筑景观。在皇城的东、西、北外延区域的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灵镜胡同和地安门一线的皇城墙里侧这一周边区域,是皇城的景观控制区,历史上是四合院平房区,但自民国以来,由于缺乏限制措施,建造了很多高层的现代建筑,对皇城的原有风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对这一类区域的保护,应从皇城整体保护要求出发,制定较为严格的建筑高度规定,其建筑高度应限制为:以四合院平房为主,局部二层的传统形制的建筑,以降低外侧现代城市建筑对皇城中心区域的景观影响,使其发挥皇城外围景观环境的控制作用。

四、历史传统文化保护区的 增设及保护发展目标

确定和公布一些有特色与古都风貌密切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保护区,可以集中保留和反映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文化特色。目前,全市共确定和公布了 25 条历史传统文化街区,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组成的传统文化遗存的保护体系。

从公布的 25 条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传统的特点看,可分为五类:(1)围绕着故宫、景山形成的传统式平房街区,有南北长街、南北池子大街、景山前、后、东、西街、东、西华门大街、地安门内大街、陟山门街、五四大街、文津街;(2)传统四合院平房区,有南锣鼓巷、西四北一至八条、国子监大街、阜成门内大街等;(3)传统商业街区,有琉璃厂东、西街、大栅栏街等;(4)历史风景街区,有什刹海周边地区、颐和园至圆明园地区;(5)近代建筑街区,有东交民巷大街的使馆建筑群等。

以上街区的确立,在保护北京历史传统文化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规划的内涵看,以往公布的历史传统街区的数量和分布区域,还不能全面反映出北京历史名城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按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要从整体上,全面地保护北京历史名城的传统文化,还要继续加大对旧城内历史传统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力度,还需要从四个方面确定和保护一批目前历史传统特色较为突出的街区:

一是皇城区域,对于皇城的保护,已得到社会各界空前的重视,市政府已决定将对皇城进行整体保护。以往单纯将故宫、景山周围的平房区域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还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对皇城保护的要求,从皇城整体保护的需要出发,应在目前所确定的 14 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上,在皇城区内再选定并公布部分历史文化传统街区,就尤为重要了。东城区政府结合危改和环

境整治工程,对东皇城根这一区域的居民和单位进行了搬迁,建成了“东皇城墙遗址公园”,使此处环境有了彻底的改观,整治和皇城墙局部复建后的南河沿大街和北河沿大街,大致反映了明清皇城东墙边缘的建筑格局和轮廓。在沿街 2700 余米长的区域内分布有普胜寺(欧美同学会使用)、翠明庄、北大红楼、五四广场、嵩祝寺、智珠寺等文物保护单位,其街景特色所展示的是两种时代不同、建筑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反映了自明清至民国来的建筑发展特点和历史文化的跨度。中南海西侧的府右大街,基本上保留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建筑特色,其东侧是中南海西围墙,红墙黄瓦,为典型的明清皇家建筑风格,西侧基本保持了明清时代的青砖灰瓦建筑,为民间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制,基本保持了皇城区内的传统特色。以上两条大街应确定为皇城区内的历史传统文化街区进行保护。

二是,内城平房区。内城是《名城规划》的重要区域,1990 年经市政府公布的第一批文化保护区中,内城有东交民巷、南锣鼓巷、西四北一条至八条、阜成门内大街、国子监街、什刹海地区等六片区域。根据北京历史名城的特点,保护规划要将内城的四合院、胡同、街巷作为重点,要成片、成区域的加以保护,根据保存状况和名城保护的需要,将增设和列入历史传统街区进行保护的有:(1)东四北三条至八条四合院街区,这一区域的四合院、胡同、街巷是在元代街巷格局上发展形成的,是明清北京城重要的传统街区。其特点是,胡同东西向,平直顺畅,南北有小巷相连,宅院规模较大,多为明清官僚宅邸,建筑布局特点突出,整体上反映出老北京的民居传统特色;(2)地安门东大街至东四十条西口,平安大街展宽后,北侧街面得以保留,南侧仍建成传统形式的建筑,这条大街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建筑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在全长 1200 余米的街面上,较为集中地保留的古代建筑和纪念建筑有:清代后期的太医院旧址、地下保存的东不压桥遗迹、僧格林沁祠、孙中山逝世纪念地、和

敬公主府、欧阳予倩旧居、和亲王府(即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三·一八”惨案发生地、清海军部、陆军部等历史文物建筑遗迹,反映了清代至近现代北京地区的历史内容和历史事件;(3)西城区柳荫街,为明代形成的与定阜街、前海西街、龙头井街相连的胡同街区,全长600余米,沿街东侧为全国著名的恭王府和花园,西侧为清代涛贝勒府和部分传统四合院,此街与什刹海历史文化街区相连,两侧多为东、西两府高大的灰色府墙和高低错落的屋脊等传统建筑,配以成荫的柳树,是条幽静清雅、传统特色深厚的街区。

三是,旧城中轴线两侧区域。北京旧城中轴线上的建筑,是最具古都特色的建筑群,7.8公里长的旧城中轴线自永定门至钟鼓楼纵贯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等一系列气魄宏伟的建筑,是北京历史名城的精华。在全面保护中轴建筑的同时,要保护与其相协调的两侧传统建筑形式,保持中轴线两侧传统而古朴的风貌。根据名城保护的需要,要从严控制中轴线两侧区域的建筑高度和形式:(1)确定永定门大街的沿街地段为历史传统文化街区,作为中轴线的起点,在永定门城楼复建后,通过对沿街两侧建筑进行整治,而恢复与其协调的沿街建筑景观,使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显露出的天坛、先农坛的外侧坛墙,展现出永定门区域的历史风貌,使永定门城楼轴线起点标志性建筑更为突出;(2)确定前门大街为历史传统文化街区。前门大街是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主要道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明清皇帝出京巡视和到天坛、先农坛祭天、祭先农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自明清两代延续至今的繁华的商业街区。在北起箭楼、南至天桥、全长1.6公里的沿街两侧,各种店铺、传统老字号鳞次栉比,如世界著名的全聚德、月盛斋、都一处、一条龙、通三益、谦祥益、大栅栏等等,只是近年来,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沿街的建筑呈现出现代化的趋势。按名城保护的要求,前门大街要保护和恢复传统商业街区的原貌:创造条件复建前门外传统街景

建筑——五牌楼;标明正阳桥的位置,清理整治后期所添加的现代化商业建筑和街面装修,恢复沿街的传统商业建筑 and 传统老字号;通过对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的整治,使这一历史悠久、街市繁华的商业区再次展示出历史的传统风貌。

四是,将具有历史名城标志性建筑周围的传统文化区域,确立为文化街区,如钟鼓楼是老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其周边传统四合院平房区风貌基本保存完好,最突出的是鼓楼至地安门段大街、鼓楼东街至交道口大街、鼓楼西街至德胜门大街,这三条传统大街基本保存了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和胡同、街巷的格局,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店铺门脸、老字号、寺庙等历史建筑,反映了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老北京的传统特色,因此,上述三条大街应作为《名城规划》中的历史传统街区加以保护。又如:德胜门箭楼是北京旧城中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其南侧的德胜门内大街,两侧基本保存了四合院民居风格的平房建筑和胡同走向,其整体风貌和传统建筑形式与德胜门箭楼十分协调,应将德胜门内大街及沿二环路南侧的平房区,一并确定为历史传统文化街区,与德胜门箭楼融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景观区域加以保护。

《名城规划》虽然是一个专项性的保护规划,但因其规划的特殊性,编制《名城规划》本身又是一项多学科和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发展史和北京社会发展史的文化特点和渊源,经科学分析并准确掌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实质内容,对构成历史名城的多项内容,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同时,要着重从首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角度出发,对全市的各类历史文物、传统文化和文化设施、道路交通、市政建设及首都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等多方位的综合,才能最终制定和形成一项完整的北京历史名城保护规划。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加强展陈经费的管理

促进两个效益的发挥

舒小峰

一、问题的提出

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宣传展示,而宣传展示的重要手段是固定陈列和各种临时展览。固定陈列和各种临时展览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效益和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国家投巨资用于各博物馆的基本建设,其中,用于展览陈列的经费数目也十分可观。这些陈列展览,大大提高了博物馆的展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观众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是,目前我们在展览和展览经费管理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首先,上级主管部门对展览项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

从现行的管理办法上看,一个展览项目从提出到完成,大致需要经过如下程序:第

一,确定工作任务。展览项目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或由博物馆提出,经上级主管部门确任后列入年度工作任务。第二,博物馆组织人员撰写展览大纲。第三,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大纲并批复。第四,博物馆组织人员进行形式设计并根据形式设计编制展览预算。第五,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形式设计和展览预算,拨付展览经费。第六,博物馆组织力量制作展览。第七,上级主管部门对展览内容、形式设计及决算进行验收审计。

根据这一程序,上级主管部门要对展览项目的确定、展览大纲、形式设计、展览预算逐项审定。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不可能熟悉每一项展览内容,也不可能对每一项展览内容的形式设计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展览工程预算及各种新材料的价格也不可能有所了解,因此,很难保证审批的科学性,在审批时甚至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另外,如果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将大量精力放在与博物馆在展览立项、经费预算的“讨价还价”上,将大量精力放在审查具

体展览事务上,不利于对博物馆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的宏观管理和把握。机构改革后人员减少,这种做法如不改变,工作将更加紧张、被动。

第二,个别博物馆在申请展览预算时“虚报冒要”现象突出。

个别博物馆“眼光向内”、“眼光向上”,将承担展览任务视为创收途径之一。在申报展览经费预算时,“头戴三尺帽”,本来20万元可以完成的展览,预算甚至做到50万元。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在展览经费审核方面无章可循,基本上是“粗放型管理”,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凭经验,因此,即使上级主管部门拦腰砍一刀,只给25万元,承担展览任务的博物馆还余5万元。

在“制作展览可以创收”心态的支配下,展览项目的确定和资金管理便出现如下问题:第一,将主要精力放在展览立项和争取更多的经费上,忽视展览立项的前期论证、展览大纲的编写和形式设计及对展览制作单位的选择、管理。展览大纲未经充分论证,甚至错漏百出便开始形式设计;而形式设计也往往只有效果图,其他设计则“边设计,边施工”。制作出来的展览很难称得上是“精品”。第二,对展览制作单位的管理不严,制作展览时则往往出现核算不细,浪费严重的现象。第三,对剩余资金管理不严,有相当部分被挪做他用。第四,对现有展览设施不计折旧,更不考虑展览的生命周期,往往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提前要求改陈,以再次争取改陈经费。

第三,展览的社会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一个时期以来,博物馆展览往往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前期制作时轰轰烈烈,展览开幕时热热闹闹,日常开放冷冷清清。不要说收回展览的前期投入,取得相当的经济效益,甚至连预期的社会效益也难以实现。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下一些因素不可忽视:第一,展览项目的确立缺乏科学的前期论证。第二,展览选题、观众定位不准,导致展览大纲、形式设计针对性不强,难以吸引观众。第三,忽视展

览开幕前后的宣传营销。

二、思考与对策

从以往的做法看,上级主管部门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各博物馆的展览工作。这种做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基本可行的,展览完成后,同样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组织相当规模的观众。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展览工作对上级主管部门来讲,显然是力不从心的;通过这种手段管理的展览工作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为解决展览项目确定和展览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博物馆积极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引导博物馆“眼光向外”,加快博物馆社会化进程,有必要对博物馆展览项目和经费进行科学管理。

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博物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对展览的管理,既不能采取传统方法,也不能放任不管。作为投资主体,博物馆的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对展览项目和经费进行新的科学管理,即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对展览工作进行综合的、多角度的管理。

博物馆是公益性机构,举办的展览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质,其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博物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向博物馆投资举办展览,其追求的根本目的是产生社会效益,因此,不能像对待企业那样,要求投资回报率。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家对博物馆各项日常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又需要博物馆通过举办展览,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以弥补事业费的不足。因此,考察国家或博物馆上级主管部门向博物馆投入展览经费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应当将展览投入总额、展览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综合考虑。

本着这一思路,对于博物馆展览项目的管理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1)考察展览投资效益

一个时期以来,个别博物馆在制作展览

过程中,餐费、资料费、各种补助等开销较大,这类费用增大,无疑会挤占展览经费,使得展线上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减少。有鉴于此,在考察展览投资效益时,首先应对展览制作过程中固定资产形成率做出限制。即:

固定资产形成率=

$$\frac{\text{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text{展览总投资额}} \times 100\%$$

由于对投入展览的文物价值进行估算有较大难度,并且馆藏文物本身就是国有固定资产,因此,在计算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时可不考虑。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固定资产形成率越大,说明用于展览的投资效益越好。

(2) 固定资产使用效益

一个展览展出后,即使其固定资产形成率再高,如果没有观众参观,或参观的观众很少,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和起码的经济效益。因此,有必要对展览开幕后的固定资产使用效益进行评估和考察。这一考察可采用对固定资产使用率的测算。

固定资产使用率是指每一观众占用展览中形成的固定资产数额。固定资产使用率的计算方法为:

固定资产使用率=

$$\frac{\text{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text{观众总数}} \times 100\%$$

在此式中,应注意二点:第一,应注意对观众人数统计的科学性。从理论上讲,既然观众多少是衡量展览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在计算观众总数时,就应当包括全部入馆参观的观众。但是,考虑到统计的困难及某种人为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购票入馆的观众人数为准。第二,观众总数的计算,既可以是单位时间(如一年)内的观众总数,也可以是展览生命周期之内的观众总数。^①从某种意义上讲,展览实际上也是一种产品,能够满足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是临时展览,则观众总数为展出期间的观众总数。

通过计算固定资产使用率来考察固定

资产使用效益,可以将展览的投资总额与展览的社会效益紧密联系起来。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固定资产使用率越小,说明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越好,展览取得的社会效益越大。

(3) 单个观众费用额

如果说前两式考察的是展览投资总额与展览社会效益关系的话,那么,考察单个观众费用额,就是要将展览投资总额、展览的社会效益与展览所能够取得的经济效益一并加以考虑。

博物馆举办一项展览,除了制作展览的一次性投入外,还包括日常费用。所以,考察展览期间与展览有关的日常费用支出与收入,同样是分析展览各种效益的重要内容。计算单个观众费用额,是在二式的基础上,对博物馆展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做进一步的考察。

$$W = \frac{A+B+C+D-E-F-G}{H} \times 100\%$$

上式中,W为单个观众费用额;

A为用于制作展览的总投入金额;

B为展览期间或单位时间内与展览直接发生关系的人员的费用,如看展厅临时工工资、讲解员加班等费用(不含工资、福利等);

C为照明设施、电路设施、冷暖设施、展具等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费用。

D为用于展览宣传、营销的费用;

E为门票收入;指纯粹意义上的门票收入;不包括房租收入、某些原状陈列所获得的捐赠等;

F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固定资产进行的摊销折旧费用;

G为博物馆销售与本展览相关的纪念品等经营活动的纯利润;

H为展览生命周期内的观众总数或单位时间内的观众总数。

需要指出的是,在计算日常维护费用时,没有考虑文物的日常保养费用。在展览条件与库房保管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此项费用可由其他专项经费列支。但是,必须强

调,为保障文物藏品的安全,在布展时要对某些文物的展出条件加以考虑并予以保障。如果展览条件与库房条件有所不同并需加大支出,由此所发生的用于改善环境的投入及日常维护费用,应分别纳入展览总投资额及展览期间维护费用。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单个观众费用额越小,说明展览的综合效益越好。

上述三个算式只是一些初步考虑,尚有不全面之处,但其宗旨是要加强对展览经费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考察。

三、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对展陈经费的管理,必须建章立制

目前,市文物局针对各局属单位的展览工作,已经制定出一个规定,但其中条款基本上还是原则性的。因此,应对这一规定进行修订完善。新修订的规定要将展览立项、制作和展览制作完成后的审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筹考虑,纳入管理范畴。在这一规定中要明确奖惩。这是对展览工作所实施的法律手段。

(二)加强前期立项管理

展览立项工作要加强前期论证与可行性研究,各申请展览项目的单位要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应包括展览内容、经费数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预测等。上级主管部门要根据将展览经费投入总额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筹考虑的原则,对各单位的立项要求逐一审查。对展览中的固定资产形成率要有明确的下限规定。

(三)将对展览的管理纳入各馆年度目标责任书

对经过论证、已经立项的展览投入资金后,要将对于展览的管理纳入到各馆的目标责任书中,将展览固定资产形成率、固定资

产使用率和单个观众费用额作为年度考核各馆业务工作的重要硬性指标之一,同时明确奖惩。

(四)展览项目要逐渐引入招投标制度和公开采购制度

1999年4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6号令发布了《北京市政府采购办法》。实施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制度,有利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结合博物馆展览工作的实际,我认为,对于投资额较大的展览项目设计和制作,也要逐渐引入招投标制度,对定价较高的固定资产,逐渐实施公开采购制度,以杜绝暗箱操作和资金浪费现象。

四、结 论

通过以上方法对博物馆展览项目和经费进行管理,可以实现如下目标:

第一,提高政府部门对博物馆展览项目和经费的管理力度;第二,可以使有限的展览经费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可以促进博物馆展览质量的提高;第四,可以避免暗箱操作和展览经费的浪费。第五,可以促使博物馆在经济收入方面从“找局长”转向“找市场”,促使其举办高质量的展览,并注重展览的社会效果。

①展览生命周期的概念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市场营销学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地位和获得能力都处于变动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最终将不被用户采用,被迫退出市场。”所谓产品生命周期,就是指产品从进入市场到最后被淘汰的全过程,也就是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北京市文物监管物品市场 现状调查报告

傅公钺

为整顿和规范北京市文物监管物品市场秩序,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于2001年6月19日至8月25日期间,对北京市行政管理区域内文物监管物品市场进行了全面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经批准实施文物监管的市场

(1)北京古玩城

位于朝阳区劲松桥北侧路西,是北京目前经批准的文物监管物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管理相对最规范的旧工艺品市场。

1989年市文物局批准“北京劲松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该市场当时由市工商局主办。1995年9月15日迁入现址的大楼,改名为“北京古玩城”,同时按“政企分开”的原则,主办单位由市工商局改为古玩城市场服务中心。1999年7月与市工商局脱钩,成立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其上级单位为“天成开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市商委。现古玩城总经理是赵津生,市场部经理是吴重缜。目前,市工商局在古玩城内设立的“重要商品管理分局”,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对北京古玩城进行管理,如发放经营执照等。由市文物局派专职鉴定人员负责验货鉴定;由朝阳区文物管理所派员负责日常监管。现市场中有经营户400多家,其中大多数为个体户,也有企、事业单位所设摊户。该市场一层以古旧家具为主,二、三、四层以瓷器、杂项、钟表、地毯、小木器、字画等为主。目前,市文物局派文物公司退休职工每周二、五对市场商品进行鉴定、贴“京文检”标签等工作;朝阳区文

物管理所同时派人监管并协助进行鉴定贴标签及办理《文物监管物品许可证》等工作。该市场年经营额约为1.6亿元人民币。

(2)红桥市场旧工艺品部

位于崇文区天坛东门外路东,1989年市文物局批准经营文物监管物品,原由崇文区工商局主办。1995年1月28日迁入目前新楼三层的北侧,改由崇文区城建开发公司主办和经营管理。现有经营者60家,以瓷杂、绣片等为主。现由市文物局直接监管。每周一,市文物局派人进行鉴定、贴标签工作。该市场年经营额约为0.5亿元人民币。

(3)荣兴艺廊

位于宣武区琉璃厂西街19号,1993年9月市文物局批准开办旧货市场并批准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由北京荣兴文化发展公司(其上级单位为“荣宝斋”)主办。现有经营者100多家,其中经营旧工艺品的为37家。现由宣武区文化文物局进行文物监管。市文物局派人每周一进行鉴定、贴标签工作;宣武区文物管理所派人进行日常监管并协助进行鉴定贴标签及办理《文物监管物品许可证》等工作。

(4)亮马河收藏品市场

位于朝阳区燕莎中心东侧1000米处路北,1995年5月经市文物局批准开办,由朝阳区麦子店街道企业发展中心主办。该市场现有经营者120多家,以经营瓷杂为主,其余为古旧家具、字画、地毯等。现由朝阳区文化文物局进行日常监管,市文物局派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退休职工每周四进行鉴定、贴标签工作;朝阳区文物管理所同时派人监管并协助进行鉴定贴标签及办理《文物监管物品许可证》等工作。该市场年经营额约为

0.06 亿元人民币。

(5)兆佳朝外旧货市场

位于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华威北里 43 号,1999 年 7 月经市文物局批准开办,由北京市兆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上级为市建工局)主办。该市场 1~3 层经营古旧家具,共有 50 多家;4 层有 50 多家经营瓷杂类文物监管物品。市场由朝阳区文化文物局进行日常监管,市文物局派市文物公司退休职工每周三进行文物鉴定、贴“京文检”标签;朝阳区文物管理所同时派人监管并协助进行鉴定贴标签及办理《文物监管物品许可证》等工作。

(6)海王村工艺品商场

位于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1992 年 2 月批准开办旧货市场,原由琉璃厂文化街管委会主办,后管委会撤销,目前由“琉璃厂发展有限公司”(私企性质)主办。去年 4 月 25 日开始进行市场设施改造,5 月 10 日竣工,18 日重新开业。现有经营者 62 家,其中经营旧工艺品的有 50 家,以瓷杂为主,以古旧家具、旧钟表为辅。该市场由市文物局直接进行监管,市文物局派局退休职工每周一进行鉴定、贴标签工作;宣武区文物管理所派职工进行日常监管并协助进行鉴定贴标签及办理《文物监管物品许可证》等工作。

(7)琉璃厂文化街

位于宣武区,东起东琉璃厂街东口的延寿寺街、西至西琉璃厂街西口的南柳巷,是全市惟一一座“有市无场”的文物监管物品市场。1996 年 12 月批准宣武区文化文物局对整个琉璃厂文化街试行放开文物监管物品的经营并实施文物监管。但批准后,宣武区文化文物局未能组织实施对该街管理。2000 年 12 月市文物局在宣武区文化文物局的协助下,经过法规和专业考试,已对该街两侧“前店后宅”式经营户实施文物监管。目前,该街共有各类经济性质的商家 96 户,其中 72 户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现由宣武区文化文物局进行日常监管,市文物局派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退休职工每周二进行鉴定、贴标签工作;宣武区文物管理所同时

派人协助进行鉴定贴标签及办理《文物监管物品许可证》等工作。

(8)潘家园旧货市场

位于朝阳区潘家园,开办已有 10 多年,一直由潘家园街道办事处主办,经营新、旧工艺品、文物监管物品及生活用品,但因其管理和经营很混乱,不时有违纪违规现象且屡教不改,故一直没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也未经市文物局批准经营文物监管物品。2000 年 10 月在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的直接关心下,市文物局、朝阳区文化文物局责令并协助该市场进行整改,由市文物局批准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资格并由朝阳区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按“政企分开”的原则,现其主办单位为朝阳区潘家园社区经济管理中心。该市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假日摊位,约 3000 个,其中以新工艺品为主,夹杂文物监管物品;一部分为长设固定摊棚,约 100 家,经营各类文物监管物品。目前对于假日市场部分,朝阳区文物管理所进行监管,市文物局也派文物出口鉴定所退休职工每周六、日进行验货监管。该市场年经营额约为 1 亿元人民币。

(9)北方民用废旧品交易市场

位于石景山区八宝山地铁站北侧 100 米处,1998 年开办。原经营生活废旧物品;2000 年 5 月起,未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和监管擅自增设经营文物监管物品摊棚;9 月由市文物局、市工商局、市公安局联合查封。2001 年 3 月在整改的基础上,市文物局批准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资格并由区工商局为其营业执照增项。由石景山区北方农工商总公司主办。现在有 51 家经营户,全部经营文物监管物品,以旧瓷器杂项为主。经营者中 1/3 为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省人,也有一些是由大钟寺等旧货市场转来的,因该市场属初创阶段收取摊位费较低。石景山文物管理所派员对其进行日常监管;市文物局派市文物公司退休职工每周二进行文物鉴定、贴“京文检”标签等工作。

(10)古玩城雅宝路市场

位于朝阳区日坛西门外路南。原为斯

泰服装市场,主办人为浙江温州个体经营者,后因经营不景气,撤服装项目,与古玩城合作建立文物监管物品市场,即“古玩城雅宝路市场”,实为古玩城分店。经审核,2001年4月19日市文物局批准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资格并由区工商局为其营业执照增项。初建时有经营户86家,因管理不善,目前尚保留35户。每周一,市文物局派局退休职工进行鉴定、贴标签工作。

(11)荷花古玩旧货市场

位于西城区什刹海西岸,1995年4月批准开办,主办单位为西城区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有经营摊位35个,其中经营旧货的有13家,以瓷杂为主。该市场由市文物局直接进行监管。自1998年初起,市文物局未派人进行鉴定和管理。该市场于2000年“十一”后开工进行改造,预计工期为1年。据悉,该市场改造将于2002年6月竣工,自7月起试营业,10月1日正式恢复营业。

(12)大钟寺旧货市场

位于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31号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门前广场,1996年9月批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利用山门外广场及复建的古建筑主办旧货市场。主办单位为北京大钟寺东方文化发展中心。该市场共有固定经营用房49间,临时经营用房13间。市场以经营瓷杂为主。市文物局批准后未对其进行文物监管。因管理不善,经营户基本流失,目前该市场主办单位已主动申请撤销其文物监管物品经营资格。

(13)德胜门钱币市场

位于西城区德胜门箭楼的真武庙前,1994年9月市文物局正式批准德胜门古代钱币交易市场,由北京德泉斋钱币商店主办。有摊位25个,以经营古代钱币、近现代纪念币为主,个别摊位夹带经营瓷杂。当初批准该市场为古代钱币交流市场,规定入场交流人员只限境内居民,且不得进行其他类别的文物监管物品的交流活动,故市文物局未派人对其进行文物监管和鉴定,委托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进行日常监管。2001年5月起,该市场进行场地改造,目前处于停业

状态;预计2002年8月恢复营业。

(14)北京华声天桥民俗文化城

位于朝阳区左安路路南,2000年4月开业,由画家王树声个人开办,内有“古玩一条街”。该市场共有摊位160多个,地摊200多个,全天营业。“古玩一条街”现在约有5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该市场未经市文物局批准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资格,仅有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包括文物监管物品。鉴于此怪状,市文物局未派专家进行验货鉴定,朝阳区文物管理所也未派人进行日常监管。据悉,针对这种现象,“北京市整顿和规范文物市场秩序领导小组”将在全国整顿和规范文物市场秩序活动后期进行解决。

二、未经市文物局批准并未实施文物监管的市场

(1)报国寺文化工艺品市场

位于宣武区报国寺内,1997年5月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上市范围为新工艺品,主办单位是报国寺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现有经营户111家,棚屋30多个,地摊70多个。该市场未经市文物局批准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资格,但大多数摊位都在经营文物监管物品,尤其是历代古钱币。

(2)北京中商和众旧货综合交易市场

位于朝阳区双龙南里1号院,该市场是由国内贸易局批准成立的旧货调剂单位,2000年3月开业,由中商恒润旧货调剂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和众运输集团、北京宏富城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主办。该市场未经市文物局批准其经营文物监管物品资格,现市场内有10家左右经营文物监管物品,周六、日市场院内开办地摊,有些夹杂经营文物监管物品。

(3)甘露园百姓物品交易市场

位于朝阳区甘露园中里8号,1999年12月取得经营新工艺品执照,主办单位为北京利源兴达商贸中心。该市场以经营生活用品为主,但有10家左右经营文物监管物品。

(4) 鸿六福工艺品市场

位于宣武区大栅栏西街 56 号,主办单位是北京鸿六福商贸有限公司。该市场 2000 年 6 月开始招商,7 月正式营业。该市场地下一层经营新、旧家具,地上一层经营新工艺品,夹杂经营文物监管物品。

(5) 丽都饭店东侧市场

该市场以经营新工艺品和服装为主,但有两家经营古旧钟表等文物监管物品,一家经营古旧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还有多家夹杂经营文物监管物品。

(6) 居庸关旧货市场、十三陵旧货市场、司马台旧货市场、慕田峪旧货市场、八达岭旧货市场等旅游景点市场内有些摊位,均不同程度的夹杂经营文物监管物品,主要是金漆雕版、瓷器杂项等。

(7) 朝阳区十八里店村有农民大量出租房屋给非法经营、修理、加工古旧家具者,形成收购、加工、出售的经营一条龙渠道,为非法经营文物监管物品提供货源。

另外,朝阳区还有很多类似加工点,存在不入市的非法经营状况,如高碑店、吕家营等地。

三、有关饭店、宾馆及商店内的 非法经营文物监管物品

1. 宾馆、饭店

(1) 北京国际贸易中心

“嘉瑞艺术中心”租赁其场地经营古旧瓷器等文物监管物品。

(2) 凯宾斯基饭店

“广汉堂古典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其场地经营古旧家具类文物监管物品。

(3) 丽都饭店

“北京金松鹤艺术品有限公司”租赁其场地经营古旧瓷器类文物监管物品。

(4) 中国大饭店

“梓风阁”,其营业执照地址为崇文区桃园南街 11 号,但其租赁中国大饭店二层,经营以清代青花瓷为主的文物监管物品,其中大多为法律明令禁止出境的文物。

“国艺斋”,租赁中国大饭店二层,以经营新工艺品、新瓷器为主,但其中夹杂文物监管物品。

(5) 国际饭店

“博艺轩工艺美术商店”租赁其场地经营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

(6) 朝阳区的一些旅店、饭店内,存在着非法地下交易文物监管物品的状况,多是在旅店、饭店内商谈交易,然后从租赁的库房走货,全部过程在文物监管视线之外。尤其是潘家园地区的旅店、饭店,如:友联盛地下旅馆、华威地下旅馆、中诚地下旅馆、纺织部招待所、松兴地下旅馆等 10 余家。

2. 商店

(1) 北京达意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位于昌平区邓庄,店内经营有古旧家具、古旧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

(2) 北京金殿友谊商城

位于昌平区南口镇,店内经营古旧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

(3) 北京肆维工艺美术商场

位于昌平区西关镇,店内经营古旧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

(4) 华艺实业有限公司

分别在朝阳区东直门外东营村 190 号、东苇路小店 89 号,经营古旧家具类文物监管物品。

(5) 秦风珠宝店

位于颐和园内,大量经营古旧钟表、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

(6) 清华轩工艺品商店

位于颐和园内,经营瓷器、杂项等文物监管物品。

(7) 北京东方明园古典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位于朝阳区左家庄 110 路终点站院内,销售仿古家具,也有古旧家具等文物监管物品。

(8) 北京绣花张民间艺术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国贸商城 B1 层 NB140,本为市文物公司的代销点,没有收购资格和销售非代销品资格,但该公司非法收购并销售文物监管物品。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市场管理处处长)



北京地区博物馆的 分类分级管理

李学军

一、我市博物馆现状与分类 分级管理问题的提出

目前,经北京市博物馆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 118 座,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警察博物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及中国科技馆二期工程、中华民族博物院南园已相继落成开放,中国邮票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的新馆建设也正在加紧进行之中。“十五”期间,北京地区还将新建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中国汽车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新馆等五座大型博物馆。此外,许多行业也正在筹建本行业的博物馆,如中国印钞造币博物馆、中国铁路博物馆、北京城建档案馆、IT 博物馆等,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五四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四合院博物馆也处于积极筹备之中。与此同时,申请开办民办博物馆的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 2001 年就批准注册了睦明唐公司的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著名画家袁熙坤先生的金台艺术馆和李伟先生的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三家民办馆。华尔森集团的华尔森艺术馆、睿雅轩公司的外国艺术博物馆等也正在积极申办之中。由此可见,博物馆事业在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已呈现出蒸蒸日

上的可喜局面,它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众在物质生活逐步丰富的今天,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必将刺激人们对精神世界的需求。因此,高水准的新型博物馆的建立,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迫切需要,更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内涵的深刻体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一方面,目前本市博物馆的数量虽居全国前列,但在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由于博物馆隶属关系复杂,软硬件设施及内部管理水平相差悬殊,致使现有博物馆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管理水平的博物馆更是寥寥无几。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博物馆内部管理、文物保护科技水平、现代化展陈手段、文物修复与复制、讲解服务水平及旅游纪念品开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仍处于相对传统和落后的阶段。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播者,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市博物馆的水平应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相称。因此,要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现有博物馆和新建馆的整体水平和质量,就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思路对博物馆行业进行宏观层面的管理,以管理促发展。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原本铁定“吃皇粮”的博物馆也已面临着事业单位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作中的惰性严重阻碍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使许多博物馆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与生命力,工作长期徘徊不前。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博物馆内部进行改革之外,还需要管理部门针对新的形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促进博物馆形成竞争向上发展的管理机制。因此,打破原有的行政级别界线,建立新型的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体系,以激发博物馆的活力与创造力,从而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便是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实行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的目的所在。目前,我国已在诸如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等许多行业实行了分级管理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我们博物馆界值得借鉴的好方式。

二、以行政级别划分博物馆等级 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至今,我国尚未出台全国性的《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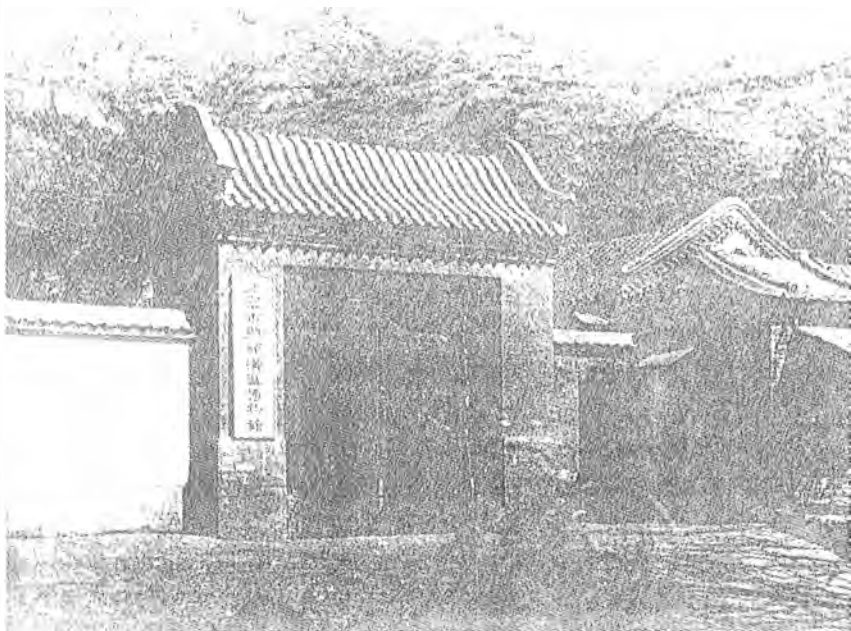
法》,更没有在博物馆系统中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因此没有能够体现博物馆性质、任务和自身特点的博物馆分类分级标准。自建国以来,国有博物馆的分级一直是沿袭套用行政主管部门级别的作法,其人事制度也是使用行政级别。在实际工作中,博物馆业务主管部门通常做法也是根据博物馆同其上级单位的隶属关系,将博物馆划分为中央级、省市级、区县级三个层次,以区别对待。北京市目前在博物馆行业的管理中就是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博物馆进行区分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趋势,更不能适应目前我国在各行各业逐步推进的体制改革的需要。根据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基本方针,我国将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用人制度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同时,北京在实行博物馆登记注册制度以来,在原有国立博物馆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各大企业集团主办的行业博物馆、民办公助式博物馆及股份制的博物馆,更出现了一批以私人名义注册的民办博物馆,且有迅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必将将是国立博物馆增势放缓,而行业馆、民办馆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及藏品、研究方面的优势获得迅猛发展。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如果按照以前的行政级别来区分、对待博物馆,必将难以对各类博物馆和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博物馆实行有效的管理,这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行政级别与博物馆真实状况间的矛盾已日益突出。目前,北京市现有博物馆的规模、质量、水平与其所拥有的行政级别并不一定相称,且相同行政级别的博物馆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单就馆舍面积一项标准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中央级博物馆中既有故宫博物馆这样的大型馆(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又有梅兰芳纪念馆这样的小型馆(建筑面积 499 平方米);区县级馆中不但包含中国长城馆(建筑面积 4200 平方米)、明十三陵博物馆这样的大型馆,又包



括上宅(建筑面积1284平方米)、山戎这样的小型馆;民办公助馆中既有中华民族博物院这样的大型馆,也有炎黄艺术馆这样的小型馆,但它们又都无相应的行政级别;而抗战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具备中央级博物馆的水平,但行政级别只是省市级。由此可以想见,如果主管部门以中央级博物



馆的工作要求(如故宫、革历博)去对待梅兰芳纪念馆显然是不客观的,而以区县级博物馆的标准要求明十三陵博物馆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长此以往,不但会打击某些博物馆的积极性,同时会人为造成某些博物馆在工作上的停滞不前,更无从对那些无行政级别的博物馆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

实践证明,套用行政级别来区分、对待博物馆已明显不符合现今博物馆的自身特点和运行规律,更不利于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因此,作为博物馆行业的主管部门,应尽快适应新的形势,研究制定出既符合当今博物馆性质、任务和特点,又能充分体现博物馆工作质量和真实水平,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新的制度将彻底抛弃博物馆固有的行政级别,以博物馆自身的软硬件条件及工作水平为依据,不论是中央馆还是区县馆,只要达到某类某级馆的标准,就可享有相应的级别及优惠政策,从而打破原有行政级别的界限,鼓励博物馆形成奋发向上的竞争机制。它的实施也将成为博物馆进行事业单位制度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

三、实行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的意义

1. 实行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并大力发展博物馆文化,在这个体系中,既要有历史的,又要有现代的;既要有全国性的,又要有地方性的;既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又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既要有综合的,又要有专业的,还要反映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同时,在这个体系中,应以国立博物馆为主体的基础上,支持鼓励集体所有制、民办性质和行业性质博物馆的发展。实践证明: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已不再适用,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以更有效地协调、管理博物馆的发展,规范博物馆的业务工作。

2. 实行博物馆的分类分级,有利于对各种不同性质的博物馆进行准确定位。按照统一的分类分级标准实行行业管理,将不会出现以往依据其行政级别而不顾其自身实际行事的局面。在依分类分级标准对现有博物馆进行定位后,便可针对各级博物馆间的不同与差距,在管理上予以区别对待并采

取不同的对策,从而使不同博物馆的自身特点与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准确的定位还将有利于博物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开展。

3. 实行博物馆分类分级制度,有利于区别情况,制定执行相应政策。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与政策上的扶植将日益增大。今后将逐步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同时就会出现扶植政策向哪类或哪级博物馆倾斜的问题。而实行了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后,管理部门就可依据实际情况,对基础好的馆提出更高要求,对基础差的馆给予相应的扶植,并为将来不同级别的博物馆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奠定基础。此外,分级标准的确定还将利于针对不同性质、内容的博物馆制定相应的审批、管理规范条件,使博物馆工作从开始便走上正规化道路,具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建设标准。

4. 实行博物馆分类分级制度,将有利于博物馆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内容便是引入竞争机制,这对于我市博物馆行业当前面临的事业单位改革尤为重要。博物馆实行分类分级管理,按照统一的分级标准推行定级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博物馆工作者加强博物馆自身建设的积极性。目前,博物馆受现有行政级别的制约,由于没有一种向上追求的目标,一些博物馆的工作普遍处于维持现状的水平上。而在推行定级制度后,将有利于打破这种静态局面,变静态为动态,通过努力符合等级标准则上,不符合等级标准的则下。这种机制上的改变,不但可使一些博物馆改变落后面貌,且有利于促进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

5. 实行博物馆分类分级制度,有利于提高博物馆的整体水平。在制定了统一的博物馆分级标准后,可通过对现有博物馆定级的办法,在博物馆界引入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推动博物馆事业向前发展;依据标准对博物馆的软硬件及业务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规范其各项工作,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对于社会可起到推出精品博物

馆的作用,逐步树立博物馆的品牌意识,通过定级使那些已具备相当水平的博物馆享有相应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博物馆的定级还可以对那些达不到定级标准的博物馆予以清理甚至淘汰,使有限的资金用于扶持有发展前途的博物馆,从而达到提高博物馆整体水平的目的。

四、博物馆的类别划分标准

北京地区博物馆众多,情况复杂,要实现博物馆的分级管理,必须建立在对现有博物馆进行分类的基础之上。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博物馆的不同类别决定了其展示内容及馆舍、藏品等基础条件相差悬殊,而只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博物馆才具有可比性,才有制定统一的分级标准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出于保护多数博物馆的积极性,如果不对博物馆进行分类,将可能出现某一类博物馆不论它工作多么努力,但由于其基础条件的限制,也永远不可能享受更高一级博物馆政策待遇的局面,那么博物馆的分级就将仍是停留在过去一般意义的大、中、小层次上,这样的分级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因此,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级管理可以改变直接定级所产生的缺陷。

谈到博物馆的分类,在我国博物馆界目前一直没有标准的博物馆分类方法,只是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一些约定俗成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博物馆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与以往相比无论是从内容到运行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博物馆分类办法已不再适应当今博物馆的现状。

基于以上原因,为使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具有可操作性,在对博物馆进行分类时应特别注意结合北京市博物馆的实际情况,且博物馆的分类不宜过多。笔者认为根据博物馆的性质及展示内容的不同可将博物馆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综合历史类(含军事)——特指以展示中国通史、断代史、军事革命史、某一

特定历史事件及以历史为主线的部分专题类博物馆、纪念馆等。特别是那些能够综合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社会内容的博物馆,及反映本地区历史的综合性地志类博物馆。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昌平区博物馆、密云县博物馆等。

第二类,科技自然类——特指以展示科技发展史、当代高新科技成果、揭示科技原理、中国自然资源、古今生物生态世界、揭示自然奥秘及代表古代科技文明的遗址遗存等内容的博物馆、陈列馆。如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航天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等。

第三类,古建遗址类(含部分景点)——特指以展示现存古代建筑原貌及其历史沿革、古代宫殿、墓葬等文化遗址为主要内容、具有部分旅游景点特征的博物馆。如明十三陵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大觉寺、正阳门、团城、白塔寺等;

第四类,名人故居类——特指为纪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作出巨大贡献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各类知名人士、以名人故居为依托建立的展示名人生平事迹的纪念馆、陈列馆。如北京鲁迅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茅盾故居等。

第五类,文化艺术类(含民族民俗宗教)——特指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传统工艺、民族民俗风情、宗教艺术及各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博物馆、陈列馆等。如中国工艺美术馆、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国际友谊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

以上分类是笔者结合实际工作所形成的粗略设想,在具体操作中可灵活掌握,如有性质较为模糊的博物馆,可根据本馆实际情况选择最为贴切的类别。

五、同一类别博物馆内级别的划分依据

在对博物馆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每类博物馆进行分级,依据不同级别进行分级管理,不同级别的博物馆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每类博物馆划分为三级,其中一级为最高,综合当前博物馆的各项工作,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出发考虑划分标准的依据,从而制定出每一类别内各级博物馆的量化标准:

1. 博物馆藏品总数及一般文物、珍贵文物所占比例。藏品是博物馆生存的基础,没有藏品博物馆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2. 博物馆占地及建筑的所有权,博物馆的占地面积及展厅所占比例。

3. 正式编制工作人员总数及中级以上职称、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人才是事业发展的保证。

4. 博物馆各服务部门、业务部门设置是否齐全。如一级博物馆应拥有社会教育部、保管征集部、展览陈列部、科研工作部、综合办公室(行政、后勤、人事、财会、保卫)、文物鉴定及修复部门、拥有独立发掘资格的考古队、纪念品服务部、资料查阅室等齐全的机构,并可进一步细化到每一部门所设置的岗位情况,从而保证其博物馆功能的发挥。

5. 博物馆各硬件设施是否齐全。如博物馆配套设施应包括文物库房、活动室、报告厅、资料中心、防火防盗系统、取暖空调设备、录像放映、电脑触摸屏等;观众服务设施如厕所、垃圾箱、休息座椅、中英文说明牌、指示牌、中英文对照的博物馆简介、具有本博物馆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展厅语音导览设备、残疾人专用车及通道等。硬件设施标志着博物馆的服务水平。

6.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及每年举办的临时展览、巡回展览和外展数量。该项目体现了博物馆的重要工作成绩。

7. 省市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及承担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的数量及成果。

8. 博物馆对社会的开放时间。

9. 博物馆历年平均年度观众流量。观众量的多少是社会对该博物馆是否认可的重要标志。

10. 每年新增文物数量(珍贵文物与一般文物要有适当的比例)。这项可保证其事业的不断发展。

11. 该博物馆在此类博物馆中的地位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这项标准是无法量化的,但却是社会对博物馆的一个综合评价指数,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博物馆在社会上的定位。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以以上几点内容为依据,对不同类别中的各级博物馆制定具体的量化划分标准,从而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级标准。这一标准的最终确定需要博物馆界专家的共同努力。

六、实现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的工作程序

在制定定级标准的同时,还应制定与其配套的推行办法,如参与分类分级博物馆的范围、博物馆的申请材料、专家评审工作、主管部门的核定程序以及定级后的标识牌匾等。实现博物馆的分类分级工作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1. 制定并公布博物馆分类分级标准,设计博物馆申报材料表;

2. 各博物馆根据博物馆分类分级标准,对照博物馆自身条件申报相应的类别与级别;

3. 主管部门组织博物馆专家以标准为依据对上报的博物馆进行评审工作;

4. 行业主管部门核定确认博物馆的级别并通知博物馆;

5. 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对社会公布并发放定级标识;

6. 根据博物馆的工作实绩,对已定级博

物馆每隔一定时期进行检查与复核;

7. 以级别划分为依据争取或制定出台相应的国家优惠政策,为博物馆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博物馆的分类分级管理是一种动态的管理制定,所定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定级标准中所规定的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变动、特别是工作的成果而发生变化。如果某一级博物馆的工作在一定的时间内达不到相应的要求,该馆的级别就应降下来。另一方面,在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后,在我市的博物馆中必然会有一部分博物馆达不到最低一级所规定的标准,对于这样的博物馆,可先不予定级,要求其在一定时期内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达到定级标准。这对改变我市博物馆的面貌,提高博物馆的水平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制定博物馆分级分类标准,应首先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以规范各种符合基本条件的博物馆为对象,并要适用于所有的已注册及申请注册的各种博物馆性质单位。加强博物馆的宏观管理,促进博物馆协调、健康发展一直是我市博物馆主管部门努力的方向。此前,北京市在全国率先于2001年1月1日颁布实施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使我们对全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有了依据,不仅如此,行业主管部门已计划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博物馆管理工作、业务工作规范,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结合博物馆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实行博物馆行业的分类分级管理。结合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建立博物馆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将是一项系统工程,主管部门应把它作为规范博物馆工作,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予以认真研究。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干部)

大慧寺



——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的建设构想

王 晓 军

博物馆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适应社会需要,以多种形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在北京众多的博物馆中,以原有文物建筑和古代建筑遗址为基址,根据其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创建的专题博物馆,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万寿寺——北京艺术博物馆、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的建设,既充分保护利用了旧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又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特质,是博物馆建设的一种有益的形式。

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慧寺,创建于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是一处拥有近500年历史的著名古迹,虽经历史风霜剥蚀,仅余一座大悲宝殿,淹没在杂乱的现代建筑群中,已难见往昔非凡的气势、迷人的风采,但其曾拥有过的辉煌历史,仍蕴藏着的艺术宝藏,为今天以此建设北京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大慧寺的博物馆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深厚的历史人文环境是其建设博物馆的基础

明清两朝时期的北京地区,因统治者对佛教等宗教的崇信,特别是明代,皇家崇佛活动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永乐、成化、正统、万历等朝皇帝,都对佛教极为尊崇,大规模地建寺修庙,举办各种佛事活动。清朝前期,国力强盛,佛教盛行,对许多明朝著名寺宇重修和扩建,使之香火绵延不绝,并不断扩大。

宦官制度在我国出现很早,至明代进入了自身发展历程中的鼎盛时期。宦官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其社会地位却依然很低下。据《酌中志》记载:“宦官年老病者,多退居京城内外诸寺庙,止给本身柴米、冬衣、靴料,以终天年。”因此,也就促使其得势之时,佞佛之风兴盛,纷纷在都城之外择地建庙,以便退隐之后,颐养天年。

北京西郊有“都下宝地”、“神皋佳丽”之

称,是自然风光、地理环境优美的上佳之地。明《宛署杂记》载:“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第、赐地。环城百里之间,王侯、妃主、勋戚、中贵护坟香火等地,尺寸殆尽。”长河沿岸,西山之侧有据可查的寺庙园林,多达200余座。现尚有广通寺、极乐寺、真觉寺、万寿寺、大钟寺、法华寺、延庆寺、双林寺以及白石桥、广源闸、乐善园、钓鱼台等古迹,或旧貌依然留存,或尚有遗迹可寻。使人们从此中窥到昔日大慧寺所处历史环境、宗教文化兴盛之一斑。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事变迁,曾经香火旺盛的寺庙,虽多已湮废,但保留下来的万寿寺、真觉寺、觉生寺等名胜古迹,在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重视下,已逐步得到恢复和保护,并辟为专题博物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并让我们深深体味着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以大慧寺为核心建设博物馆,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环境基础。

二、优越的现实区位关系为大慧寺建设博物馆提供了契机

历史赋予大慧寺处于深厚的历史人文环境,新时代大慧寺所处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更为其复兴提供了契机。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批准加快建设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这无疑为中关村地区的发展,指明了高水平、高起点的发展方向,并将极大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这里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最活跃,对世界科技发展感知最敏锐,孕育当今中国最先进生产力、最富于竞争力的区域。然而,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区、技术区、科技区的发展,其社会文化也会同时得到发展。而这一文化应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应在古今交融、深厚、广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创新形成。

在这里现存的反映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底蕴的人类文化遗产——大慧寺,静寂而巍

然地挺立了几百年,预示着人类文明发展从古到今延绵不绝。她的存在使充满活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高科技园区更加厚重,使人们在感受到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信息网络等前沿学科,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同时,获取到历史文化带给我们精神生活的享受,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融、相互映衬。

大慧寺所处的位置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中心区内,距中关村大街仅300米左右,钢铁研究总院、国家海洋预报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国农科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环列其左右。居住人口密集,且文化素质较高,具有强烈的文化需求意识,足以构成博物馆最基本的固定的观众群体。

在大慧寺所辐射的区域内,北有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建设中的海淀博物馆,南有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西有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等,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博物馆链接体系,大慧寺——北京雕塑艺术博物馆的建设,将使这一链接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充实,整体综合效应空间更加广阔。

更重要的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中,文化建设占有重要地位的直接体现是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事业投资方面。该地区的经济腾飞,使众多实力雄厚的高科技企业,为文化设施的建设,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援成为可能。也为其建设借助中关村的高科技技术手段,先进的理念,将继承与创新统一,探索一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提供了契机。

三、浓郁的艺术特色是大慧寺建设博物馆的有利条件

浓郁的艺术特色融于深厚的历史人文环境、优越的现实区位关系之中,是其博物馆建设的有利条件。

据清纳兰性德《绿水亭杂识》载:“明正德癸酉,司礼监太监张雄建寺于宛平县香山乡畏吾村,赐额大慧,并护敕于碑。……嘉

靖中,太监麦某提督东厂,于其左增盖佑圣观,于是合寺观计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亩”。可见大慧寺原有规模之宏大。在近500年后的今天,大慧寺屡经磨难,仅存这一座大悲宝殿及殿内的彩塑、壁画,让人遥想着其当年之胜景,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建筑形式、雕塑绘画手法,提供重要的实例。而这之中,尤以其纯正无异的彩塑艺术水平为高。

对大慧寺的28尊彩绘塑像,史籍记述虽匮乏简单,现代文章中对塑像的内容、造型特征、艺术手法等,已多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录。仅从中国雕塑发展史角度,对其定位为古代雕塑博物馆,略作说明。

中国寺庙泥塑造像兴起,具有悠久的历史。梁思成《中国雕塑史》认为:“汉代雕像祭祀之风盖必盛行,惜尊貌多木雕泥塑,今无复有存者”,可见其历史之久远。之后经历魏晋、唐达到高峰,宋元又有发展而又衰落,明清复兴的发展历史。北京是一处少有泥塑造像寺庙,更少见佳作留存地区。大慧寺的明代木胎彩绘泥塑的出现并能够保留至今,更显得弥足珍贵。

大慧寺的雕塑主要以一尊高大的千手观音立像及两尊胁侍菩萨为主体,环衬二十八部众,组合成一组完整的宗教人物群体。

千手观音立像,原是一尊高5丈的铜佛,日本侵华时期被毁。同时期又补塑了这尊木胎沥粉描绘的千手观音泥塑像,及两尊胁侍菩萨。这些塑像制作工艺较为粗糙,但其形象尚显庄严端正,高大挺拔,也是北京地区现存较完整的一组木胎泥塑。而环列于大殿东、北、西三面墙体前的28尊彩色妆塑泥塑造像,在众多的史籍中,却难以查找到对其有详细确切的记述。50年代文物普查时,确定其为明代原作。更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曾有过的三次重修,只对塑像彩绘有局部修补,未“重塑金身”而遮蔽去明代原有的精彩妆塑,从而更使其珍贵。

大慧寺的28尊彩绘塑像,气势雄伟,绘塑精美,造型奇伟罕见。有些与其他寺庙或壁画的造像特征相同,但大部分则让人感觉

陌生,特别是28尊彩塑的组合在我国佛像雕塑中确无实例可援。所采用的写实想象和象征为一体的创作手法,塑造出的物像,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真实的生命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塑像色彩浓重的妆塑,以朱砂、黄丹、石青、石绿、赭石等天然矿石原料为主,并大量采用赤金、白银,从而形成富丽辉煌、金彩璀璨、富有装饰美的艺术效果。因此,大慧寺的彩塑是明代雕塑的上乘之作,在我国雕塑艺术发展中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现在因种种因素制约,大慧寺彩塑未能得到其应有的地位,已尘封蒙垢半个世纪,而一旦拂去其身上长久岁月的积尘,展现出的将是使人眩目惊诧的古代文化异彩。因此,以其为依托建设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的。

从大慧寺所具有的历史人文环境,到现实区位关系,以及其自身所独有的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分析,将其发展定位为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是充分发挥其文物价值的最佳选择。

然而,一个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将大慧寺建设成为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是有着多方面的优势条件,但同时也会受到多种不利因素的制约。我们只有认真分析其所拥有的优势条件,同时客观地分析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才能使其开发利用、博物馆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从大慧寺目前现状分析,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不利因素:

1. 大慧寺主体大悲殿需要进一步保护性修缮。殿内雕塑及壁画长期未得到维修,已出现部分自然损坏,而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进行保护,以现有条件无法达到最佳展陈效果,且面临更多的光辐射、尘埃、水气的侵蚀,这是大慧寺文物保护需解决的中心课题。

2. 长期以来,未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保护及利用的规划,以使其处于一个合理有序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文物保护范围内,临时建筑无序扩张;周边建设控制地带,现代建筑不断突破,严重破坏了其历史环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慧寺的明代雕塑

3. 历史遗留的问题严重困扰着大慧寺原有格局的建筑复建。原建筑基址上建于六七十年代的现代建筑,面积达1500余平方米,拆迁、整治、复建,将是大慧寺博物馆建设的主要任务。

4. 大慧寺原有格局范围内,可利用的场地建筑空间狭小,文物保护、博物馆展陈、管理服务设施综合分区困难,使用空间极易互相干扰,发展余地不足。

在综合分析大慧寺博物馆建设中的有利条件及不利因素等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有利于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建设的合理规划,从而使其能够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博物馆,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积极对现存的惟一古建筑大悲殿,进行全面的保护修缮,以保持其文物价值的完整性。

大悲殿是集明代雕塑、壁画、建筑于一身的珍贵文物整体,是集中体现大慧寺历史价值的实物,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未来博物馆中的灵魂,因此应采取科学的修缮保护方案,在严格保护文物原貌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保护。其具体保护措施,应遵守文物法规及文物建筑修缮规范,充分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观念、技术、手段,从而获取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满足参观需要的最佳形式,使其文物价值能够在保护中得到体现。

其次,要加强对大慧寺周边环境的控制和整治,以期最大限度地改善其生存的人文环境。

根据《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要求,大慧寺除其规划有文物保护范围外,并分别规划有一类、三类、四类建设控制地带,对其周边现代建筑建设进行控制。但因多种原因,原状已多有突破,从而使其整体景观环境受到影响,今后应加以严格控制。对国家海洋预报中心、钢铁研究总院已建办公楼、宿舍楼,应尽可能地使其风貌、外观与大慧寺相协调,使大慧寺处于较为合理的生存空间。同时,有计划地对文物保护范围内,影响大慧寺整

体格局中,需复建的原有建筑基址上的现代建筑进行拆除。在充分论证及考古勘探,忠实再现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复建其原有建筑,并利用复建建筑进行博物馆建设。

第三,基于大慧寺可利用场地空间狭小的因素,对其进行区划,以使其使用空间合理。

根据其未来发展需要及其原状的情况,初步设想将其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综合展览区、办公服务区三个功能区域。

核心保护区:即以大悲宝殿为核心,这是大慧寺文物精华体现之所,为研究、欣赏明代建筑、绘画,特别是雕塑艺术,提供了重要而罕见的实例,本身即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展品,是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主题的体现。其文物魅力将使观众充分感悟到古代雕塑艺术的博大精深。

专题展览区:此区以复建的东、西配殿、正殿为主体。该区域应以大慧寺的历史沿革陈列展、(中国)北京古代雕塑艺术发展概况展为主要内容,辅之以(世界)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简况介绍等内容。展览有选择地采用征集到的古代雕塑原件,部分有特色的雕塑文物复制品及资料、图片,作为主要展品,同时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展示手段,使观众能够对北京、中国以至世界雕塑艺术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办公服务区:此区以山门及其两侧建筑,大悲殿后部适度扩展建设的附属用房为主,其建设内容及规模应严格加以控制,以满足办公服务的最低需求为宜。而以创收为目的的服务设施,应予杜绝。文物修复、库房可考虑以地下为好。

根据大慧寺的历史人文环境、区位关系、艺术特色,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建立起的博物馆,将是一座具有研究、收藏、展示、教育功能,具有历史研究、建筑、雕塑、绘画等学科考察及借鉴功能,具有展示海淀文物保护事业成就,提高文物保护工作地位示范功能,具有对外交流功能的专题性艺术博物馆。

本文撰写参考了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大慧寺保护和复建的规划方案》,特此说明。

(作者为海淀区文物管理所所长)

编者按 北京市文物局集北京文博单位馆藏文物之大成,编辑出版大型《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图录。该图录是从北京文博单位 200 余万件文物中精选而成,分石雕、石刻、陶瓷(上、下)、玉器、青铜器、古钟、佛造像(上、下)、金银器、书法、绘画、古籍善本、织绣、家具、工艺品等 14 个门类 17 卷。每卷前各有一篇与本卷分类一致的专题论文,论述该类文物的地方特色和历史艺术价值。全部 14 篇论文汇总即为北京文博单位馆藏文物之总论,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本刊特将《北京文物精萃大系》所有 14 篇专题论文分期刊出,供从事北京历史文物研究人员参阅。

北 京 碑 帖 收 藏 概 述

张 展

碑帖作为文物藏品门类之一,最初源于唐而兴盛于宋。碑帖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在文物藏品中是很独特的一类。

碑,起源于西周,但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文字碑。秦代出现刻石,如著名的《琅琊台刻石》,古人称之为碣。另将长方形的刻石称为碑。秦始皇刻石纪功,开树立碑碣的风气,东汉以后,碑碣渐多,有碑颂、碑记、又有墓碑。

碑拓源于金石碑刻,起源于唐,为收藏名碑字迹而用。宋代以后,碑拓艺术被刻帖替代,专以书迹为重点而刻石以传世的拓本为帖,通俗地讲类似于今日的影印。现存的碑拓含碑帖和刻帖两大系列。

一、刻石、碑拓的演变

1. 石碑的种类

刻石和石碑是产生拓本的原始物品,是古代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时至今日仍是重要的文物,更是碑拓的基础。

带文字的刻石起源于何时不很确切,相传夏商周刻石如《岫嵴碑》、《比干墓字》、《坛山刻石》等均是后人附会摹刻。确实可信的三代石刻只有近年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石簋上的字;春秋战国时秦的石鼓文;中山国《河光石刻》字等。秦始皇东巡刻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共有 7 块:《峰山》、《泰山》、《之罘》、《琅琊》、《东观》、《碣石》、《会稽》,今仅存《琅琊山刻石》。

西汉时期是否有文字石碑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有少量传世西汉带字刻石,如《群臣上寿刻石》,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 158 年)刻制,是目前已知西汉最早的带字刻石。

东汉开始,碑刻大量出现。今日所见碑

的形制是东汉时期成熟的。东汉末年、西晋时期出现了买地券、墓志等刻石(砖)文字。

碑

先秦已出现,其形制沿袭 2000 年不变。由碑额、碑身、碑座组成。

《说文》:“碑,坚石也。”碑之初名始于周代,其义有三:①指宫寝庠序中庭测日景之石。《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其材宫庙以石。”②庙中系牲之石。《仪礼·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王肃云:以纆贯碑中。”③墓所下棺之大木,形如碑。《仪礼·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绋绕。”《丧大记》:“凡封用绋,去碑负引。”郑注:“树于圻之前后,使挽者皆击绋而绕,要负纆舒纵之,被夫脱也。用绋去碑者,谓纵下之时也。”

由此可见早期碑的形制与后来碑的形制是不同的。近人马衡考证:刻文于碑是汉以后的事,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登泰山,刻石纪功,只称“刻石”,未尝称“碑”。《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量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纆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量。题额刻于穿上量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量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刘熙《释名》:“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碑的正面谓“阳”,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亦用以刻题名。也有碑阳、碑阴均刻碑文的,有的

碑文过长,从碑阳至碑侧、碑阴旋转而刻的。碑首称“额”,为标题,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龙等,甚精美;亦有质朴者,只作圭首状。

汉以后碑额多为蟠龙碑座(碑趺),汉以前为长方形,上不雕花纹。唐时葬令云:“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明清时又有须弥座,上有浮雕花纹,是从佛座演变而来。

碑身刻字从东汉以后普及。按照文字内容,碑的种类有:墓碑,如汉代《袁安碑》、《鲜于璜碑》等;功德碑,如东汉《裴岑碑》、唐《述圣碑》等;庙碑,如北魏《晖福寺碑》、唐《重修东陵圣母宫碑》等;诏敕文牒碑,如唐太宗《少林寺赐田敕》、宋太祖《戒石铭》、元代《圣旨碑》,文牒如北宋《中书门下牒永兴军》等;界碑,如唐永泰二年丰乐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岩寺四至记》等;杂碑,如颂碑、书目碑等。

碣

汉以前碑碣混淆,界线不清,如《孔谦碣》实则为碑。故碑碣之分是汉代以后的事,但也有例外,如唐《潘尊师碣》也是一个大碑,但碣首自称:“唐默仙中岳休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

《说文》:“碣,特立之石。”古人称长形刻石为“碑”,称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刻石为“碣”。《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纪《琅琊台刻石》之尺寸曰:“石高工部营造尺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纪国山刻石形状曰:“土人目曰圜碑,以石圆八出如米廩云。”清阮元《两浙金石志》纪禹陵窆石曰:“高六尺,周广四尺,顶上有穿,状如称锤。”即属碣。再如石鼓亦属此类形制,故亦称“猎碣”。自碑制盛行后,碣之形制渐废。然后人碑、碣名称常混用。

现称碣者,以秦始皇刻石为典型。

墓志

东汉末,曹操严禁立碑。晋武帝时诏

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魏晋之后,经北魏孝文帝改革,碑才又重新兴盛。魏晋禁碑,人们为祭悼亡者,于是出现了墓志。

墓志是埋在墓内的墓碑。上面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墓志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有四种年代:西汉、东汉、魏晋、南宋元嘉年等。现知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为最早。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形墓碑,但都不自称为志,如1965年北京八宝山出土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华芳墓志,首题为“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也属墓志范围。

石经

将儒家经典刻在石上以传世,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史称《熹平石经》。其他较著名的有《正始石经》(240~249年)、《唐开成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等。至今,唐《开成石经》存西安,清十三经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余均残缺。

摩崖石刻

指刻有文字的山崖、石壁之天然石。前人常于需要叙功、纪事的地方,就地刻石,不另立碑。由于摩崖往往是崇山峻岭之间,山巅断崖之上,故不易受人造的破坏,而往往受陵谷、风雨侵蚀的损坏。清叶昌炽考证,远在商、周时代已有摩崖出现。近人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汉以后著名之摩崖有永平六年《鄱开褒斜道记》,建初六年《昆弟六人造冢地记》,建和六年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李君《通阁道记》,建宁四年李翕《西狭颂》,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鄱阁颂》,熹平二年《杨淮表记》等。后人取其易成,故又往往于崖壁

间刻经造像、诗文题名等。

刻在石上的佛教经典有刻在摩崖、石碑、幢等形式。现存石刻佛经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而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著名。

经幢

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一般作八楞柱状,也有六楞、四楞或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盖大于柱径,上刻有垂幔、图案等。柱身刻经文和佛像等。经幢形制甚多,名称也多,如称“石柱”、“八楞碑”、“八佛头”、“宝幢”、“花幢”等。“幢”字亦有作“幢”等。经幢高者逾寻丈,小者不过径尺。经幢上文字一般为楷书,隶书、篆书甚为难得。

其他类别还有画像石墓、题咏题名等类石刻。

今日所称碑刻是广义的范围,从最初没有文字系棺用的竖石,发展到后世的文字碑、造像等。

2. 碑及碑拓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著作《语石》中说:“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统呼为碑,及墨而拓之纸,则又统称为帖,虽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亦有人主张碑拓装裱后仍称为碑,造像与墓志装裱后仍称造像与墓志,名称是以拓本而定,不能因为是白纸黑地拓本而称帖。碑拓与后人所称帖很难有严格界线。碑帖过去只是供书法研习,后来,人们为了碑帖的收藏,区别其价值依据碑帖字迹的缺损完好,字口的变化来鉴别某一碑帖的拓制年代及收藏价值。研究者根据某帖多某笔、某帖多某字即为古拓,反之为近拓。也有一些收藏者在自己收藏的碑拓上题跋考据,细考此物的年代真伪。

(1) 碑文书体的变化

金石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文字的发展演变。碑作为一个历史的载体,记录了汉以后文字演变的历史及文字的书法艺术。

战国时期的石鼓文是目前最早的石刻

文字,字体介于大篆小篆之间,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向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过渡。

秦始皇统一文字,命丞相李斯创小篆体。峰山、泰山、琅琊山刻石为代表。

西汉继承秦代书法,但逐渐变篆为隶。考古出土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等汉墓帛书、竹简均为此书法。汉代碑文以隶书为主,汉代的书法艺术,清代书法家王澐云:“隶法以汉代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其代表作品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鲜于璜碑》、《张迁碑》、《校官碑》、《三老忌日碑》等。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隶书处于演变阶段。此时隶书尚无撇捺,如《扬量买山地记》、《庶孝禹碑》等。东汉顺帝以后的隶书,方才彻底脱尽西汉含篆的笔划,为汉隶鼎盛之期。其书法上承秦篆,下启魏晋隋唐正楷。

汉隶书法笔画刚健又不失阴柔,方劲沉着、古朴厚重。至东汉末年,已走向平板刻画,失去汉隶之神韵。

《谷朗碑》、《司马芳残碑》等为半隶半楷之字体,是由隶书演变为楷书的开始。

西晋始,隶书更为平板刻画,如今日勾填之字,如《郭休碑》、《孙夫人碑》、《辟雍碑》等。东晋南迁,书法由隶变楷渐多,达到高峰。南京出土东晋墓志,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等,此时,书法名家王羲之、王献之等多为楷与行草。

南北朝时期,行楷成熟。南朝楷书稍早于北朝。南朝到宋时期《爨龙颜碑》是楷书石刻的最早作品,而梁代《肖憺碑》为书法家贝义渊书,是成熟的楷书。北朝碑刻著名的有《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北魏太和以后,“魏碑”书体有《晖福寺碑》、《高庆碑》、《张猛龙碑》、《根法师碑》、《龙门二十品》等。

隶书演变为楷书之后,篆隶书体仍然存在。正式通用字体为楷书,篆书多用在碑额和墓志盖上的文字;有少数碑额、墓志盖用隶书、楷书。正文很少用篆书的。

隋代年代很短,《龙藏寺碑》、《曹植碑》及《苏孝慈》、《董美人》等墓志的碑文融南北

为一体,开唐书之先导。

唐朝的书法达到空前的高峰,真草隶篆四体具备,欧柳颜赵各领风骚,书法艺术臻于完善。

唐代碑刻众多,成为后世摹练书法的范本。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皇甫诞碑》、《九成宫碑》,褚遂良《伊阙佛龕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碑。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羲之书法,不但自摹,并提倡学习,亲书《晋祠铭》、《温泉铭》;唐高宗李治《万年宫》、《纪功颂碑》;武则天草书《昇仙太子碑》等均以身体力行。

唐以后,书体变化不大,碑刻的考据价值低于前代,宋以后帖学发展,形成新的门类。

(2) 碑拓的历史艺术价值

古之“树碑立传”,碑包括墓志,是很庄重的。

金石文物的历史比书籍久远,史料准确客观,可补史之缺,正史之误。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指出:“撰书、结额的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名亦往往书官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可以补阙。郡、县、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瞭于目验。关中碑志,凡书生卒,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于某县、某邨、某里之原,以证《雍录长安志》,无不吻合。推之它处,实有资于邑乘者多矣。至于订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孙名位,可补《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补《朔润表》。生卒之年月,可补《疑年录》。北朝造像寺记,可补《魏书·释老志》。《天棧纪功》、《天发神谶》之类,可补《符瑞志》。投龙、斋醮、五岳登封,可补《郊祀志》。汉之孔庙诸碑,魏之《受禅》、《尊号》,宋之道君《五礼》,可补《礼志》。唐之《令长新诫》、宋之《慎刑箴》、《戒石铭》,可补《刑法志》。古人诗集,凡有登览纪游之作,注家皆可以题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据为实录。举一反三,饒遗靡尽。”直至今日,历史学家经常大量引用碑志的原始资料。

但碑拓的价值更多地运用于艺术欣赏

和艺术收藏方面。

历史遗留的碑刻散存在全国,寻访不易,自宋代之后,碑刻被大量拓印,特别是一些名碑,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积累,碑拓本身又有了优劣和时期的历史艺术价值。

名碑名拓更是收藏的热门。明代吴门画派领袖文征明,把自己收藏的碑帖刊印成书,名《停云馆帖》。董其昌刻了《戏鸿堂帖》,两人收藏的碑帖有数百种,明代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后,明代文人学汉隶成风。

另一方面,文人书画家从古碑断碣中,刻意搜求新体,如金农、郑板桥从汉碑中创出了“漆书”和“六分半书”。乾嘉之后,古碑大量出土,在朴学领袖阮元提出学碑体的号召下,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赵之谦等大书家,接踵而生,从唐朝的碑刻中蜕变出新,形成乾嘉的“碑学中兴”。嘉庆十年成书的《金石萃编》共160卷,收录三代至辽金石刻1500种,是金石学史上的巨著。到了清末,碑刻学从金石学独立出来,单成一门。现在流传下来的金石学著作有1000多种。

碑帖中蕴含着丰富的书法营养,是几千年书法艺术的结晶,这些传统的书法艺术之美的沉淀,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碑帖收藏自宋代兴起,一直到民国,都是极珍贵的收藏品。中国社会历来由文人秉持,文人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志。因此,文字是文人的另一种生命形式,书法就成了文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帖的地位也就非常高。从收藏方面讲,家有一名帖,就可自冠收藏家。如乾隆皇帝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后,将书斋命名为“三希堂”。

对于古代碑拓的鉴别、收藏、整理,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碑帖的专著,自宋代始,以考据内容和书法为多,主要有清代王昶主编的《金石萃编》;民国初年方若著《校碑随笔》,专门考查字迹损坏情况,鉴定碑刻拓本时代。还有《集古求真》、《南村帖考》等书。

碑拓收藏的重点应以唐代以前的碑刻

为主。石鼓文是中国石刻艺术之祖,原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唐代初年在陕西出土,传有唐代拓本,今未见。现存有明安桂坡十鼓斋所藏三种北宋拓本。明初拓本,“城”之“城”字未损,明中叶拓本“黄帛”二字未损。

秦代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有宋代拓本。现存最多的是清嘉庆以来的十字本。

东汉是碑刻艺术的高峰,留下精品甚多。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体现了中国隶书发展的全貌。因此,收藏家和爱好者都尽量买碑帖而不是刻帖。

汉碑年代久远,可大部分碑石都是清代乾嘉以后出土的,拓本年代也都是这一时期以后的,也有一些著名的碑出土较早,曾有宋拓本传世,现在能见到的以明清拓本多,如《乙瑛碑》、《张迁碑》等,均为汉代最著名的碑刻作品。

东汉晚期至三国禁碑,这一时期的碑刻作品少,大碑不过十几件。现存《受禅表》、《孔羡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等。

由于禁碑,小碑开始多起来,主要是墓志。墓志的主要价值在于考古和史料,加之墓志多为博物馆收藏,拓本很少流传。

北魏碑刻多是明末以后出土,清乾隆以后的拓本居多。如《龙门二十品》所见最早的拓本为康熙时《扬大眼造像》。

宋代兴起金石考据学,以后拓本多起来,如唐《九成宫》、《多宝塔》、《圣教序》等都有宋拓本。

碑拓的辨伪及版本鉴定,主要从历史年代、地理、避讳、书体、书法及拓印、纸张、题跋、印章等方面入手综合考据。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其中清方若《校碑随笔》、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两书考订碑学十分详细,是基础著述。

今日碑拓收藏较几十年前乃至古代已有较大不同,古时为摹习书法,翻刻、造伪者很多,今日已大大减少。但因国家为保护文物,已禁止传拓古碑。有些人为了营利,翻刻名碑传拓出售,这类拓本一望可知,不具收藏价值。

二、帖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碑帖泛指所有碑碣墨拓和各种法帖。古代石刻有两大流：一为碑；二为帖。

碑是为某一事件人物专立的纪念石，文字或以纪事或以颂德，是一件不可移动的独一无二的一件文物。而帖是将碑文或图案拓下来，用以传习或欣赏收藏之用。

帖与碑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不同。

帖，《说文解字》释为“帛书也”。后泛指一般的笔札。五代以后，有人汇集名家书迹，摹刻于石板（或枣木版）上，锤拓以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帖。从帛书到刻帖以至于一切书写、摹刻、锤拓、影印文字，作为临摹书法的范本，装裱成册的都可称为帖。清以前有专门的帖学，专门研究法帖的源流、优劣、拓本的先后好坏，以及书迹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等。清代嘉庆、道光以前，书法崇尚法帖。清代金石学家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后，一般称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

碑帖的起源与发展是碑刻的起源发展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碑刻是一件地域性、时代性都很强的孤品，可对同一件金石文物反复锤拓千百年，同一件碑刻的拓本非常多，同一件碑刻的拓本的历史、艺术价值差别很大。故而，碑帖发展和碑刻发展的过程同源，但不同流。研究碑帖也需首先从碑刻入手。

碑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碑帖最初的用途就是供人临摹书法之用，因此传世碑帖都是名人书法。目前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孔子庙堂碑》，唐虞世南作，传为唐拓孤本。19世纪流落日本，现存于日本东京三井听冰阁。

东汉以后，书法受到社会的重视，“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事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祝嘉《书学史》），汉隶、魏碑、章草、正楷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家。东晋时期书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汉字书法发展看，魏晋是

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楷书和草书到魏晋时已臻成熟。两晋时，其草、行三体具备，是中国书法史上继汉代“隶变”之后又一巨大变革。钟繇、王羲之是这一时代的卓越代表，开辟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的真迹，如唐太宗爱好王羲之的行草书，把《兰亭序》模刻到玉版上，将拓本赏赐群臣。唐太宗命大臣与名书法家撰书碑文，数量巨大。书法到了唐代，不但诸体初备，而且法度严谨。例如，楷书在魏晋时已大体定型，而且达到很高水平，到唐代则十分成熟。初唐四杰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是代表人物。而颜真卿则是继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又一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有唐一代刚健雄强的书风。颜之楷书有特点、有个性，是盛唐的代表。而李邕、张旭、怀素则在行草、狂草上有重要突破，使中国书法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著名的西安碑林就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为保存唐代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等历代碑刻而兴建的。西安碑林收藏的唐代名碑中较著名的有：僧怀仁集王羲之书而刻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欧阳询书《皇甫诞碑》，褚遂良书《同册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史维则书《大智禅师碑》，李阳冰书《三坟记碑》等。

唐代的书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唐代的碑刻也非常发达。带动了碑帖的产生和发展。

帖是石刻的一类，虽然帖有木刻，但毕竟是少数。宋《淳化阁帖》，每册末尾年月下刻某某“摹勒上石”。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真迹，这种木刻或石刻的文字称为帖刻，而不是碑刻。

自唐宋后，文人士大夫为科举、上奏、应酬，都练帖，必须有一手好字。唐玄宗、宋徽宗等皇帝爱好写帖，帖学一门在唐宋两朝如日中天，异常兴盛。写帖、刻帖、集字刻碑成风。唐玄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得《兰亭序》

后置于座侧,朝夕观览,使得天下文人都去学王羲之的字,致使人们争相集王羲之字刻碑,有人统计有过23种王羲之字的刻石,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贞观时,僧人玄奘从印度取经返回长安,翻译佛教三藏要籍657部,唐太宗亲自作序表彰此事。今存四种唐代圣教序:(1)褚遂良楷书,称《雁塔圣教序》。(2)王行满楷书。(3)褚书临本。(4)《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人,善文好书,受长安诸寺委托入宫集王羲之字迹,计24年,集摹成此碑。唐时存王羲之书法尚多,但都存在宫中,此碑一出,书坛争相观摹。此碑也为后世保存了众多王羲之遗笔。

古代帖是专以文章、书法、墨迹为重,鉴赏者及临摹者则更偏注于翰墨的优劣和点划的微妙。而立碑则主要是记事传文,因此帖实际上属于艺术的范畴。

帖刻是南唐李昇所创。他看到历代墨迹日渐消亡,命徐铉将内宫珍藏的历代名人书法勾勒上石,拓印出来的拓本名为帖,以传百代。他后来废吴帝,自立为大齐,国号升元,后人便称其拓帖为《升元帖》。

宋以后,《升元帖》已不多见。目前传世最早的一部帖是北京淳化三年(992年)所刻的《淳化阁帖》。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重刻《升元帖》,并从秘阁中送出汉代张芝、崔瑗、魏晋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唐代颜、柳、欧和怀素等人的墨迹,摹勒于枣木板上,标曰《法帖》,又称《淳化阁帖》。

宋代刻帖十分流行,大型汇刻本不下10种。宋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命蔡京将内府藏墨摹刻上石名为《大观帖》。因《淳化阁帖》和《大观帖》汇集历代名家墨迹,故又称这类帖为丛帖。

临摹学习碑帖,整张拓本极不方便,于是将拓本剪装成册,既便于翻阅与临摹,又便于收藏,所以现在存世善本碑帖多都装裱成册。

元代刻帖极少,传世更少。

明代刻帖继承了宋代的传统,仍以刊刻

丛帖为主。早期所刻《东书堂帖》、《宝贤堂帖》和后来的《停云馆帖》、《真赏斋帖》、《余清斋帖》、《戏鸿堂帖》、《玉烟堂帖》、《快雪堂帖》等都是著名汇刻法帖。

明代的断代法帖较多,如《晴山堂帖》等都是专刻名人墨迹。个人法帖中有专刻苏轼、蔡襄书法的《雪浪斋帖》、《古香斋帖》;专刻董其昌书法的《来仲楼帖》等。

由于辽金元时期的多年战乱,古代碑帖亡佚很多,到明代,连宋刻丛帖都难寻见。明代文人就以刻帖传播碑迹。不少文人直接参与勾摹上石。如文征明父子勾摹的《真赏斋帖》,被誉为明刻第一帖。

清代刻帖前期以宫廷为主,据《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记载,宫廷镌刻的帖有百余种之多,大都是乾隆时所刻。最著名的是《三希堂法帖》,是以内府所藏历代书法名家作品选编而成,因内有乾隆帝特别喜欢、秘藏在养心殿三希堂内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件希世之宝,故取此名。《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是乾隆依据所谓宋太宗赐毕士安本为底本而刻。

清代民间刻帖也很盛行,早期的民间刻本大都是集历代名人书法的丛帖。《式古堂法帖》是卞永誉从其家藏的魏晋至宋元历代名家书迹中鉴选的。卞氏精于鉴赏,收藏丰富,选帖精良。又请当时名手黄元铨双勾、刘光旸镌刻,在当时所刻法帖中堪称一流。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标以家藏墨迹刻《秋碧堂法帖》,所收法书精良,镌刻亦十分精善。《翰香馆帖》为明末清初刻贴名手刘光旸自选自刻,其精致可想而知。总之,清代刻帖之风极盛,种类数量之多都大大超过前代。民国初年亦有两部帖,为《壮陶阁帖》和《蕴真堂帖》。此后由于影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就不再刻石传拓。

碑帖的书法价值和历史价值乃至商业价值都在发生变化。今拓远不如古拓,况且国家已不允许再传拓,其书法艺术价值。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也由过去临摹为主转为欣赏为主。帖的实

用价值已由原拓改为印刷品。碑帖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转而成为收藏和学术研究之用。更由于大量名人、名撰、名书法墓志的出土,填补了碑刻的缺项和数量少的不足,资料查找很方便,但收藏越来越难。

碑拓的母体是碑石,经战乱和历史变迁,许多今已见不到,有些亡佚的碑石幸有拓本流传,但毕竟是少数。

由于碑帖具有数量多,流传广的特点,因而碑帖收藏较其他类文物收藏要普及。就有去芜存精的必要。

碑石历史悠久,加上自然风化,给碑体本身留下许多痕迹。越早的碑,文字存在越多,碑面完整。时间越长,损伤越大,碑字越少。因此,碑字的多少是碑帖鉴定的最重要的内容。另外,碑上字是字口向内倾斜,拓碑是拓一张洗一遍,随着时间的推移,碑石再坚硬,也会越磨越薄,字口越来越瘦,一般讲,同一碑两张碑拓对比,笔道肥的拓本要早。

三、北京收藏碑帖的特征

作为金、元、明、清四朝京师的北京,在中国封建王朝后几百年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它既是全国著名学者和专家的汇聚地,也是金石碑帖整理、收藏、集散的中心。就其文化功能讲,此前历朝都无法相比,也是全国的首善之区。

1. 北京建都 800 多年,成为碑帖收藏的中心区。

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收藏高峰,一个形成于北宋,一个形成于清。

北宋的公私收藏,形成了金石学。欧阳修广览公私所藏,收藏金石刻文上千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金石学专著《集古录》。《集古录》一出,众人竞相争阅,金石学成了热门。

宋代另一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及其夫人李清照,毕生钟情金石碑拓,叙仿欧阳修,用 20 年时间写成《金石录》。该书“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

史氏之失,皆具载之。”赵明诚亲自作序,李清照又于绍兴五年(1135 年)为此书写了后序。

入清以后,又形成一个历史上收藏研究的最高峰。

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政局稳定,社会繁荣,首先由于皇帝的身体力行,广搜天下珍奇古董,皇室成员和士大夫赏玩博古,成为一种时尚,态势远胜过宋朝。

北京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形成了明清以来丰硕的收藏土壤。历史上最大的收藏者就是历朝宫廷秘藏,次之,文人士大夫的收藏也多集中于北京。

清代收藏热和训诂考据学的兴起,除了人为因素之外,还有一定社会原因。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禄拉拢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之外,还极力压制他们的反满抗清思想。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横加迫害。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在治学中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甚至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对碑帖的收藏、考据工作上。这就是考据学在清朝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的收藏与考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古代金石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今日科学收藏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局限。他们收藏和考据往往出于赏玩,八旗子弟玩物丧志者也在其中。有些文人士大夫,埋头于金石学中,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把金石收藏作为读书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碑帖由于其兼有实用性和收藏性的双重特点,读书人家中都有收藏。中国古代八股取士,文人为考取功名,须练一手好字,以至家家都藏帖。

清末民初,书坛碑帖并举之风,与书学研究的兴起相关,康有为撰写的《广艺舟双楫》,集清代书学之大成,其强调碑学主旨的同时,倡导另辟新见。

另有一批收藏大家,如陈介祺、吴大澂、张伯驹、周肇祥等的碑帖收藏引导了收藏潮

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北京馆藏碑帖的特点和艺术价值。

北京碑帖收藏居全国之首,除少数清末民初官宦士大夫的后人有较珍贵的收藏外,当今北京馆藏碑帖主要集中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市文物局系统。

除国家图书馆外,北京市文物系统的碑帖收藏又位居北京市之首。

北京市文物系统现存各类碑帖约十数万件,呈现出史传名帖名拓齐全、数量全国第一、独家孤品珍藏的特点。

北京自辽代在此建立陪都始,从金代正式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面石碑遗留很多,地下埋葬丰富,历代收藏遗传至今的也颇据规模,这一切都是北京成为碑帖收藏的首善之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今天的北京馆藏碑帖早已远远超出古人收藏、考据、临摹的范畴,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和文物收藏的特点。

同时,国家机构的收藏力度也是历史上私人收藏无法比拟的。

北京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馆藏碑帖来源有四类:一是,传世作品,如前述名帖;二是三次全市文物普查对所有碑刻都进行了锤拓,第一次文物普查是1957年,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经过“文革”今已半数无存,第二次文物普查是1982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是1998年,三次普查的碑拓具有极高的史料艺术价值;三是50年来考古出土的墓志;四是在社会上征购的碑帖。所收藏碑帖中传世碑帖收藏最全,其中不乏珍贵的宋拓本。名碑、名帖、名拓各类碑帖自成系列。这种集名帖在一个部门的现象是全国公私收藏中仅有的。

北京馆藏碑帖中孤品、珍品多。例如云居寺石经拓片。

云居寺位于京郊房山,其创始于隋代。从隋大业年间起至明朝(581~1644年),历经千年,刻经1122部,主要有华严经、法华经等3452卷,经版14278块。收藏于人工开凿的9个藏经洞中。辽金时代又在寺南挖地穴埋藏经版。

云居寺石经自封闭后,千百年无人扰动,直至50年代才发掘出埋葬地下的石经和打开山顶藏经洞,将所有石经锤拓出3套完整的拓片。一套存于法源寺中国佛协,一套存于北京图书馆,另一套现存于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局所属文物公司琉璃厂庆云堂是一个创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专营碑帖的老字号,100多年来至今仍是全国独一家的碑帖专营店,在全国享有盛誉。庆云堂的经营和收藏是整个社会碑帖收藏的一个标志。曾征集到宋拓《华山碑》、《西楼帖》、《玄秘塔》等名帖。

今日北京馆藏碑帖脱离了传统“藏宝”和实用的特点,具有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北京地区历史碑刻的拓本收藏最全。碑帖的母体石刻在全国有两个重要集中地。一是陕西西安碑林,以汉唐石刻为主;一是北京,以近千年石刻为主。历经千年,不少石刻都已损毁,只留下拓本供人收藏。

在浩如烟海的碑帖中,北京地方石刻碑拓和北京的碑帖收藏独树一帜,沉淀在北京历史文物名城的土壤中。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

注:本期第41页题图为“木红地百子纹锦”(清)。

北京地区



织绣艺术

赵秀珍

一、北京地区织绣的发展

中国古称“丝国”，有着韵味悠长的织绣艺术发展历史。北京作为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织绣艺术宝库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大约在距今 40~50 万年前，北京地区就出现了远古人类——“北京人”。1933~1934 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约 5 万年至几十万年间的山顶洞人居住遗址。在他们生活过的山顶洞穴里，发掘出一枚尖端锐利、针身圆滑、尾部穿孔的骨针。针长 82 毫米，最粗直径 3.3 毫米，针眼部分虽已残破，但仍能看出其制作之精巧。这枚骨针的发现在我国织绣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表明 5 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原始的缝纫工具，能够给自己缝缀简单的衣着。这枚骨针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它不仅

凝聚着人类的艰巨劳动，而且反映出我国远古时代的灿烂文明。

夏商周时期，织绣作为手工业的一个方面进步很快，这一时期是我国织绣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丝织品种除罗、帛、纱、绫、绢、绮、纨等，已出现了锦。1977 年在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中期墓葬遗址。从出土的残碎铜泡上发现有织物印迹，经鉴定为平纹麻布，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物遗迹。

从西周至秦，北京历经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伴随着燕国封建制的兴起，北京的历史步入了封建社会。蓟城作为燕国都城，是当时“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这一时期，纺织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诸侯已用帛交往。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诸侯争雄的局面，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燕国的故都蓟变成了一个地方性城市，从而使蓟城地区的封建经济迅速走向繁荣。此时已能生产出具有较高

技术水平的绶、绢、绵等织物。

西汉时期,北京地区仍是诸侯国,复称燕,都蓟城。这一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

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绢织物较多,呈驼色、棕黄及深褐色。绢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平滑光洁轻薄如纸,在低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织物表面几乎全为均匀的轻浮点所组成,织得极为紧密,是当时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绛紫绢地刺绣片有2件,推测可能是棺衣的某一部分。绛紫色,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由一条反S形为主干,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构成,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然后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故须分丝劈缕着意刻画,尤其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于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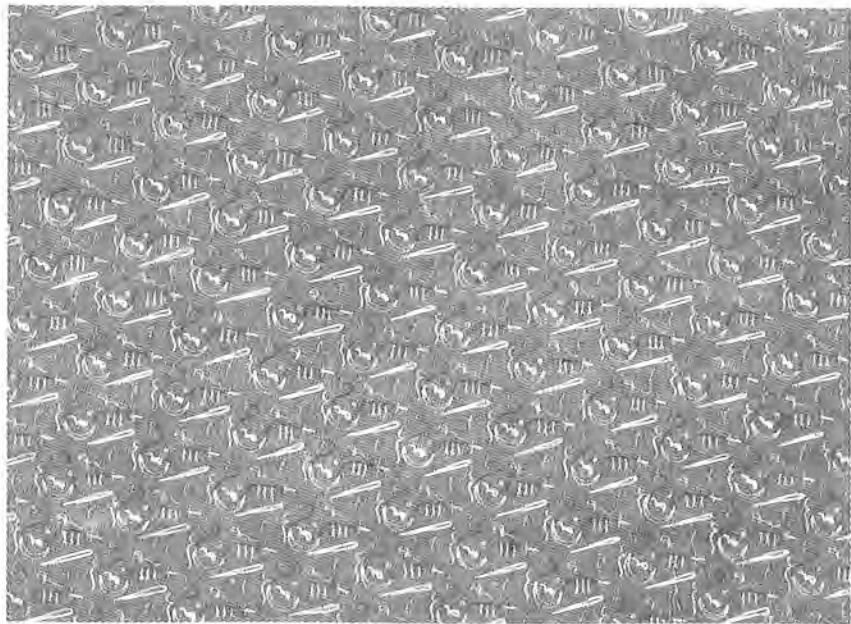
力,实为一件优秀作品。漆纱冠残征,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据显微切片观察,漆膜中包埋着的织物组织为纂组结构。这种织物两汉时称之为“漆緺”,以后又称作“漆纱”,相沿约六七十个世纪一直是制冠的高级材料。其组织是最基本的组带形式,它与平纹织物截然不同。

2000年9月25日,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布满云纹等精美图案,好似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大葆台西汉墓和老山汉墓出土的这些丝织品,制作精致,美观大方,为我们研究北京地区汉代织绣艺术提供了实证,填补了空白。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矛盾尖锐,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织绣生产管理上沿袭了旧制。

隋唐时期,幽州经济走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低谷,得到迅速发展。据房山云居寺石经记载,丝织业已拥有一定规模,绶绢是当时幽州的土产贡品,幽州城内开设近30余家绢行,出售丝织品。

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北京建立陪都,称南京。接着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金朝又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命名中都。这一时期丝织业迅速发展,技术日益



汉代绛紫绢地刺绣片复制图

改进。1978年,在北京门头沟区清水河畔的斋堂发现一座辽代壁画墓。在人骨周围残留有彩绣花卉蝴蝶的棕黄色锦和黄锦残片,其精美程度表明当时的染色和纺织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蒙元崛起沙漠,进据中原,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兴建了大都城,从而使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

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族,喜欢豪华装饰,酷爱丝织品,尤其是织金织物(也称“纳石失”)。自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掠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毡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锦彩缎。马可·波罗曾描写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以每车500斤计,则达50万斤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茵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在“共享富贵”的思想支配下,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在民间,由于丝织用金过多,以至于元政府多次明令禁止织造、出售织金织物。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与西域金锦工艺的交流,客观上造成了元代织金技术的空前发展,使蒙元时期的丝织物带有非常明显的异域风格。

明代是中国织绣工艺史发展的巅峰期。明代在北京和南京分设有两京织染局,北京地区官营和民间织绣业均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丝织物更是京畿名产。京畿农村的家庭丝织业繁盛。东安县盛产丝、绵、绢等丝织品,昌平县出产麻和麻布,香河县、固安县、宛平县、永清县也都出产麻、丝、绢、绵、

布等。无论官营私营机构,各种丝织物的纹样、质地都有了新的发展,“天下财货聚于京师”,丝绸贸易超过以往各代。

北京地区的明代织绣考古堪称硕果累累。1976年4月,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了近20件明代衣衾。其中衣物有暗八仙黄缎方领坎肩、暗团凤纹斜襟短夹袄、云纹黄缎百褶裙、番莲黄缎百褶夹裙、斜方格黄缎斜襟夹袄、海水纹黄缎裙、黄缎引幡等,其中驼色云鹿纹补子斜襟短棉袄实为精品。

1961年6月,在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葬中出土83件明代衣衾,有妆花缎、状花绸、状花罗、妆花纱,还有暗花缎、暗花纱、天华锦、织金罗、素绸等,织绣纹样有云龙、云凤、水纹、缠枝莲、凤穿花、松竹梅、吉祥团花、云纹团凤、方棋纹等十几种纹样。其形制有朝袍、袍、半臂、上衣、棉衣、裙、裤、短裤、褥、被面、靴、鞋、头纱、霞帔等十几项。这批丝织品的种类较多,花纹复杂,衣服式样亦较全,尤其是质地保存完好。

1958年夏末,北京西城慈因寺出土了4件织绣品。其中蓝闪白机头缎,背面钤四印。根据其上印文和墨笔字考证,这4件锦缎是明万历(1573~1620)年间织造的,历史价值很高。它记载了织物颜色、纹样、质地、用途、尺寸及产地,工匠姓名、织造年月、监造人等内容的原始题记。它可以作为古代纺织技术的注释,成为研究古代纺织技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经历了337年,除一部分腐烂风化外,大部分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完整无损。现保存匹料177匹,衣物467件。部分匹料上还保留有腰封,即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有织物颜色、纹样、织造人等。

定陵出土的成衣有袈服、龙袍、道袍、中单、裳、蔽膝、裤、女单衣、女夹衣、女丝绵袄、裙以及大带、绶、鞋、袜、被、褥、枕、膝袜、包袱等。出土丝织品种有锦、缎、绫、罗、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11大类。织品

上的图案极为复杂,线条细腻,有人物、动物、花卉、几何等纹样。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柘黄八宝松竹梅岁寒三友缎袍料、大红长安竹潞绸、黄织金细龙绉丝、织金妆花樽蒲纹纱等织绣品,均为明代皇家之精品。

定陵出土的成衣中,万历帝的黄缙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是目前所见到最早的缙丝衮服之一。此衣图案壮美,结构严谨,特别是十二章的部位、龙的形象、八吉祥的安排,都具有明代宫廷纹样的特点,是历代缙丝作品中少见的。

除出土织物外,北京地区传世织绣的收藏和保存亦很丰富。譬如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明金地缙丝灯笼仕女袍料,以捻金线缙地,柿蒂内以灯笼仕女作主景,点缀湖石、花卉,为典型元宵节穿的灯景女衣。

明代北京织绣出土、传世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样之精,等级之高,在中外织绣史上均为罕见。这批丝织品的突出特点是种类多,纹样精,几乎综合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变化之大成。织物组织也比较完整,从平纹、斜纹到缎纹变化组织,从二重组织到沙罗复杂组织都一一具备。这表明当时的缙丝织绸技术已炉火纯青。自宋以来北京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北方特色的织绣传统在明代得以发扬光大,并确立了其地位。因此,明代是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颇为自豪的时代。

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后,因“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于是便“定鼎燕京”,北京再次成为封建帝都。清代北京的丝织业仍分官营和私营两大体系,《清会典》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浩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京畿一带推广种桑、养蚕。北京织染局曾从四川、江浙雇来工匠,教授纺织之法。学徒领悟,如贡缎、江缎、大缎、浣花锦、金银罗绢等均能仿造。康、雍、乾(1662~1795年)时期是北京织绣的鼎盛时期,在继

承明代艺术程式基础上,追摹唐宋遗风,织绣纹样精美,色彩和谐丰富。到了晚清,织绣过于繁缛堆砌而流于匠气,但精美绝伦的珍品仍不寡。

仅从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公主坟清墓出土的霁花缎罩、白塔寺出土的10余件织绣品、北郊四道口清墓出土的22件织绣品,即可以看出,清代出土织物品种齐全,形制丰富,有不少卓具工艺价值和审美情趣的织绣品。

北京地区清代传世织绣品更是不胜枚举,如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具有新疆风格的织金簇花栏杆回回绵,用圆金、片金及孔雀羽3种线织就的普蓝地织金云蟒海水妆花缎坐褥面;现藏于雍和宫的深杏黄色妆花缎乾隆朝袍、乾隆御用锁子纹织金锦盔甲;以及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绛色缎緞米珠绣云龙海水江牙纹嘉庆早期龙袍等。

清代由于江南三织造的崛起,北京地区织绣生产规模虽略小于明代,但基于悠久传统的陶冶和工艺的精进,其织绣品日臻完美,尽显风韵。

二、北京地区织绣的特征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历时数百年。这一时期北京的织绣工艺在继承唐、宋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

1. 富丽堂皇的元代织金

我国用金线、金箔、金粉装饰建筑或反映在丝织物上的工艺历史悠久,到辽宁时期已趋于成熟。在丝织物上用金银粉末和极薄的金箔、银箔等贴覆而制出特有的金银闪光花纹的印金工艺,在艺术风格上具有金光灿烂、富丽堂皇的特殊效果。但印金花纹不耐摩擦,牢固程度不如捻金线和片金线织成的锦,因而发展到元代,织金锦盛行。从用金方法上讲,织金锦有部分加金和全部加金之分。从加金技术区别,有片金锦和捻金锦两种。

元代丝织物流行窠状纹样。一是形状

如带瓣的团花,称团窠;二是玛瑙窠,是三人的瓣窠;三是方胜窠,又称柿蒂窠或四出尖窠,呈方形;四是栲蒲窠,又称梭窠,如梭形两头尖,中间宽;五是滴珠窠或珠焰窠,形状如欲滴的火珠;六是如意窠,形为如意云肩状。

1955 年在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织绣品种丰富。其中包括 4 片元代最具特色的纳石失金锦,上面织有唐草纹,出土时金光耀目。小花几何纹绫、柿蒂窠莲花纹绫,这两件丝织品图案为元代典型的纹样。缂丝紫汤鹅戏莲片,紫色地,上施黄绿相间水波纹和卧莲图案。卧莲之间有鹅嬉戏其中,故称之为“紫汤鹅戏莲”,其构图自然,用色简单,织造粗犷,工艺以平缂为主,为元代缂丝精品。刺绣“香花供养”云龙纹包袱,以平纹绢为地,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 4 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4 字。绣工运用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方法。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还有海云和尚的贴罗绣僧帽等。这批元代出土的织绣品,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缂丝、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传世珍品黄缎地刺绣《妙法莲华经》第五卷,现藏于首都博物馆。为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之绣品,卷轴式,展长 2326 厘米,宽 53 厘米,经卷落款中记载刺绣地点、时间及刺绣人。五枚缎地,绣蓝丝绒楷书《妙法莲华经》经文第五卷,10752 个字。经卷首尾各有一幅刺绣佛教图案。卷首绣释迦牟尼说法图,是此件绣品最精彩部分,画面构图严谨,内容丰富。卷尾绣韦驮像。此件绣品突出之处,一是工艺复杂、设色丰富、针法繁多,使用了平绣、网绣、打籽绣、缠针、松针、戗针等十几种绣法,根据人物形象和不同特征巧施不同针法和色彩,把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融入了时代审美观;二是大

量使用盘金、泥金、钉金、贴金箔等工艺,佛身以金箔作底,捻金线勾水田衣纹。经文中 154 个“佛”字,除一个为平绣金佛像外,其余均为金线绣字。此件绣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元代北京地区出类拔萃之珍品。

2. 技艺精湛的明代妆花

明代北京地区除传统丝织品外,妆花工艺最具时代特征。妆花是南京丝织工人于明初创造的新品种,据明《天水冰山录》记载,妆花织物品种有妆花缎、妆花纱、妆花罗、妆花绸等 17 种。妆花工艺是在传统的织锦基础上,吸收了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术,采用局部挖花盘织的织造方法而形成的一种丝织新品种。这种织造技术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但作为织物整体纹样的妆花形式和织造方法,是明代丝织工艺的重大成就。妆花图案庄重匀称,色彩富丽,变化多样,图案内容极为丰富。有代表皇权,象征帝后的龙凤纹;有取材于大自然的生物形态;有以仙道宝物组成的图案;有人物、群仙祝寿、玉女献桃、童子戏莲;有吉语文字及其他题材组成的吉祥图案。

妆花在织造方法上采用不同色彩的纬线作局部挖花盘织,因此,配色极度自由,可以达到得心应手、运梭如神的地步。在一件织品上花纹配色可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再加上主题花和大的宾花运用多层次的“色晕”表现,使花纹更显得生动优美,自然逼真。同时,还有不少织品除用彩绒妆花外,还加织金和孔雀羽毛线。以金线、孔雀羽毛线织出的花纹,往往用彩绒绞边;以彩绒织出的花纹,则用金线绞边。这种多种施色,灵活装彩的方法,使整个织绣品呈现出金彩交辉,雍容典雅的效果。

妆花生产过程极为复杂,从纹样设计、挑花结本到选料、染色、络丝、打线、络纬、上机要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妆花的织造费工费时。织造速度极慢,一天只能织两寸,故有“寸金换妆花”的俗语。所用原料除丝线外,还有孔雀羽毛线、金线。妆花织物是织造工艺水平很高,极其珍贵的一种提花丝织物,是专供“上用”的御用品。

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的织绣品中,缠枝莲地凤斓妆花缎裙,由两大片组成,驼色缎地,缠枝莲及祥凤斓。此裙提花规整,花型大而饱满,裙斓以莲花祥凤图案环绕整件裙围。它织造精细,花满地紧,图案亮丽。用料为名贵的妆花缎,是明代裙服的典型代表。

西城慈因寺出土的绛色勾莲八宝纹妆花缎月牙形残片,是用绛色丝线与紫赤明金织成叠胜万字纹地,填五彩吉祥八宝纹样。此件为典型明妆花缎。

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出土妆花织物38件,其中四合云地柿蒂窠过肩蟒妆花缎袍,形制为斜襟、右衽、裙式。蟒袍前胸及后背柿蒂形内饰过肩蟒纹,蟒首在前胸主要部位,两袖各有一条长53厘米,宽14厘米的直袖蟒。蟒袍下摆分为三大幅,前襟、底襟、后襟。此件妆花缎袍为明代皇家珍品。

德胜门外冰窖口公主坟清墓出土的明代黄色凤鹤樗蒲纹妆花缎帘,黄色五枚缎地,纬线显花,以凤鹤相戏图案构成橄榄形樗蒲纹,金线绞边。樗蒲纹起源于唐,主要有龙凤、团龙等纹样。这种凤鹤樗蒲纹样自唐以来是很少见的。

定陵出土的丝织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妆花。出土的170余匹袍料和匹料中妆花织物有17个品种,占了一半以上。红织金妆花奔兔纱,是万历棺内随葬物。兔口衔灵芝,奔驰行云之中,背负灵芝托,生动活泼。第一排托内承团鹤,第三排托内承无极纹;第二、四排兔在奔驰中回首相顾,灵芝托内承一“卍”字,花纹图案每四排一循环,为妆花织物精品。万历棺内柿蒂形龙云肩通袖织金孔雀羽妆花罗龙袍,从设计、选料、妆花、织造技术等,都极其精美,代表了明代妆花织物最高水平,显示出我国传统丝织手工的高超技艺。

明传世织绣品红地织金云蟒纹妆花缎织成帐料,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帐面共织金蟒69条,其中正面织升蟒3条,升蟒上部为两条行蟒呈戏珠状,间以12条界蟒分开,帐沿四周织金蟒52条。蟒纹使用赤圆

金,淡圆金线织制,片金线勾轮廓,生动威猛,有强烈的动感。四合如意云和骨式云以蓝色为主,在红色底色的衬托下,显得凝重华贵。此帐料制作精良,幅面宽大,保存完好,实为罕见。

这些出土、传世妆花织物,不仅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明代丰富的妆花品种,而且使我们了解到它的制作工艺,这是一份极为宝贵的艺术遗产。

3. 绚丽多彩的清代锦缎

清代丝织工艺不仅保留和发展了传统的品种和织造技术,而且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在品种繁多的丝织工艺中,最具有特色的当属锦缎。尤其是八枚缎的流行,把缎织物光洁平滑的特性发挥到极至。

锦是多彩提花丝织物的泛称。《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字从金、帛。”锦是以彩色熟丝、经重(或纬重)组织、提花织造的高级精美丝织物,一向以其织造技术复杂,花纹图案丰富,色彩艳丽著称。清代锦的产地很广泛,几乎遍布全国。最著名的品种首推“宋式锦”、“云锦”、“蜀锦”。清代京制锦缎在此基础上也有长足发展。

宋式锦是苏州生产的,其花纹图案风格、色调及织造技术,常常仿宋代织锦的特点,故人称“宋式锦”。其主要构图形式是在几何图案的骨架上,添加各种形式的花纹,花中套花。如各种形式的天华锦,八达晕锦、龟背锦、万字曲水锦等。因而有“锦上添花”之称。北京白塔寺出土的浅黄色团龙“万寿”字纹锦盒面,浅黄色地,上布满普蓝色几何骨架,形成龟背纹。龟背纹内,以孔雀羽和不同色彩的纬线填织成龙、灵芝、花卉等图案。像这样颜色丰富,配色巧妙,花纹复杂、织工精细的花纹,可说是织锦技术达到高峰的代表作。

云锦是南京生产的传统手工艺品,图案花纹端庄大方,设计严谨。常用的花纹有各种形态的缠枝莲、缠枝牡丹、折枝“三多”,各种花果、龙凤云纹等。云锦用色的主要特点

是浓重、鲜艳、富于变化,特别是大量使用金线,更显得光彩夺目。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冰梅纹织金锦,织金地,纹样采用冰纹、梅花、竹叶、灵芝等显花效果好的小单位花纹,即满花或称“遍地花”,以达到充分的显金效果。北京顺义县张镇塔基出土的红柿蒂“福”字方补纹织金锦罩,织锦中央是以片金织“福”字柿蒂图案为主景。柿蒂外,围绕着“福”字片金织双狮滚绣球,狮子周围织出规则的串枝牡丹图案。此罩整体构图紧密,织造规整,切金匀细,纹饰醒目。地景以大红色衬托主题,色彩绚丽华美,金光灿烂,给人以美的享受。

蜀锦产于四川成都,其用色鲜艳、协调,织造精致,细密,质地轻薄、柔软。地组织有缎纹和斜纹,很适宜作衣料、被面。蜀锦的花纹,以轻线彩条起彩,彩条添花为多。也有纬线起花织物,花纹为方形、条形骨架,再添加各种花鸟、人物等纹饰。花纹图案循环较小,多为对称的构图形式。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木红地百子纹锦夹被,童子弄笙、斗蟋蟀两种纹样反复循环,质地锦薄,具有蜀锦风格。

宋式锦、云锦、蜀锦,都是清代北京地区流行的丝织品,其产地虽然以南方为主。而南产北销的局面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尤其是云锦,其销售集散地主要是北京。这是由于北京是当时的封建政治、经济中心及交通枢纽的特殊位置决定的。

清代缎织物名目之多,花色之丰富,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缎织物,据不完全统计有:妆花缎、暗花缎、织金缎、二色缎、闪缎、漳缎、绒缎、花缎、巴缎、库缎、贡缎、片金缎、库金等30余种。这些不同名称的缎织物,如果从织造技术和外观特征区别,可以归纳为:暗花缎(包括素缎)、织金缎、花缎、妆花缎四大类。

暗花缎,清代又称库缎,为本色单重提花缎织物。清初沿袭明代织法,以五枚二飞或五枚三飞为主要缎纹组织。从乾隆初期开始,除继续织造五枚缎外,更多的是织造七枚二飞、七枚三飞或八枚三飞等缎纹组织。这是清中期以后缎织物的特点之一。

暗花缎一般是经缎纹地,纬缎纹花,故又称为正反缎。正反缎是利用经缎纹和纬缎纹对光的反映程度不同来显示花纹的。如北京北郊四道口清墓出土的22件织绣品中的行云团龙暗花缎、海水江牙暗花缎、云纹暗花缎、团龙暗花缎等多件织物,经缎纹地非常光亮,纬缎纹花清晰,具有突起的艺术效果。

织金缎,清代亦称“库金”,是在五枚、七枚、八枚暗花缎或素缎地上,以圆金线或片金线作花纬或地纬织造的一种缎织物。织金缎的外观光亮耀眼,具有雍荣华贵的装饰效果,可以作衣服、被褥的面料以及鞋帽的边缘等。故宫博物院藏有相当数量的织金缎是专供“上用”的。北京白塔寺出土的月白团龙杂宝纹织金缎包袱,以八枚月白色素缎为地,用片金织团龙、杂宝团花图案,花型较小,金色柔和,金、彩搭配巧妙,华而不俗。

花缎是指在缎纹地上以彩色起花的彩色花缎。清代花缎的品种有二色缎、闪缎、鸳鸯缎、漳缎、广缎等。其中闪缎在清时颇为流行,经纬丝常用对比强烈的两种色彩,从不同角度观看,织物表面呈现闪色变化的效果。

妆花缎是南京云锦的重要品种,是以缎纹组织为地,采用挖梭技术织造的高级丝织品。由于使用了挖花技术,妆花缎的用色不再受到限制。妆花缎色彩艳丽,轻薄柔软,美观而又实用,具有织锦的效果,受到时人的喜爱。妆花缎的用途很广泛,是制作服装、被褥、垫面及室内陈设品的高级材料。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黄云龙妆花缎袍,地为八枚缎,圆领,右衽,左右开裾,是按设计要求织成的。领边、襟边、马蹄袖为纳纱绣海水云龙纹。胸前妆金正龙取坐势,是龙纹中最庄重、正规的姿态。袍料用色、用金纯正,精致华美,为康熙时典型龙袍式样,足以代表当时妆花缎织造最高水平。

清代是中国古代织绣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的流通,贸易的往来,代表清代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锦缎在北京地区兼收并蓄,发扬光大。

(作者为北京古代艺术博物院书记)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周氏藏拓整理记

叶 芷

2001年冬,由我承担的《所藏周氏旧拓目录》汇编、整理工作结束。此次整理,完成了编目和初步注释,初步建立起按时代排序的拓片目录、卡片系统,撰写条目近2000条(不计副本),共计12万字。在已完成的目录汇编中,有近90%的条目,都附上了有关石刻的前人著录和部分考证。现将有关情况简介于此。

周肇祥,清末举人,近代著名书画家、鉴赏收藏家。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团城国学书院院长。他一生嗜好收藏各种古物,藏品大都来自琉璃厂及冷摊小市。周氏生平著述甚多,对金石学更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一点从他遗存的手稿中就可看出,如:《石刻汇目》、《山游访碑目》、《〈燕京石刻〉汇编》、《北魏景明以下墓志汇编》等,及一些散见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和》、《东方杂志》、《艺林月刊》上有关石刻研究方面的文章。周氏收藏的拓片大部分为整纸拓本,(并有一部分为装裱本,未列入此次整理范围)其时代久远,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刻,其中不乏各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品。如:南北朝时期的造像碑题记(独立为一章)就有近200多件(不计副本),唐、宋、元三代拓本收藏也较为丰富,精品颇多。其内容广泛,有寺观碑、纪念碑、功德碑、墓碑等。其地域分布广阔,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苏、湖南、四

川、安徽、江西及广西等地。总之,把周氏藏拓全面地进行整理及识读后,基本上可以粗略地了解中国古代碑刻发展的一些情况。

下面将周氏藏拓中各时期较为重要或地域分布较为集中的碑刻拓本列举如下,并略加分析。

一、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

周氏藏拓中较著名的汉代碑刻拓本有:

西汉五凤刻石,文“五凤二年鲁州四年六月四日成”13字,刻成3行。此石于金代明昌二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在鲁灵光殿基遗址西南太子钓鱼池中发现;五凤刻石是继《居摄二坟坛》出土之后最早之西汉刻石。关于此石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近年的研究文章还有发表于《故宫博物院专刊》1995年4期施安昌的“关于五凤二年石函”。周氏藏拓残泐不清,为传世拓本。

庶孝禹刻石:文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庶孝禹”15字,刻成二行,文右行“河平三年八月丁亥”8字,左行“平邑□里庶孝禹”7字。书法遒劲苍古,为古隶代表作,石今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有详细考证。

东汉时期是石刻文物大量涌现、各种石刻形制开始正式形成的重要阶段。藏拓中这一时期的拓本有大吉山买地摩崖(又名昆

地六人买山地记》，额刻隶书“大吉”二字，东汉建初元年（76 年）刻，原石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 50 里跳山。《两汉金石记》、《秦汉碑述》中都有著录。

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很多。著名的有保存至今的褒斜道石刻，位于陕西省汉中市褒城镇石门。反映这一地区的石刻拓本有：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钜鹿郡君开通褒斜道碑、建和二年故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即《石门颂》等。刻写均为隶书大字，书体雄健浑厚，是汉隶佳作。拓本现存状况较为残破。又如东汉建宁四年，西狭颂碑拓，刻于甘肃成县开井山，记载了汉武都太守李翥为民谋利，开通西狭道的事迹。这些都是重要的摩崖石刻，其拓本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这一时期的汉碑藏拓还有位于河北及幽州地区的张子阳碑，文为隶书。王昶《金石萃编》等书未见著录，可惜藏拓残破不堪，字迹不清。据《舆地碑记目》记年代为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造，卷四载：“汉幽州刺史口太守张子阳碑在唐化镇松江五里许乃张子阳墓”。

另，涿郡昭烈皇帝庙碑、左冯翊韩延寿碑、据《春明梦余录》考原碑在宛平县；全椒侯马成墓碑、《京畿金石志》考在今北京平谷县东，此三通碑详细年月均无记载，周肇祥藏《燕京地区石刻汇目》手迹、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直隶卷》及《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都有著录。

位于河北境内的封龙山碑，全称为元氏封龙山之颂。原碑位于河北省元氏县西北王村，立于汉恒帝（刘志）延熹七年（164 年）。碑文为隶书 16 行，行 26 字；侧有唐咸通中期题名，石虽剥落，文多可读，笔划轻细，遒劲豪放。碑文大致内容首先说明封龙山有兴云布雨之神力，而后说明封龙山得法食以来保佑百姓五谷丰登“粟斗三钱”的情况。杨守敬《平碑记》云“汉隶气魄之大无逾此”，是研究汉代书法以及封龙山祀典的宝贵资料。周氏藏拓为整纸拓本一幅，剪裱本一册。此外还有河北元氏县境内的《汉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等都是著称于世的汉

碑瑰宝。

三国时期，有鲜为人知的魏黄初元年（220 年）受禅表，是曹丕称帝后向天下发布的公告。建康元年（144 年）公卿将军上尊号奏，是魏国百官由相国华歆为首上书朝廷请曹丕即帝位的劝进文。此外，还有魏青龙三年（235 年）范式碑、九真太守谷朗碑等，皆为隶书之上乘佳品。《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多有著录。

西晋时期藏拓有晋泰始六年（270 年）郭休碑，清道光末年在山东掖县出土。西晋太康十年（289 年）齐太公吕望表，在河南汲县。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晋都昌令乐陵刘遽墓志等；特别是 1931 年在河南洛阳偃师出土的咸宁四年（278 年）太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颂，是难得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晋代大型碑刻，它记录了晋帝到辟雍视察太学，参加礼制活动的经过，书体为八分书，原碑现仍存偃师辟雍遗址。此碑早在 30 年代出土时就曾轰动一时，研究著述很多，如顾廷龙《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燕京学报》第 10 期（1931 年 12 月），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辅仁学报》3 卷 1 期（1932 年 1 月）等，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东晋十六国前秦建元四年（368 年）的广武将军碑，碑四面刻，碑阳刻碑文、碑阳及两侧刻部将姓名。隶书 17 行，行 31 字。文多剥落，于清光绪年间出土，现存西安碑林。杨震芳《碑帖叙录》云



谷朗碑整纸拓本（整本）三国
吴凤凰元年（272）

此碑“书体奇态横生,不可名状,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前秦石刻极少,故为世人所珍视。

南北朝时期的碑拓和摩崖石刻拓本也很多,其中不乏书法精品,也保存了很多重要史料。如藏拓中有现存于曲阜孔庙的正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鲁郡太守张猛龙碑、河南登封的太安二年(457年)中岳嵩高灵庙碑、陕西澄城太和十二年(488年)七月一日宕昌公晖福寺碑,以及山西临晋东霍林五年(503年)正月二十六日霍阳碑等。这些碑在金石著作中多有收录。佛教石刻在南北朝时期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在各种石窟中,一般都附刻有造像题名、题记或造窟碑记等,对于确定石窟时代,考察史实极有用处。如山西大同云岗石窟中的各种造像题记,造窟碑记以辽宁义县万佛堂中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魏元景造石窟碑为代表,石窟题记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题记最多也最有名。其著名代表作如:北魏杨大眼造像记、景明三年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始平公造像记等。造像碑题记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并多有著录。《八琼室金石补正》对这些石刻有较详细的录文及考证。周氏藏拓中都存有整纸拓本。

周氏藏拓中这一时期河北地区的碑刻拓本,较为著名的有河北灵寿县幽居寺遗址内的赵郡王高叡修寺碑及高叡修寺颂记碑,两碑同刻于天保八年(557年)前者为二月十五日,后者为四月八日。此碑还被分别俗称为小定国寺碑和大定国寺碑。碑系为纪念赵郡王高叡扩修幽居寺而立。撰书人虽无法考证,但其书法艺术价值很高,碑文内容对研究北齐时期的河北历史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金石录》、《京畿金石考》、《金石汇目分编》等书均有著录。唐邕写经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前,依山壁雕刻而成。刻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三年(572年)五月二十八日,为唐邕书丹。碑文楷书20行,行34字。书法虽为楷书,但兼用隶笔,笔法淳古,气魄浑厚,开唐人刻碑

之先路,为含隶意较浓的魏碑体碑,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中有较详细考证。兰陵忠武王高肃碑,全称:“齐故假黄太师太尉出兰陵忠武王碑”,位于邯郸地区磁县刘庄村东兰陵王墓前。碑刻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573年),碑文漫漶,无法辨认撰书人姓名,碑阳面文字18行,行30字;阴面文字26行,行52字;正面文后段与年月俱刻于阴面。额篆阳文16字。碑阴额篆书“安德王经墓感兴诗”6行,行10字。此碑为河北省现存北朝著名碑刻,系隶意较浓的魏体碑。此外还有位于同一地区(磁县)的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年)和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翻、高盛碑,此二碑同高肃碑一起被称为河北磁州的“三高碑”,杨震芳《碑帖叙录》中有著录。魏赠定州刺史邸珍碑,位于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内,碑刻于北齐武平五年(574年)不著撰刻人姓名。碑文隶书30行,行39字。碑额刻楷书“魏故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公之碑”,此碑系邸珍后代为其先祖歌功颂德而建,具有较高的书法和史料价值,也是北岳庙中最早的一通石碑。周氏藏拓为整纸拓本,有残。

二、隋、唐时期

隋代是在南北分裂数百年之后统一的王朝,发挥了承上启下、融会贯通的巨大作用。隋统一后,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恢复发展,使得隋代的石刻颇有气势,书写刻作皆尽精巧,留下一些传世珍品。周氏收藏拓本有:刻于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的龙藏寺碑,现存河北正定隆兴寺。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为隋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碑阴、碑侧各有题名5列,是隋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命劝奖州内百姓万余人集资兴造龙藏寺后树立。书体既有北朝碑版风格,又与唐初楷书有相似之处,对研究南北朝至隋唐书法字体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是著名的书法珍品。又如山东兰山开皇十三年,诸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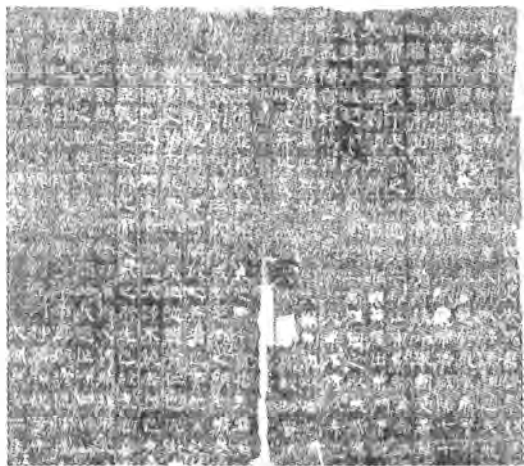
子恒等平陈頌、开皇十六年贺若谊碑等。隋代的造像题名记集中了河南洛阳龙门、河北邯郸响堂山、山东益都云门山、济南千佛山等主要石窟群的拓本。这一时期的佛教石刻出现了一种掩埋在塔基中的舍利塔下铭。如：拓片中收藏的隋仁寿元年(601年)陕西扶风岐州舍利塔下铭、山东益都青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等拓本，均保存完好。

河北(包括幽州地区)地区碑刻的拓片，如开皇年间河北定县开元寺的豆庐通造像残碑、开皇十一年(591年)马长河造像，据孙贯文先生考证为河北易县潘祖荫藏石，参见孙贯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历代石刻草目汇编·隋代》(《考古学集刊》11期)。开皇十三年(593年)，河东梁泉人□君残碑，现存河北邯郸地区南响堂山上。仁寿三年(603年)东洪村合邑人尼惠全等造像，原碑在河北完县大悲寺。另，隋南宫令宋君敕建僧尼二寺碑记，原碑位于南宫大觉寺内。碑刻于开皇十一年(591年)，是河北隋碑中较早的一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碑文多漫漶，只有一部分字尚可辨识，《京畿金石考》、《畿辅碑目》中多有著录。白马寺隋罗尼经幢，仁寿四年(604年)，据《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二》载为八面刻，在今北京南城悯忠寺(即法源寺，碑今已不存)，《京畿金石考》、《畿辅碑目》中多有著录。仁寿元年(601年)四月，“北平县令庐文约修孔子庙碑”，碑额篆书“鲁司寇邹国公孔宣文灵庙碑”，原碑在河北完县文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畿辅碑目》、孙贯文《北大图书馆藏历代石刻草目集·隋代部分》等都有著录。此外，还有开皇三年(583年)二月十五日葬封忠简王楚英墓志，首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开国公忠封公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出土于河北景县。仁寿元年(601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范阳郡正阳瑾墓志，原碑在河北涿县。《补寰宇访碑录》、《金石汇目分编·直隶卷》、《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中有著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文化发达，成为我国石刻史

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唐代存留的石刻数量较多，分布地域也很广泛，大部分省、市甚至中原地区的许多县都有唐代的石刻存留下来，其石刻形制十分丰富，制作手法也很成熟。

陕西关中是唐碑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以昭陵陪葬墓群和西安碑林最为有名，礼泉县昭陵碑刻历来是金石著录的重点，也是收藏家们收藏传拓的对象之一。这一点在周氏的藏拓中有反映。如：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刻，晋州刺史顺义公碑铭，上官仪撰文，褚遂良书，残仅存70余字。为昭陵陪葬墓碑之一，现仍存昭陵。唐永徽元年(650年)刻，芮定公豆庐宽碑，李义府撰文，无书人姓名，楷书，其书法精健，但磨损较甚，为昭陵陪葬墓碑之一。唐永徽二年(651年)刻，中书令马周碑，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为许敬宗撰文，殷仲容书。唐龙朔三年(663年)的杜君绰碑，李严撰文，高正臣书，万保存刻字。西安碑林是石刻宝库，其中有大量唐代作品，多为著名珍品。周氏藏拓中有：贞观十四年于孝显碑、龙朔三年道因法师碑、咸亨三年大唐三藏圣教序、开元二十四年大智禅师碑、天宝二年隆闾法师碑、天宝四年石台孝经、建中二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宗教、书法、美术等多方面重要价值。这一时期收录的拓本



汉纪信碑整纸拓本(局部)唐武周长安二年(702)

还有大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等人的书迹碑石,如皇甫诞碑(阙年)、天宝十一年多宝塔感应碑、建中元年颜氏家庙碑、郭家庙碑、会昌元年玄秘塔碑等。碑林中的碑石拓片,还有著名的“杜顺和尚行记”,陕西境内还有唐高宗永徽五年的万年宫序铭等。

山西境内也保存有大量唐代碑石,拓片中周氏收藏的有,晋祠贞观二十年晋祠铭、新绛县龙兴寺总章三年的碧落碑等。山东陵县城内颜真卿书迹珍品天宝十三载东方画赞碑尤为可贵。河南境内唐拓片周氏收录亦较多,如鲁山文庙大历七年的元结碑,开元十六年少林寺碑、天宝三载嵩阳纪圣德感应颂,长寿二年偃师令平公之碑,辉县武后长安四年刻百门陂碑、唐大中七年高元裕碑,为柳公权所书。这些碑多为历代金石学家所著录。

河北境内较著名的石碑拓片周氏藏有:正定县城内的李宝臣碑,全称:“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又称风动碑。碑刻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王佑撰文,王士则书丹并篆额。碑文楷书25行,行55字。书法遒劲潇洒,刻工精美,为张从申、苏灵芝所不及。碑阴行书分3截,上14行,中33行,下15行,为将佐题名。此碑系唐“安史之乱”后,为给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歌功颂德而立的功德碑。宋景碑全称:“大唐尚书右丞相赠太尉立贞宋公神道之碑”。因系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丹,故又称颜鲁公碑。碑位河北沙河县城,刻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碑四面刻,三面为碑文,一面为碑记,两面皆楷书27行,行52字;侧面7行,行50字,一侧10行,行70字。碑阴刻有侧记,均为颜真卿楷书。此碑字体端庄,气势开张,遒劲雄健,饶有古意,是颜真卿晚年书法艺术臻于完善成熟的传世名作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易县的梦真容碑为苏灵芝书。唐大历十三年(778年)河北正定县开元寺三门石柱上解慧寺三门楼赞,李寡撰文、周羸全行书,碑上唐人题名甚多。建中二年(781年)易

县的易州刺史张公山亭再葺记,开元十三年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是了解李唐祖先陵寝的重要材料。唐代兴盛一时的道教也吸收了经幢这种形式来刻写道德经文,著名的河北易县龙兴观道德经幢,传为苏灵芝书,是校注《道德经》的重要资料。

此外,还有今存于北京地区的石刻拓片,如唐天宝元年(742年)刻李秀残碑,为李邕撰文并书。碑文上题迹为“北海书李秀碑旧拓残额一横一圆石础二又半石础一凡五石三百四十七字,嘉庆乙酉夏北平翁方纲乎摹毗陵胡逊校”。此碑今存于东城区府学胡同文丞相祠内。唐至德二年(757年)北京法源寺内的悯忠寺宝塔颂,为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书。

藏拓中还有不少是南方地区的唐代石刻拓片,主要见于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著名的碑文藏拓有:四川成都元和四年诸葛武侯祠堂碑,江苏南京上元三年明征君碑、浙江县大和七年阿育王常住田碑、湖南衡阳开元十八年麓山寺碑、祁阳大历六年中兴摩崖、广东高要七星岩唐开元十五年的摩崖碑端州石室记。此外,还有反映壮族地区面貌的万岁通天二年韦敬辨智城碑拓等。

三、宋、元时期

宋代碑刻中有很多是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给地方名胜增色不少。宋代名家米芾、蔡京、蔡襄、黄庭坚、苏轼等人书写上石的碑刻现在仍存于各地,这些碑刻的拓片也集中反映在周氏的藏拓中。如安徽芜湖黄裳撰文,北宋崇宁三年的芜湖县学碑、安徽无为县米芾撰表并书大观元年宋章吉老墓表、湖南祁阳黄庭坚书崇宁年浯溪诗、浙江杭州苏轼撰文并书元丰元年表忠观碑、陕西扶风苏轼书元祐五年怀子由诗刻、安徽除县醉翁亭中苏轼书元祐六年醉翁亭记、福建泉州蔡襄书嘉祐五年的万安桥记,以及治平二年,欧阳修撰文、蔡襄书“昼锦堂记”亦称“百衲碑”等。还有陕西兴平县刻奉敕摹写仿宋徽宗赵佶瘦金体书、蔡京题额,大观二年大观圣

作碑。此碑不仅记载了宋代的学校制度,同时也是研究北宋时期学校、科举制度的实物资料,有一定历史价值。

藏拓中,这一时期北方地区较著名的拓片有:陕西临潼张说撰文,杨方平书、治平四年的温泉箴。西安碑林中藏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绍圣四年刻游师雄墓志铭等,泾阳县元祐五年的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扶风法门寺政和八年,圆相观音菩萨瑞家颂。河南安阳司马光撰文,蔡襄书元丰七年的韩魏公祠堂记,山东长清县灵岩寺、曲阜孔庙碑林、陕西户县重阳宫等地的碑拓。

这里还要单独例举一下河北境内的藏拓,研究这一地区的碑石藏拓,对于研究北京周边的历史和北方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和史料价值。如:邢台地区北宋端拱元年(988年)重修邢州龙兴观道德碑记、正定县大佛寺端拱二年(989年)重修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景德四年(1007年)邢州重修东岳天齐王庙碑、城县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重修元圣文宣王庙记、元氏县皇祐二年(1050年)元氏新建县学记、满城县西抱阳山定慧寺的元丰三年(1080年)重修相公堂记、曲阳县元丰八年(1085年)石邑新建石桥记、邢台崇宁二年(1130年)兴学圣德颂、邢台开元寺内大观四年(1110年)敕赐开元寺圆照塔记、政和八年(1118年)宋政和手诏碑为宋徽宗御书、曲阳县北岳安天王庙记等。这些拓本,在《金石汇目分编·直隶卷》、《京畿金石考》、《畿辅碑目》中多有著录。

元代碑刻具有独特风格的首推元代圣旨碑,它在元代石刻中占较大的比重,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主要树立在寺观中,刻写保护各种宗教等寺观产业和减免僧道赋税差役的圣旨。文字形式上有汉语白话文与蒙古文两大类。在这些圣旨碑中尤以河北元氏县的元代“开化寺圣旨碑”最为重要。此碑刻于延祐元年(1341年)碑系一通八思巴字蒙文与汉字白话文的合璧碑。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蒙、汉文书法皆佳,为后世金石学家所重视;另是八思巴文所记述的某些资料颇有学术价值。此碑著

录见于《畿辅碑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周氏藏拓中反映这一时期的拓本还有山东邹县孟庙的元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碑、同年的蠲免正圣后差发割付;曲阜县元统二年(1334年)加封颜子父母制碑,山东长清县灵严寺,元世祖中统(1260~1264年)灵严寺皇帝圣旨国师圣旨碑,上截蒙文、下截汉文;河北易县,至顺二年(1331年)易州加封孔子制诏碑和至正十二年(1352年)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等。这些碑文均将汉文与蒙古八思巴文合刻于一石,对研究八思巴文是珍贵的材料。

在周氏的元代藏拓中,还集中了陕西周至地区的不少拓本,如元定宗元年(1264年)万寿宫记,孟攀鳞撰文,张志敬正书,孔元措篆额;周至地区终南山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李守宁碑,何道宁撰文,李道谦正书,骆天骧篆额;中统三年(1262年)杨明真人碑,禹谦撰文,李道谦正书并篆额;中统四年(1264年)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李鼎撰文,朱象先正书,刘道常刻;至元七年(1270年)李尊师道行碑,李道谦撰文,庞志和书丹并篆额;至元九年(1272年)诚明真人道行碑;至元十一年(1274年)筠溪道院碑;至元十二年(1275年)终南山重阳宫金真教祖碑;至元十三年(1276年)重阳祖师仙迹碑;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潞水记;至元二十年(1283年)马宗师道行碑;至元二十年元真人赵公道行碑;至元三十年(1293年)圆明真人传;元贞元年(1295年)尹吉平碑,亦称:“大元尹宗师碑”;大德七年(1303年)“大宗圣宫建文始殿记”在终南山古楼观;大德十年(1306年)李道谦道行碑;延祐七年(1320年)云真人道行碑等。

收藏中元代时期河北境内碑拓有:蓟县盘山元中统四年(1263年)提点大师荣公塔铭,僧圆莹撰文并正书、刘德义刻石。元氏县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元氏县重修庙学记,李治撰文、男玩复正书,李金篆额。易县岳王庙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的重修北岳庙碑,赵庸撰文、王秉彝正书并篆额。易县至元二十三年宗政书王德成辞世颂。曲阳

县郭家庄安庆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详公和尚遗行记,僧善明正书并篆额。完县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州重修孝烈将军庙记,刘庭直撰文并正书。元氏县大德元年(1297年)重修神应王庙记,陈洵礼正书。正定县大德五年(1310年)龙兴寺重修大觉六师殿记,沙门永住撰文、沙门显仁正书并篆额。正定县延祐五年(1318年)龙兴寺长明灯钱记,僧永恩正书。赞皇县大德十年(1306年)开化寺重修常住佛殿记,贺宗儒撰文、赵淑能书、张赞篆额。满城县至顺三年(1332年)抱阳山祷雨感应记,陈肯堂撰文,张本正书。唐县前至元年间葛洪山塔记题刻8种。易县至正九年(1349年)开元寺三门记,僧雪嗣撰文、高执中正书并篆额。正定县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王访撰文并正书,周伯琦题额。获鹿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康节邵先生题淮阴侯庙诗,高健正书并跋。元氏县元统二年(1334年)开化寺重修圣象法堂记,昔里改牙撰文、僧善寿正书。至正十六年(1356年)易县的龙池神庙碑,张瑾撰文并分书等。

此外,还有属于今北京市境内的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崇国寺札子,《金石汇目分编·顺天府·京师卷》载原石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内。属于今房山区境内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广公大宗师碑,王颀撰文,西云子安书丹,安藏篆额。至元十八年(1281)六聘山天开寺碑,魏必复撰文并正书,沙门居实篆额。至正十年(1350)州儒学藏书记,吴当撰文,贡师泰正书等。这些藏拓在《京畿金石考》、《金石汇目分编》中多有著录。

四、山东、云峰山诸刻石和 河北曲阳北岳庙碑

1. 山东、云峰山诸刻石

在周氏的藏拓中,有相当一部分拓片,集中了山东一些地区的石刻碑文,如掖县东南云峰山、大基山和平度县北的天柱山,在这一带的崖壁上,分布有30余处摩崖题刻,

均为北魏书法家郑道昭、郑述祖父子的手迹。方若在《校碑随笔》中称云峰山全拓为47种,并以“云峰山石刻”之名统称。这些拓本在周氏的藏拓中就集中了20多种,其中以云峰诸山中著名的《郑文公下碑》的拓本保存的最为完好。郑文公为郑义的称号,故或称《郑义碑》,为郑义之子郑道昭为颂扬其父所作的功德文。该碑刊刻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其书体方整宽博,敦厚圆润,用笔方圆皆备,且文长字整,清晰完好。杨震方先生在《碑帖叙录》中说:“碑字有篆之气势,分隶之雅,草书之情理,经包世臣激赏后,顿时有名”,康有为称北魏圆笔之宗。周氏藏拓为整纸拓本,保存较为完好,拓片长185厘米,宽208厘米。《论经书诗》云峰山摩崖刻之一,也是郑道昭诗刻中最有名者。文楷书20行,前10行21字;后10行7字至20字不等,字径6寸,字体雄浑深厚,尤瘦健绝伦。《观海童诗》为同一时期所作,楷书12行,字径约4寸,因首行题“诗五言,登云峰山,观海童,郑道昭作”,知道是郑道昭书所刻自咏之诗。清叶昌炽认为,以诗题刻于石,此为最早者,《大基山诗刻》又名《置仙坛诗刻》掖县大基山摩崖。碑文楷书13行,行字不等,字径3寸许,为郑道昭所书自咏五言诗刻,笔致雄浑,可与其《论经书诗》相比。

“天柱山刻字”,在平度县天柱山。其代表作有《郑文公上碑》,上碑内容与下碑基本相同,只是字迹略小,石磨减甚,字多难读。平度县天柱山的《东湛石室铭》也是永平四年(511年)摩崖刻,碑文楷书10行,行字不等,字径大3寸,也系郑道昭之作。此外,在天柱山还有郑道昭题字数种,故有“此天柱之山”,“上游天柱山下息云峰”之说,字径5寸或7寸的大楷亦存此山,这些在藏拓中均有整纸拓本。《重登云峰山记》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刻,在掖县云峰山之东,为郑道昭之子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其父道昭的遗迹而刻,由郑述祖自撰并隶书。《天柱山铭》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刻,位于掖县大基山东湛石室中,同为郑述祖自撰自书,隶书20

行,行23字,字体方整,有汉魏遗法。《云居馆山门题刻》与“天柱山铭”为同一时期所刻,此刻郑述祖官衔较其他刻石详细,可补史之逸文,其书法整正遒劲,为北齐代表作品。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中有录文及较详细考证。周氏藏拓均为整纸拓本,基本完好。

关于云峰山诸刻石是否皆出自郑道昭、郑述祖之笔,学术界一直就有争论,(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谈及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研究文章,可见山东石刻艺术馆编辑的《云峰诸山北朝刻石讨论会论文集》。

2. 河北曲阳北岳庙碑

位于河北曲阳县城内西部的北岳庙。原名北岳安天王圣帝庙,简称北岳真君庙,是历代帝王遥祭北岳恒山之神的场所。北岳为五岳之一。西汉武帝刘彻大兴祭祀五岳之神,天汉三年(98年)武帝于曲阳祭祀北岳庙神,北魏宣武帝年间(500~512年)始建北岳庙。历代沿袭成制,屡经扩建,颇具规模。庙内碑碣林立,现存北魏至明清碑碣共137通,其中不乏书法之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北岳庙中历代的祭祀北岳之神和记录寺庙修缮情况的碑文拓本,在周氏的藏拓中不下十几种拓本。唐代的有:“大唐北岳府君之碑”,碑刻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九年(721年)三月。韦虚心撰文,陈怀志书。行书20行,行47字,额楷书,碑阴碑侧皆唐人题诗及题名。收入清翁方纲《唐碑选》中,系唐行书碑中之杰作。它是北岳庙唐碑中最早,也是较重要的一通。“北岳恒山祠碑”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八月。唐中书令张嘉贞撰文并书丹,额篆题“北岳恒山祠碑”6字。碑文行书,22行,行46字。此碑系张嘉贞任定州刺史时,于开元十五年为北岳庙所作的颂文,亦是北岳庙中较高大的唐碑之一。字体结构严谨,潇洒清秀,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而且对研究北岳庙的历史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宝刻类编》载:“张

嘉贞撰北岳碑并书,开元十五年八月真定”;《金石萃编》载:“北岳恒山祠碑,碑高一丈三尺六寸五分,广六尺六寸五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六字,行书,在曲阳北岳庙。”《寰宇访碑录》、《京畿金石考》、《畿辅通志》等也都有著录。北岳神庙碑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闰十一月。陈州长史郑子春撰文,博陵崔瓌书丹,安喜县尉李逖篆额。碑额篆书“大唐北岳神庙之碑”8字,碑文为八分书(即汉隶),26行,行51字。碑文具有明显的汉隶风格,遒逸泼磔,神韵浑厚,碑体高大,隶书篇幅宏伟,显得气势不凡,在北岳庙碑刻中堪称壮观之作。关于此碑历代金石学家也多有著录。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全称:“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碑刻于唐天宝七年(748年),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文,吴郡戴千龄书丹并篆额。碑额篆书“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12字。碑文隶书23行,行45字。碑阴记载了贾循的德政记,(关于贾循史书有记载)康杰撰文,亦为戴千龄所书。此碑历来称唐碑之奇伟之作,别有师承,戴千龄笔法淳古,方劲有力。且碑刻于“安史之乱”之前,对于研究唐代历史颇有价值。此碑在《金石萃编》中有著录。

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刻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承奉郎知制诰王禹偁奉敕撰文,黄仲英书丹,葛湍篆额。碑文行书,35行,行68字。额篆书“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之碑”,碑文首行题曰:“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碑系奉敕之碑,不仅碑身高大,而且书法潇洒俊拔,碑文内容价值很高,对研究北岳庙的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北岳醺告文,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宋真宗御制文,是宋真宗为祭祀北岳安天王而撰写的醺告文。北岳安天元圣帝碑全称:“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并序”,碑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陈彭年撰文,翰林侍诏邢守元书丹并篆额。额篆书“北岳安天元圣帝碑”8字。碑文行书32行,行70字。字体

潇洒大方,结构匀称美观,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关于此碑历代金石学家亦多有著录。《金石萃编》载:“北岳安天元圣帝碑”,碑高1丈3尺8寸,广4尺4寸,32行,行70字,行书,在曲阳县北岳庙。重修北岳庙记,碑刻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15年)正月十九日。资政殿大学士韩琦撰文并书丹,楷书22行,行46字。朝奉郎钱贻范篆额。有碑阴,作三截书,上11行,中9行,下7行。每行字数10至36字不等。“此碑书体仿颜真卿体而时时露出柳(公权)骨,锋距四出,不可逼视。”见杨振芳《碑帖叙录》载。历代金石学家对此碑亦多有著录。此拓本在周氏藏拓中为整纸拓本,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此外还有北岳庙中的北宋绍圣四年的碑文拓本北岳大殿增建引檐记。

北岳庙中的元代碑文拓本有:封加北岳帝号碑,碑刻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嘉议大夫□□书,张志仙篆额。蒙古文部分,撰文和书丹者不清。碑文分上下两截。上截为蒙古文,10行,行14字;下截为汉文,为蒙古文之释文,楷书10行,行14字。碑额篆书“大元封加北岳之诏碑”2行,9字。此碑剥泐严重,因之拓本亦残泐不清。碑系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封北岳之神而下的诏告。代祀北岳之记,碑刻于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揭傒斯撰文并书丹,尚师简篆额。碑文楷书15行,行34字。额篆书“代祀北岳之记”。此碑《寰宇访碑录》、《金石汇目分编》等均有著录。代祀北岳之记碑,碑刻于元惠宗至元十三年(1353年),宋绍明撰文,邢恕书丹并篆额。碑文楷书17行,行31字。额楷书题字“代祀北岳之记”,碑文主要内容为元顺帝派遣大臣到北岳庙祭祀活动的原因、规模及目的。祈求北岳之神保佑国家平安,百姓幸福。关于此碑,《寰宇访碑录》、《金石汇目分编》等均有著录。

五、结束语

本文所列举的拓本,仅仅是周氏藏拓的一部分。待条件具备时将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发表其全部目录汇编。尽管其中一些碑刻的不同拓本也有发表于世的,但我们认为整纸拓本,能够体现出原碑的完整面貌,这正是这批资料的珍贵之处。

赵超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提出:“石刻拓本不仅是保存和介绍石刻铭文、图像的得力工具,也是一种颇具价值的文物,由于中国文化中利用拓本的历史十分久远,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古代拓本大都是文物珍品,唐、宋拓本不必说,就是明清拓本,甚至原石已佚的近代拓本都可以列入国家文物”。这段话概括了拓本的文物价值之所在。

参考书目:

- 宋欧阳修《集古录》
- 宋赵明诚《金石录》
- 清王昶《金石萃编》
-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京畿金石考》
- 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
- 毕沅《山左金石志》、《中州金石记》
- 王象之《舆地碑记目》
- 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光绪顺天府志》
- 樊彬《畿辅碑目》
- 洪颐煊《平津读碑记》
-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
- 杨震芳《碑帖叙录》
- 袁维春《秦汉碑述》
-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 韩锐《〈语石〉校注》
-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考》
-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干部)

金门闸

与清代永定河水患治理

● 杨亦武

永定河古称漯水、治水,又名卢沟、浑河、无定河,发源于黄土高原,上游支派众多,山坡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河水含沙量大,导致中下游严重淤积,加上上游束行于两山峡谷,流速湍急,出山之后,奔流急泄,来势汹涌,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给沿岸地区造成严重灾难。

为了抵御永定河灾害,自辽代始历代统治者都曾对永定河进行治理。明代堤防工程较前代规模更大,石景山石堤更加巩固,以下堤防自卢沟桥南出丰台,经今京郊房

山、大兴、河北涿州、固安、新城、雄县至霸州。有清一代,自入关以后的首位皇帝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至末帝宣统元年(1909年),历10帝257年,把永定河治理列为一项重大国事,常年督办。永定河上的重要水利工程金门闸,便是清代二百多年间永定河治理的历史见证。

金门闸的创建与康熙的治河方略

金门闸位于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南、韩
金门闸全貌



营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清代右岸称南岸,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十四号段。金门闸创建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原址在窑上乡任营村南、窑上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清代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八号段^①。此地原为老君堂村地界,对岸与今大兴县北章客隔河相望。现在的金门闸是该闸创建37年后的清乾隆三年(1738年)移建于此的。

金门闸的创建与康熙时期的永定河治河方略密切相关。清初,永定河称“浑河”。清顺治九年(1652年),动工修筑石景山以南至卢沟桥决口堤岸,这是清代永定河治理的开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采取“疏筑兼施”的策略,命直隶巡抚于成龙对上游起自卢沟桥南良乡县老君堂村(今房山区窑上村与任营村之间)下游至永清县朱家庄(今河北永清县小朱庄)长达145里的永定河段进行全面统筹治理,建立起京南百余里的永定河两岸堤防体系。是年,康熙帝赐名永定河。

康熙帝于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翌年(1700年)二月先后两次亲临永定河巡视考察,遍观全河形势,意识到永定河水患皆由淤淤所至,因此把治沙列为治河重点,康熙一改传统清淤治沙的办法,由被动人工清淤改为以水主动攻沙,一方面筑堤束水,增加河水流速,以自身河水攻沙,一方面把莽牛河清水引入永定河,以外来清水攻沙,名曰以清刷浑。

康熙四十年(1701年)三月,郎中佛保、永定河南北岸分司齐苏勒、色图浑,在宛平县南、竹络坝北(今房山区任营村与窑上村之间)建金门闸。自老君堂东南将莽牛河堵塞,于莽牛河与永定河之间,斜向竹络坝北挑引河一道,长5里,名小清河,将莽牛河清水逼入永定河,以实施康熙帝借清刷浑的既定方略。为控制水流,在竹络坝北的小清河入口处的永定河堤岸间建草坝一座,口门宽2丈,名金门闸。^②四月八日工竣,开闸放水,^③引入永定河。金门闸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及其配套工程小清河,却是康熙时期永定河清淤排沙的关键水利工程,是当年永定

河防治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齐苏勒将金门闸改建成石闸,永定河水大则闭,防浑水倒漾,水小则开,引莽牛河清水入永定河攻沙。金门宽2丈,入深1.2丈,两金刚墙高8尺,南北护以埽坝,各长5丈,宽1丈,高6尺。^④闸河旁还设有一只镇河铁狗,因此后来便称此段堤防为铁狗堤。

雍正时期,基本因循康熙治河办法。这一时期,金门闸作为永定河上引莽牛河清水排沙的关键性水利工程,在永定河水患防治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二年(1724年),曾修缮金门闸。于金门闸旧埽下增下新埽二道,闸东溜增筑鸡嘴坝一道,围长21丈,尾宽6.5丈,鸡嘴坝东护崖,下近水埽二道。金门闸下溜接旧埽下,增下顺水埽二道,各长1丈。配合金门闸修缮,于闸侧筑新河堤190丈,顶宽2丈,底宽5丈,高6尺至1丈不等。修缮旧大堤一段,长450丈,加高六七尺不等,顶宽2丈,底宽5丈。用银5614两9分余。这是金门闸创改建后第一次修缮。^⑤

金门闸的移建与乾隆的治水探索

康熙时期所采取的疏浚河道,修筑堤防,以水攻沙等治河方略,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客观地说,康熙时期的永定河治理有其局限性,它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缓解了患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永定河淤淤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根治永定河水患。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永定河四次决溢。至乾隆初,永定河淤势向上蔓延,至上游河水出山之口三家店以下的石景山。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永定河伏汛,洪水涨漫卢沟桥面,过堤顶,冲刷石景山土堤一处。又漫南岸金门闸铁狗堤等8处,北岸张客(今大兴县北章客)等22处,全河漫决达40余处。南二工八号的金门闸,本因永定河河床淤高,莽牛河清水难入,废置有年,乾隆二年的正当南岸决漫处,被大水彻底冲垮,小清河也被泥沙淤平。

金门闸——这一康熙时期重要的引水排沙工程终于被洪水毁废。^⑥

这是康熙治河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这次水灾标志着清永定河治理史上康、雍时代的结束。

当年“疏筑兼施”的故策于事无补,所谓“浚筑皆穷”。如何治理永定河,有效地解决永定河水患,急迫地摆在乾隆皇帝面前。乾隆二年(1737年)七月初九日,乾隆帝立即派出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等官员前往永定河沿岸勘察河情,会同直隶总督李卫与总河会筹办理修河事。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提出了效仿黄河治理方法,于永定河两岸筑十里遥堤主张,被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议奏搁置。^⑦于是乾隆特命大学士鄂尔泰亲往永定河筹度,以求善策。鄂尔泰提出了改导下口,在上游两岸建闸坝、开引河,减水分流,再自下而上疏浚河道淤沙的主张,并借鉴康熙以清刷浑的排沙成策,建议将引河下游导入清河,以除沙淤。鄂尔泰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即被采纳。^⑧这一主张后来被乾隆帝发展成为乾隆时代的主导治河方略。

依照鄂尔泰的方案,乾隆三年(1738年),在永定河右岸建良乡金门闸坝、永清郭家务闸坝。金门闸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以前永定河通向莽牛河的旁支故道下接莽牛河为引河,郭家务坝以雍正四年(1726年)以前郭家务以下的永定河故道为引河。^⑨

再建的金门闸从南二工八号南移至数里外的南二工十四号,即今窑上村南、韩营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也就是现存金门闸的位置。乾隆三年(1738年)所建金门闸改为减水石坝,金门宽56丈,进深5丈,石迎水簸箕内宽56丈,外宽61.4丈,进深2丈,石出水簸箕内宽56丈,外宽67.3丈,进深9丈。南北两坝台,各宽12丈,进深16丈,金墙高8尺。灰迎水簸箕内宽75丈,外宽85丈,进深5丈,灰出水簸箕内宽75丈,外宽85丈,进深15丈。南北迎水雁翅各长30丈,北出水雁翅长30丈,南出水雁翅长60丈。用银186112两有奇。此金门闸与

原南二工八号康熙金门闸功能完全不同,原金门闸是引水闸,是节制小清河所引莽牛河排沙清水进永定河。而再建的金门闸是排水闸,是永定河上游的一项分洪减水工程,但仍袭用了康熙金门闸旧称。^⑩

顾琮“十里遥堤”的治河主张虽被否决,但是后来却演变成令永定河渐复故道的治河主张,从而导致了乾隆皇帝早期治河的失误。

乾隆三年(1738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改授直隶总督,他与兵部尚书协办户部尚书果毅公讷亲一同上奏乾隆帝:使永定河复其故道,恢复康熙三十七年治河前状态,无堤无岸,听其漫流。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孙嘉淦向乾隆帝《疏》陈,于两岸筑坝,开引河,导永定河复故道的具体计划。乾隆帝批复:“果如是,诚为善举,且试为之。”

乾隆四年(1739年),导永定河复故道的计划启动,乾隆帝命讷亲勘察永定河故道。开金门闸坝引河,两股分流,西股自闸下至长安城,东西两股引河自汇流处起至霸州张贵庄西南入中亭河,计西引河长119里,东引河自固安毕家庄起至杨青口南,长48里。在南岸金门闸以下的宛平长安城(今河北涿州市长安城村)、永清曹家务,北岸的宛平求贤村(今北京大兴县求贤村)、永清半截河村,共建草坝4座。

乾隆五年(1740年),复永定河故道。九月初六日兴工,挑浚永定河槽270余丈,导流至金门闸口外通引河。十三日,河道总督顾琮、直隶总督孙嘉淦亲临金门闸,开挖金门闸之上重堤20丈作为永定河出水口,十五日各工具竣,十六日辰时开放河水,将永定河全溜导入引河永定河故道。不料,凌汛过猛,固安、良乡、新城、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多被水淹。显然,水势汹涌的永定河没有固定的河道和堤防是不行的。乾隆六年(1741年)初,即将金门闸侧永定河出水堤口堵筑,使永定河归流。^⑪这是乾隆时代永定河治理的一次严重失误。

乾隆六年(1741年)十一月,直隶总督高斌上疏,建议以永清冰窖至洞子门一线改

为下口尾闾正道,“下口既通,上游应筹分泄,使泛涨、盛涨之水皆有分泄。”^⑫实际上又回到鄂尔泰的治河主张上来。根据此议,年底,浚新河下口以下,挑葛渔城河槽,两岸自上游以下,完善分泄工程。^⑬上游南二工关键的分洪设施金门闸滚水石坝,因坝身过高常汛不能泄水,将中间 18 丈,下落 1.5 尺,常汛可从下落处减泄,盛涨全坝漫泄,七年(1742 年)竣工。又于南六工双营、北三工胡林、七工小惠庄添筑三合土滚水坝 3 座,以备宣泄汛期盛涨之水。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直隶总督杨廷璋奏:河身淤高,泄水过大,金门闸落低处进深 1.2 丈,补平如旧,添建尖脊石龙骨 56 丈,高 2.5 尺,如所请。三十五年(1770)工竣。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帝命大学士高晋、工部尚书裘曰修,会同直隶总督周元理兴举大工,治理永定河。是年春,乾隆曾亲临永定河巡视,从北二工九号渡河,循南二工,经金门闸至头工,驻蹕良乡县黄新庄行宫(在今房山区黄新庄村),谒西陵归途,到永定河下口条河头阅视全河形势。^⑭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全面、大规模永定河治理,是乾隆时代永定河治理盛期的标志。此番治理是以明确的方略为指导的,即:“疏中泓,挑下口,以畅其势。坚筑两岸堤防,以防其冲突。深浚减河,以分其盛势。”^⑮它是乾隆帝永定河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乾隆时代治河理论的成熟。这一治河方略成为此后清历代永定河治理的既定方略。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三月初,乾隆帝再临永定河巡视,阅金门闸,面谕直隶总督周元理,于金门闸上建挑水坝,使水势迂回过闸。又谕两岸大堤邦内多种卧柳以资捍御,这是一项具有乾隆时代特色的河防措施,当春即被实施。六月,乾隆帝谕周元理:督饬河员,于金门闸过水之处,即为挑浚,务使淤积尽涤,水流畅行,以资宣泄。数月之内两谕金门闸事,乾隆帝如此重视金门闸,实因这一分泄工程事关永定河全局安危。

是年,河员遵照乾隆帝指示,修金门闸,添筑挑水草坝 1 座,长 10 丈。^⑯

清代后期金门闸的修治

乾隆时代以后的嘉、道、咸、同、光诸代的永定河治理,基本因乾隆成法。金门闸一直作为永定河减河上的一个关键的分洪减水工程存在。

嘉庆二年(1797 年)伏汛,南头工、二工决漫,冲决金门闸石龙骨二十余丈,挑水草坝亦损,旋即补筑。十五年(1810 年)七月九日永定河两岸同时漫口,金门闸迎水雁翅被冲垮,闸口泄水过大,恐夺溜,筑埝堵闭。

自嘉庆十五年(1810 年)首开堵闸之例,至道光初,金门闸口河底淤高,年久失修,闸墙、雁翅、龙骨、海漫、簸箕低矮酥碎,残坏严重,恐放水造成夺溜,久筑拦埝,已滴水不能渲泄。嘉庆末以来,永定河决溢频繁。道光三年(1823 年)九月十七日,当道光帝在良乡县黄新庄行宫询问永定河防治情况时,河臣张文浩力奏,金门闸事关永定河分泄,亟须修治。

道光四年(1824 年)春,起工拆修金门闸,拆去尖脊龙骨,改建平龙骨,高 4.5 尺,长 56 丈,顶宽 5 尺,迎水坡斜宽 6.3 尺,出水坡斜宽 1.35 丈,两金刚墙加高 4 尺,补砌石海漫,筑迎水、出水灰簸箕、灰雁翅,长 13 丈,宽 2 丈,连槽高 3.85 尺,下牙椿护埝,挑水顺水埝坝,砌片石坦坡。挑挖闸塘淤沙,挑引河 40 丈,减河 3460 丈。这是乾隆以后,金门闸的第一次大修,耗银 103451 两。勒碑记修闸事,立于金门闸侧。

道光十年(1830 年),河底淤高,闭金门闸。十一年(1831 年)重修,加高石龙骨 1.2 尺,迎水一面砌石坦坡,上长 56 丈,下长 59 丈,顶宽 2 尺,底宽 8 尺,高 5.7 尺。二十二年(1842 年)十一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将金门闸龙骨加高 3 尺于海漫下接修散水石 1 丈,并补缺。^⑰二十三年(1843 年)兴工,拆卸石龙骨 1.2 尺,加高 3 尺,海漫下接修散水石 9 尺,厚 1 尺。



金门闸引水簸箕(局部)



金门闸送水神牛



金门闸镇水神狮

同治五年(1866年),河底继续淤高,再度筑埝堵塞金门闸口,此后历年,虽连遭漫口之患,金门闸一直堵闭,涓滴不敢渲泄,闸坝遂废而不治,至十年(1871年)河底淤高已与龙骨平。十一年(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重修,二月二十日开工,旧龙骨高7.8尺,全部拆除,进移5尺,重筑新龙骨,龙骨长56丈,中段20丈,比旧龙骨升高4尺,两头各18丈,升高5尺,建新龙骨进深加宽至6丈,下接旧海漫,上斜作坦坡形,以使水平缓过闸,这样,就防止了出闸水势过猛,毁及金墙和海漫,或意外夺溜。南坝台未动,北坝台东面南移9丈,与龙骨紧接。坝墙内外镶护闸埝,仍于龙骨上添设拦水埝一道。疏通闸下减河,由董村入小清河(即莽牛河,后称小清河)4170丈。重修讯房,建碑亭于闸侧,勒碑记事。五月底工竣。是为第二次大修,耗银64742两。^⑭同治十三年(1874年),将龙骨中段20丈,下段10丈,照中段原尺寸落低1.7尺。光绪二年(1876年),龙骨中段20丈,加高1.2尺,下段10丈加高1.5尺,迎水坡加高1尺。六年(1880年),加高龙骨中段、下段,共30丈,与两头原龙骨平。^⑮

金门闸,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一项不朽的工程,凝聚清历代河员与工程建设者的聪明和智慧。但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207年间,金门闸一直是一道横在永定河堤口的坝,以坝位高低控制水量。既是闸,应筑闸涵,设闸板,以便灵活启闭收放,控制水量。坝则是固定的,不能控制自如。河员一向用拆、筑龙骨的办法调节泄水,渲泄不利拆卸龙骨,降低坝位,渲泄过盛则增筑龙骨,提升坝位。繁工误时,糜费财力,收效不大。永定河沙淤严重,河底不时淤高,坝位常见淤低,再升龙骨,再见淤低,恶性循环。惟恐夺溜,便筑埝拦闸,弃置不用。由于金门闸无闸涵,筑坝横于闸口,洪水泄出闸口时,闸体承受巨大的冲击,易损坏。故创建以来三十年一大修,数年一小修,这便限制和影响了金门闸功能作用的发挥。

自宣统元年(1909年),金门闸终于改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闸。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永定河道吕佩芬,金门闸的工程设计者和工程师则是张黼廷。张黼廷重新设计,改坝为闸。重建的金门闸石龙骨减为32丈,上辟闸涵15道,涵高8尺,宽4尺。各涵设闸板,可任意启闭,控制泄水。闸上平板为桥,上铺黄土,可供行人往来。二月初经始,五月末告成。^⑯宣统金门闸,完全是按现代涵闸原理和构造设计的,实现了金门闸建设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永定河水利工程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经宣统重建后,金门闸一直保存至今。其间,1937年改建南二涵为铁闸板,1971年复加改建,引水灌溉,其余各涵均填废,闸板、桥板已失。

永定河治理的思考

水利,事关国计民生,为国之要务。治则为利,不治则为害。有清一代,从顺治九年(1652年)修筑石景山以南至卢沟桥决口堤岸,至末帝宣统元年(1909年)大修改建金门闸,苦求善策,历费巨帑,立官守,设河兵,役民夫,对永定河长治不懈,可谓不遗余力。客观地说,清代永定河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永定河水患的发生和灾害,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治理,永定河造成的灾患是不可想象的。

在治河方略上,清历代总结、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清代永定河治理的基本做法是:挑挖下口,使河水去路通畅,也就是“宣下口”;自下而上清淤挖沙,疏浚河道,使河水一路顺行不受梗阻,也就是“浚中泓”;再自上游起,两岸建闸坝、开引河(减河)以泄洪分流,缓减水势,也就是“开支河”;同时修缮、筑固两岸堤防,以防决漫,也就是“辅之以筑”。这些作法是成功的,以至成为当今永定河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清代治河没有解决永定河为患的根本问题。

永定河造成水患有三个根本原因,一是河水含沙量大,二是尾闾入淀,没有入海口,

河水夹带的泥沙不能排入大海。于是泥沙沉积,淤淀淤河,以至下口淤塞,河道浅梗。三是上游一路夹山峡而行,于三家店出山后水势迅猛,排山倒海。所以,洪水骤至,下无排泄之口,中无容纳之河,一路溃决,全河泛滥。

因此,治河首先要治沙,治沙要以清源为本,辅以疏浚。清源就是要从源头入手,采取措施,减少,乃至彻底根除河水泥沙,这就要在源头各大小支流流域,改善植被,辅以它策,减少、根治水土流失,清除永定河泥沙来源。而清代治沙,只是停留在石景山以下河道疏浚上,河日疏而沙日淤,所以历代河员颇有人不胜天之叹。

其次,开通永定河入海通道,使永定河直接达海,河水如夹泥沙即可排入大海,不至淤淀淤河,梗阻水道。清代也曾任疏通永定河去路上动脑筋,但只是在下流诸淀间屡挑下口,未革永定河入淀之弊。至于给永定河开挖独自的入海通道,清人未曾考虑。到了光绪年间,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已经意识到永定河淤塞在于下游无人海口,述及永定河疏浚时曾论道:“永定河与黄河异,黄河之沙可以自达入海,永定河则沙停于淀,愈停愈高,病在下口。”^{②1}但是这种卓见并未成为决策者的治河主张,即便纳此上策,国力尤恐不抵。

其三,则应于三家店以上建设配套蓄洪设施,足以拦蓄洪水,缓解水势,使水流舒缓出山,这样汛期便无水盛决岸之虞。而清代于此无所作为。乾隆九年(1744年),曾在桑干河与妫水汇合处的和合堡(今官厅附近)建小石坝两道,不久即被洪水冲毁。随后,乾隆帝设想:“于旷远无碍之地,使之稍落泥沙,微救涌急。”并派人到上游山峡勘测,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落后,没有结果,只好作罢。^{②2}乾隆时期在永定河上游山峡地区的举动,只是出于“收束河流,以杀水势”的目的,根本没有在上游建设关系全局的大型蓄洪控水工程的构想,更没能意识到上游大型蓄洪控水工程对永定河全局的关键作用,主要注意力放在卢沟桥以下河段,

而以开减河分流作为减缓水势的对策,今天看来,减水分流只能作为辅助措施。

可见,清代治理永定河,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但是治标未治本,没有抓住治沙治水的关键,即使一时缓解患情,却不能避免水患发生。所以,从顺治九年(1652年)至末帝宣统元年(1909年)的257年,既是一部永定河治理史,又是一部永定河灾患史。

清代永定河治理策略上的缺憾,受其历史的局限,但足以给今人以启示。新中国成立后,借鉴前代成功经验,总结历史教训,从治沙入手,根治永定河水患,已取得重大突破:

在上游源头流域,封山育林,改善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开等高倒坡梯田,以保持水土,建拦沙谷坊,阻止泥沙下流,永定水的含沙量已大为减少,从而大大缓解了永定河石景山以下河道的淤积。1954年,在上游建成蓄水工程官厅水库,基本控制了永定河官厅以上流域的洪水。其后在上游各支流修建大、中、小型水库300余座;在官厅峡建斋堂、苇子水等中小型水库,并修建珠窝、落坡岭、三家店等拦河闸坝,又于卢沟桥南右岸建小清河分洪闸。永定河水势得到有效控制。在下游开挖了永定河新河,直达海口,永定河有了自己的出海口,所携泥沙可直接排入大海。筑两岸堤防,对部分险工险段进行护砌。从全流域着眼,初步形成了永定河防洪工程体系,永定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②3}

但是,我们尚不能说,永定河不再为患。永定河的治理使命尚未完成。近年来,永定河未发生水患,一方面是有防洪工程作保障,一方面北方连年干旱,永定河几乎常年断流。如果遇到三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洪水,永定河会怎么样呢?为永定河的长治久安计,我们应以五十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继续建设永定河防洪体系。进一步完善上游流域地区的生物工程,逐步形成植被封闭,使永定河浊水变清,无沙可淤。及时清除官厅水库淤积,

以维持水库寿命和防洪效果;同时应在上游适当的位置再建一座大型水库,以确保大洪、特大洪之年,永定河水势得到控制,彻底束住永定河这匹野马,使永定河有洪无险,一路平稳。通疏石景山至下游入海处,清除淤梗,挖深河道,确保河道通畅。坚固两岸堤防,统筹规划分洪工程。

永定河流经首都北京,两岸地域广阔,人口稠密,事关首都的安危、沿岸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永定河的进一步治理愈加迫切。确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面对永定河,面对金门闸的时候,永定河水患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①其址为老君堂村界,该村为南二工八号。《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五·河工一:“南二工,良乡县丞,管堤二十二里七分,……八号,老君堂村、兴隆庄重。”老君堂村后来被永定河洪水吞没,现在已无此村。

②《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四·水道四:“小清河出莽牛河,在竹络坝西北五里老君堂东,南岸起自沙堤止,其水入永定河,借清刷浑也。”(一三九〇页)。《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九·河工五:“康熙四十年三月,建草闸,在宛平县南,竹络坝北,时郎中佛保、南北岸分司齐苏勒、色图浑,自老君堂东南岸开小清河一道,故以草闸束水,口门宽二丈,引莽牛河清水入之,盖借清刷浑也。”(一五七七页)。《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一·河工七:“康熙四十年,开老君堂小清河。莽牛河居琉璃河上游老君堂村,斜向竹络坝五里,开小清河一道,修坝,将莽牛河水逼入永定河。”(一六九九页)。

③《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一·河工七:“将莽牛河堵塞,对永定河开挖,修建草坝,四月八日放水,引入永定河。”(一七〇〇页)

④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九·河工五。一五七七至一五七八页。

⑤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一四四九页。

⑥《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九·河工五:“后正河淤高,清水难入,闸废。乾隆二年,水大漫决闸址,

铁狗俱埋。”(一五七八页)。

⑦《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载乾隆二年(1737)八月《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议奏》。一四六〇至一四六一页。

⑧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载乾隆二年(1737)九月《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奏》。一四六三至一四六七页。

⑨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一四六一页。

⑩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九·河工五。一五七八页。

⑪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一四六八至一四七四页。

⑫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一四八二至一四八三页。

⑬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一四七四页。

⑭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六·河工二(一五〇〇至一五〇二页),乾隆三十八年(1773)《永定河事宜碑》,《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九·河工五(一五七八页)。

⑮见《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七·河工三载乾隆三十六(1771)年十二月《高晋、裴日修、周元理奏》(一五〇二页)。奏中有“臣等尊圣训,指示要领”语,可知乾隆三十七年(1772)治河方略,乃出于乾隆旨意。又乾隆三十八年(1773)《永定河事宜碑》曾刊乾隆治河方略,述语稍异,而意同,碑文有:“应请,将现奉上的谕及议定章程摘叙简明条款,刊勒索丰碑,昭示来兹,庶成法永垂勿替。”语。

⑯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七·河工三。一五〇四至一五〇五页。

⑰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七·河工三。一五八〇至一五八六页。

⑱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金门减水石闸碑》。

⑲据《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九·河工五。一五六八页。

⑳据宣统元年(1909)吕佩芬《重建金门闸记》。

㉑《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五·河工一。一四三三页。

㉒㉓据段天顺著《燕水古今谈》中《最早的官厅水坝—玲珑坝小考》一文。

(作者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独具特色的禁采煤碑

·
刘义全

门头沟区煤炭蕴藏丰富,在全市已探明的39个产煤区中占有24个,探明储量为14.6亿吨占北京总储量的50%,分布面积217.3平方公里。门头沟产煤区域主要分布在百花山、鬲髻山、九龙山和石景山(石门营地区)4个向斜构造的石炭二迭系和侏罗系岩层中。1991年笔者在发掘门头沟区龙

泉务辽金瓷窑遗址时,在辽代文化层发现未燃尽的煤核,证实门头沟在辽代已用煤炭做燃料烧制瓷器,说明当时已充分掌握煤炭的特性,即有成熟的用煤历史。门头沟从古至今是京城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皇帝明确指出:“京师炊爨均赖西山之煤”。数百年来源源不断地供应京城军民及皇家生产、生活用煤。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施行过种种促进煤业生产,保障煤炭供应的政策措施。但煤田地层之上覆压众多的寺庙、古墓等文物古迹,形成煤炭生产与保护古迹的重重矛盾。为保护环境风貌和地面构筑物,明、清最高统治者敕谕严禁在皇家寺院、赐墓等构筑物地下开窑采煤,地方政府也屡次发布告示禁止在赐墓、民居构筑物地下采煤。因此,在盛产煤炭的门头沟遗存了一批史料价值很高又极有特色的禁采煤碑。

保护寺庙禁止采煤

戒台寺位于北京西部海拔690米的马鞍山,寺坐西朝东。占地面积4.4公顷,殿宇总面积8392平方米。创建于隋开皇年间。辽咸雍年间高僧法均大师在此设坛传戒,授佛教最高级别的菩提戒,寺内戒坛有“天下第一坛”之美誉。“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寺内奇松经历代僧人精心培育,饱经千年雨雪风霜的磨砺,形成奇特的造型。明清以来戒台寺已成为帝都最负盛名的寺院,清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到戒台寺游幸,为戒台寺御书大量匾额、楹联。戒台寺建筑群覆压在石炭二迭系杨家坨煤系地层之上,煤层埋藏浅易于开采。明清以来总有不法之徒妄图开采,引起帝王的高度重视,敕谕禁止在戒台寺周边采煤,寺内现存禁止采煤碑4通,可谓是中国寺庙一绝。

敕谕碑

碑立戒台寺钟楼北侧,青石质,碑高3.52米,宽0.99米,厚0.27米。额雕双螭,篆“敕谕”,碑周雕精美的行龙,方座,高浮雕行龙。碑文字迹清晰。楷书11行,满

行36字。首题：“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明宪宗朱见深撰文。成化十五年(1479年)立。

碑曰：“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佛教肇自西方，流传东土，慈悲利济，功德无量，故皇度赖之尊，安群迷资其觉悟，自昔有国家者，未尝不崇奉焉。都城之西有胜利刹，曰万寿禅寺，实古迹道场，天下僧俗受戒之处。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迩来四十余年矣。其界东至石山儿，西至罗垓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窑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基)渐坼动。司设监太监王永具悉以闻，特降敕护持之，升住持僧德令为僧录司右觉义，仍兼本寺住持，俾朝夕领众焚修祝赞，为多人造福。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以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成化十五年(1479年)六月二十二日”。

明宪宗降旨为戒台寺划定该寺四至，禁止挖窑，破坏山林，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保护戒台寺。戒台古刹能岿然屹立在马鞍山下，明朝廷曾起到过极重要的作用。此碑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级别最高、年代最早的禁止采煤碑。

万寿寺戒坛碑

碑立戒台寺山门殿外，碑青石质，高2.6米、宽1.04米、厚0.34米。额雕双螭，碑周雕行龙，碑文满汉合璧，字迹清晰。碑文13行(汉文6行)满行45字。首题：御制万寿戒坛碑记。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撰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立。

碑曰：“西山地接神京，岭岫绵亘，林壑深美，多精蓝古刹。考其历年久远，建置自唐以来者，则万寿寺戒坛为最古。寺在唐曰慧聚，明正统时始易今名。其地渡浑河，而西山径盘互，纡回而入，中复豁焉宏畅，坛殿



敕谕碑



御制万寿寺戒坛碑



戒台寺碑文



戒台寺禁矿碑

轩翼,犹见古遗制。深山长谷,乌可少此清严之宇,以眺揽名胜哉。朕以时巡,偶至斯地,辄为驻辇,顾近寺诸山,为产煤所。居民则利,日事疏剷。念精舍之侧,凿山采石,良非所宜。爰命厘定四止而禁之。俾梵境常宁,旧观勿替。於以葆灵毓秀,山川当益增辉泽尔”。

清康熙皇帝巡视西山时,住在戒台寺。发现寺周围诸山产煤,特立御制碑禁止凿山采石。对戒台寺的保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戒台寺碑

碑立于戒台寺千佛阁遗址前,汉白玉质,碑高 2.1 米,宽 0.96 米,厚 0.3 米。螭首,额篆“戒台寺记”。碑周雕行龙,碑文字体秀美有王体风格,行书 18 行,47 字满行。首题:戒台寺碑文。天津徐世昌撰并书。中华民国十年(1921 年)十二月立。

碑曰:“……马鞍一山,有唐以来沙门所居,而以戒坛闻天下者也。扶舆之气磅礴奔轳,将有所届则必有崇山穹宫,遏其冲而愈閼之以穷其妍。夫戒坛之名于幽并垂二千年,寺于唐、坛于辽、免抡于金,易名踵饰于明,丰碑,长松,石幢,浮图,辇跸之所,淹留经藏之所,容度为閼为妍,亦既备止论者,方谓太行西来雄奔之势,得斯禅宅广侈相当于足以奠神区,而号胜地。故共和以来,有司据法守护,又为之丈量其界地,毋使豪右巧夺,意至善也。客岁有治矿于山之阳者,渴泉燥石,寺僧惶走相告,二三士夫知其事,察其坑脉,固非隆郁无所底而毁隳寺宇,于法不和,又为之愬于所司禁其开采,案既定,请文矜予。予唯戒坛开矿,明清两朝先皆有禁。……又凡立国者,皆各有其宗教信仰,各葺治其居处,范以法律,勿俾废坏,东西所同也。京师寺庙当全胜时无虑,千百时代迁变,八九为墟,今所存者或附丽于苑囿,或閼伏于林扃,盖可倭指计也。然其仅存者,中外人士咸以为,古昔制度之留遗,宗教精义所寄托,互数百载逃累劫,而能岿然者也,必不可使鞠为瓦砾。部吏聚议,特为专条,躬任其保守之责,今观戒坛之寺其閼且妍也,

若此泉石之溉被蓊郁,又若彼则信乎其有护于保障,而必不可以矿而荒之。载考斯寺,辽之法均大师,金之波离尊者,明之道孚大师,皆道播寰区,为人天眼目,灵塔皆在山中,遗迹之必护惜揆矿务条亦然也,世变方毁□象教隆夷,视在人力,异时国家清宴,居京师者得筇将登山,瞻对灵迹抚诸松,而俯桑乾,北望太行蜿蜒之形,以见山川之佳,栋宇之壮,与大法同垂无穷,其必有睪然而思予言者矣,勒之贞珉,以告来者……”。

民国政府司法部门根据法律保护戒台寺,并为之丈量地界,总统又明令禁止采煤,但就在总统颁令的第二年,又有不法之徒在戒台寺界地内私自采煤,于是李国杰、张勋、张作霖、曹汝霖等46人又联名呼吁,重申戒台寺周围禁止采矿。戒台寺住持达文在诸多官僚政客的支持下,又立戒台寺禁矿碑。

戒台寺禁矿碑

碑立戒台寺天王殿前北侧。青白石质,碑高2.30米、宽0.90米、厚0.26米。螭首,额篆“戒台寺记”。碑文隶书12行,满行26字。白廷蘂撰并书。民国壬戌九月(1922年)立。

碑曰:“北地土厚水深,山多重楮,凡树木鬯蔚,号为名胜之区,则必有源泉伏焉。如京师西山戒坛寺之以松胜,盖其尤著者也,松之名不一,曰“卧龙”、曰“九龙”、曰“自在”、曰“抱塔”类,皆支离怪伟,莫能名壮。此外,如幢如盖,及具人物、鸟兽之象者,殆不胜其指数。其所以长养,若是其功,皆恃乎泉。固建寺以米(来),历唐至今,官皆为之营护,界址所届严禁凿矿,所以保泉脉也。比岁以来,屡有人私行采煤,畚耜所及,树多枯槁,甚至香积汲井皆苦胥渫,主僧达文患之,乃告诸官。去岁李君国杰等复呈请有司,据案申禁,并于四至刊立界石。……从此灵泉不竭,在山益清,老松多姿,阅世无极,吾知名蓝胜概必与太行

元气并垂无穷”。

此碑碑阴镌刻,为禁止在戒台寺附近采煤奔走呼吁的46人姓名。在人名下方有熙钰补刻的一段文字“自凿矿事起,达文力为争诉。每当事急,钰辄为之奔走呼吁,经历岁时讼乃得直。孟先君侍郎公,晚耽禅悦,尝往来山中。钰□时曾命记莒,兹寺为僧,是香火之缘,比之诸檀越,为深於义,尤为竭力也。当时诸公或联名呈请有司,或居间排解纷难,皆已泐名碑阴,□垂不朽。至此案全卷则另外排印,存於方丈,永远遵守,兹不赘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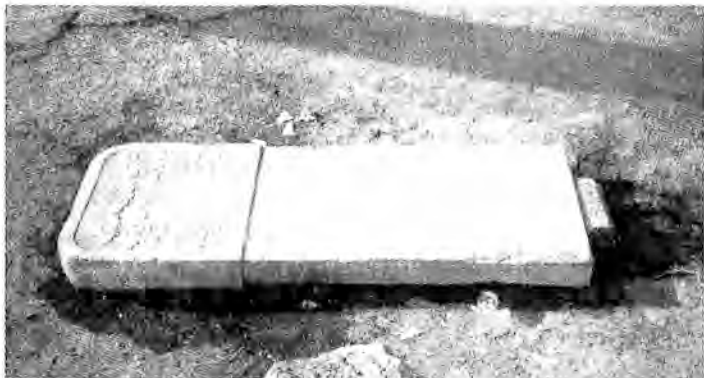
纵观中国寺庙,在同一座寺庙内,有明、清乃至民国最高统治者敕谕禁止采煤碑,仅此戒台寺一处。明清帝王及民国总统的禁采煤规定,在保护戒台寺问题上可说是其功难泯,对保护戒台寺及环境风貌起到了重大作用。

保护王坟禁止采煤

宛平县“遵旨永禁碑”

碑立军庄镇香峪村,为保护附近的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及其四子安亲王岳乐之墓而设立。碑高2.13米,宽0.8米,厚0.22米。无撰文、书丹姓名。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立。(此碑失逸,仅存抄文。)

“特授顺天府宛平县正堂加一级记录三次蔡,为勒石永禁久远事,照得香峪村地方旧有榆林、双门等煤窑,因近王坟,久经封禁在案。谋利之徒,觑各窑产煤多,而获利大,



崇化寺告示碑

每事偷采。历程前县查禁,本县灌任翻旧案,深为痛恨,正在禁查。今于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据地方王国才呈报,有民刘三、王四……开窑,经本县差拘究惩,复行封禁……,此风不能施,复经本县详请,顺天府宪移咨工部查明,封禁旧案,永远勒禁……。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安亲王坟后附近所有现刨煤窑,差工部提议给管官价承买,严行封禁,不许刨挖,钦此。……今本县查明原奏旧案,勒石晓谕,凡尔军民人等,各宜凛遵,毋蹈前辙,倘故智复,前迅具在,断不能为尔等觉也,须至碑者”。

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及其四子安亲王岳乐《清史稿·诸王传》有传。阿巴泰,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封贝勒,以后连克宝坻、顺义、昌平等5城,连胜56战,俘敌十数万,皇太极出城10里迎劳。1641年从上破洪承畴援兵13万,10月授命大将军破黄崖口、斩明鲁王,又连克天津、三河、密云等88城,俘敌36万。师还,上遣多尔衮等郊迎30里,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进郡王,顺治五年(1648年)薨。

岳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1646年)从豪格徇四川,击斩义军首领张献忠。六年(1649年)封贝勒,八年(1651年)袭郡王,改号安郡王。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耿精忠谋反,犯江西,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帅师讨之,十四年(1675年)封为亲王。十八年(1679年)平定三番之乱,十九年(1680年)回京师,上于卢沟桥南20里行郊劳礼。二十七年(1688年)同简亲王雅布前往苏尼特防葛尔丹,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薨。纵观阿巴泰父子一生,为满清定鼎中原立下了奇功伟绩。既为满清统治者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又为防止国家分裂平定了“三番之乱”,击败了与沙俄相勾结的葛尔丹叛匪,为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康熙、乾隆两朝均下旨保护墓地。

宛平县告示碑

龙泉镇城子村,碑现存崇化寺内。碑青石质,高1.48米,宽0.57米,厚0.10米。

额雕云纹。无撰文、书丹姓名。文字清晰。楷书16行,满行30字。乾隆六年(1741年)立。

“特授顺天府宛平县正堂纪录八次陈,为严行飭禁以□私开事,照得成(城)子山崇化寺山门内旧有□□,窑口附近贝子宝顶地脉相连,有□风□□经出示严禁在案。前据陈德禄等呈请开挖,蒙本府□将批飭查报审,经本县履勘议详,蒙批据详确勘,崇化寺山场煤窑距公府莹地约二里许,□产煤处所即在山岭之内,逼近坟莹,若听其开挖,於坟莹,实属有碍。等诏本府尹披阅□说:坟窑既近,地道可通,自断无可开之理。陈德禄等屡次渎请妄生覬覦甚属不合。仰即严加□论毋许再生事端,如违,定即□□仍特新旧两窑口即行堵塞,封禁立案,并于崇化寺山门内勒石,以垂永久,此缴□因批发到县蒙此除勒石永禁外,今丞出示。严禁为此示仰住持僧人并该□乡地等只悉,嗣后如有不法棍徒抗玩不遵,复蹈前辙私行开挖,许该乡地及住持僧人立即卦县指名禀报,以凭拿□尚等通□隐匿不报,察出并重究,断不轻贷,各宜禀遵□□特示。”

崇化寺贝子坟,未见记载,同时现地表未见任何墓葬遗迹。因此不知崇化寺埋葬哪一位贝子。

保护民居禁止采煤

军粮厅布告碑

碑原立板桥村三官庙,碑青石质,方首,额雕云纹,书“移风千古”。高1.63米、宽0.76米、厚0.15米。无撰文、书丹姓名。文字清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初一穀旦立。

碑曰:“特授顺天府宛平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彭,为晓谕事案,据西板桥村民韩宏良、李瑞……刘景云合村众等,先后呈控刘继兴勾串石德友、田生等私开封禁煤窑,致裂庙宇、房舍、墙垣等情一案。经军粮厅亲旨查勘,刘继兴等新开煤窑坐落西板桥东三官庙下,实系从前封禁旧窑,有碍居民房

舍,除仍旧封禁,并将刘继兴等责惩。取结附卷外,诚恐日久,愚民不知封禁缘由,复被勾串再行开挖,致伤居民庐舍,合行出示晓谕为示。仰居民人等知悉,此后该处永不准再行开做煤窑,并将此示勒石存记。如有无知棍徒胆敢偷开者,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行从重罚处,决不姑宽,各宜禀遵毋违示。”

军粮厅布告碑

碑原立板桥村三官庙,现嵌在板桥村泄洪沟边。碑青石质,高1.54米,宽0.6米。方首,额雕云,水纹及荷花,额书“百代留芳”,碑文楷书24行(正文9行),满行40字。无撰文,书丹姓名。碑身下部沾满水泥,无法拓印,其余字迹清晰。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立。

碑曰:“特授顺天府宛平县左堂,世袭云骑尉,兼管窑务,加十级记录十次林,为出示晓谕,以垂久远事。照得东、西板桥村民石得印等,赴案禀称,窃本村旧有凉水泉地内东、西坯儿煤窑两座,因有碍村舍不准开采。前因西坯儿窑私会刨挖,村众禀县,蒙查明,封禁在案。……开采煤窑如有碍村庄者,列应封禁。兹据该村民众联名具呈禀,请出示晓谕,以垂久远等情,前来合行示谕。为此示仰阎村乡地居民人等知悉,即将该窑门用石垒砌封禁,永远不许开采。嗣后如有不法之徒,擅敢私行开采者,许尔等指名赴厅禀控。以凭牒追究办,各宜禀遵毋违,特世计开”。

上述二碑,立在门头沟重要采煤区大台板桥村,记述东、西板桥村因开挖煤窑有碍村舍,村民联名禀告宛平县军粮厅,经核实后军粮厅公布封禁窑,永远不许开采,以保障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反应了当时村民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现在的东、西板桥村,因地处采空区,居民早已迁往新址,原有的东、西板桥村,现已是一片残垣断壁。

保护水源禁止采煤

维护岩子井碑

碑原立圈门里龙王庙,现存圈门小学校

内。碑青石质,高1.4米、宽0.6米、厚0.17米。方首,额雕云纹,书“万古流芳”。碑文楷书16行(正文9行),满行35字。首题:门头口村维护岩子井碑记。北平韩孟伯撰,平西张中孚书。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立。

碑曰:“盖闻水火为民生之要素,故取给之源应时刻保其充足,吾乡地处山隅,为产煤之区,燃料固夥而饮料不足。门头口村岩子井位南山之麓,数百年来为全村惟一之源,汲之不尽,取之不竭,数万人生命於是系焉……。此井水源发於青煤二碛石,西至白岩^涪口,东至圈门,南北至坡根,为其总汇之区。青煤大碛围护於下,以节其流。故来源甚旺,产量特丰。将来青煤大碛煤层如有开采之变,则泉源他溃,井水立涸,全村民生亦立将绝境也。村民有鉴于此,遂开会讨论,咸以此井乃全村生命所依,父老子弟均负督察保管之责。凡妨害此井水源之一切行动,不啻破坏全村民众生活之保障,即全村民众之公敌,自应一致力争,不得贪小利,以贻大害。缘勒此碑,以志不忘,愿世世相承,永以为鉴焉。”

门头沟在未大规模开采煤炭之前,地下水资源丰富。以门头沟(横岭、圈门至河滩)地段为例,其地三面环山,受水面积18.25平方公里。地层都是冲积沙子和卵石,缺乏黄土和其他粘土,雨水极易渗入地下。根据1954年水文观测,降水一毫米,渗入地下9500立方米。门头口一带煤层浅,储量丰富,清代以来,有百余座煤窑分布于此,故水源不足。

门头沟在历史上是京城最主要的煤炭供应基地,最迟自辽代以来,由于众多小煤窑乱采滥挖,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采煤区地下水源枯竭,危害山林植被;地面下沉,危及地面建筑。有的村落因地处采空区,被迫举村它迁。但上述禁采煤碑在历史上,确实对门头沟古刹、王陵、民居及水源的保护起到过重要作用。

(作者为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所长)

北京东岳庙香会综述

陈巴黎

明清时期的京城,庙宇林立,神明众多,大大小小的胡同均有神庙奉祀^①,被民间称之为“神京”,天子与庶民,皆仰赖众神的庇佑。民众的生活与神明栖息的庙宇紧密相连,而在这大大小小上千座庙宇中,座落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则显得格外重要。

东岳庙建于元代,供奉东岳大帝香火。由元代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出私资兴建,明清两代被列入国家祀典,朝廷岁时遣官致祭,成为敕建的官庙。而民众自发的酬神活动则日胜一日。每逢初一、十五“宰官士庶信女,具香楮者,具牲牡者,结社而鸣金鼓者,匍匐裼蹶,步步长跽,以拜代趋者,奔走恐后”^②。庙会由三月十五日起,逶迤半个月,以三月二十八东岳大帝诞辰之日为最盛,“都人士严香设供,比肩接踵,趋跪匍匐者万数”^③。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已成为凝聚老北京传统生活的大本营。从树立在庙内颇为壮观的碑林,尤其是从为数众多记载香会活动的碑刻便可略见一斑。

一、资料背景

有关东岳庙碑刻的整理工作,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刊印的刘澄圆《七十六司考证》,文中附有作者1930年4月1日抄录的东岳庙碑文目录。1936年刘厚滋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六期登载了《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刘氏将东岳庙碑刻进行全面梳理,按年代排序,对碑的形制大小、撰书人、碑额及碑侧的题记作了详细的记载。1939年叶郭立诚夫人一行6人调查东岳庙会,将碑阴所列香会会众及其活动简要记录,

分析香会的组织及历史,是第一部关于东岳庙香会研究的较完整著述^④。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博士于1946年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庙宇碑刻中的行会碑成为此次调查的重点。所以他有选择地将东岳庙碑刻中鲁班会、马王会、羊行老会、猪市庆司老会等行会的碑文(包括碑阴)、铭文及匾额一一抄录,标明方位,记录鲁班会木匠的访谈,调查极为细致^⑤。此外,美国Anne Swann Goodrich夫人和Janet R. Ten Broeck夫人对东岳庙所奉神明、香会、碑刻也作过调查^⑥。

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东岳庙碑进行拓制,这些拓片分别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时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分别于1959年、1963年对东岳庙碑刻进行调查,填写文物调查表,详细标注了101块石碑所在的具体方位。

荷兰莱顿大学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是第一位对东岳庙碑刻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由其领导,隶属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圣城北京”课题小组,9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北京史与宗教史,特别是东岳庙碑刻的研究。施教授主编的汉学杂志《三教文献》前三期已将这些迄今从未刊印或整理过的碑文发表。袁冰凌博士的《北京东岳庙香会初探》^⑦、《北京东岳庙碑文考述》^⑧等系列论文已将小组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这些成果对开创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意义深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则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以探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要旨,关注京师东岳大帝香火所代表的国家

正祀与碧霞元君香火所代表的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论文《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发表,是国内学界关注东岳庙碑刻研究的第一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 Susan Naquin 新著《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 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也格外关注了东岳庙在北京城市生活的重要地位。

二、香会碑刻概述

历史上东岳庙就以碑刻数量首冠京城而著名,但究竟有多少块,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原因是碑刻数目众多,散落在正院、东廊、西廊、北院各处,而大部分立于岱宗宝殿前东西两侧的碑刻排列又不甚规整,且立碑的年代跨越 600 年之久,因此历次统计数目都有所差异,存疑甚多。1997 年东岳庙进行全面修复,“文革”期间被推倒砸碎掩埋在地底的石碑被重新挖掘,再次推动了碑刻的研究工作。

经过整理、校对,我发现目前已知的东岳庙碑刻竟多达 163 座,最早的是元天历二年(1329 年)的张留孙神道碑,最晚的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立于新鲁班殿前的鲁班会碑,不全是石碑,还有乾隆元年(1736 年)献花圣会立的一块铁碑。其总数远远超出先前统计的 140 余座的记录(详见附录《东岳庙碑刻目录》)。碑刻大部分集中在东西碑林内,根据 1963 年绘制的碑刻位置图,可以看出碑林内各香会立碑的位置选择基本是按照对称分布,但东碑林的数目明显多于西碑林。

在已知的 163 座碑刻中,有 135 座都是由各类香会立的会碑。东岳庙属于“子孙庙”,道众最多不过十儿人,筹办东岳庙会,全仗各香会出钱出力。而政府年例用于庙宇修缮的给用与香会的捐资相比,也显得无足轻重。^⑩规模空前的东岳庙会完全在诸香

会的组织管理下进行。

香会一般分文会、武会两种。文会以为神庙、香客服务为主,武会则以表演、娱神为主。东岳庙碑刻全部都是文会所立,至于历史上到东岳庙进香的武会,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

到东岳庙进香的香会们,在庙内勒石立碑,往往要先进行占卜,选得吉日,延请朝廷宰官、文人学士或庙内住持撰文立书,纪述善举,在碑阴、碑侧刊列会众姓名,甚至包括已故会众,以求万古流芳。如果建会时间长了,为防止人心懈怠,以肃整会规,警示后人,各香会还要不断进行重整,或重新立碑,或重刻前碑,在碑的下方、碑阴、碑侧增加题记或题名。那些历史久、经费足、会众多的香会则多次立碑,如掸尘老会公别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乾隆五年(1740 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立碑,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三月十四日重整,将题记一并刊于四块碑的碑侧。有些香会则众善同心,两会毕举,共立一碑,如同治六年(1867 年)白纸献花会碑就是由白纸会和献花会共同刊立的。还有香会同时立两块碑,如曹老虎观白纸圣会于天启七年三月(1627 年)立大小相同的两块碑。当然,并非所有的香会都有足够的实力勒碑立石,相信还有众多诚由衷出,不求阐扬,更不求立石署名的香会。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历史上东岳庙香会的数量应该远远超出现有碑刻的记载。

三、香会的分类与活动

北京东岳庙是泰山东岳香火的分香。秦汉以来,泰山成为历代王朝封禅的圣地;而在民间,自东汉始^⑪,却将它视为治鬼之所,认为人死归土,都要到这里接受审判。泰山神东岳大帝便成为主司阴间、掌十八地狱、六案簿籍、赏善罚恶、注生死之期的冥府之神,是凝聚东岳庙众多香会的核心。众香会进献供品、酬神拜礼,为死者超度亡灵,生者祈福禳灾。其职能分工完全秉承着侍奉

东岳大帝香火的主旨。

将名目繁多的香会名称进行一番梳理,就会发现明代香会名称较为单一,如万历年间的四块碑皆题名“岳众圣会”,碑阴的会众却完全不同。入清以后,东岳、碧霞香火,尤其是碧霞元君香火的日益鼎盛,香会数目逐渐增多,各香会的职责分工也愈加明朗、名目繁多起来。有些香会以所供奉的主要祭品命名,如白纸会、献茶会、路灯会、盘香会、净水会、供膳会、寿桃会;有些以在庙内的活动命名,如掸尘会、放生会、净炉会;还有些以供奉的神明命名,如鲁班会、马王会、精忠会(岳飞)、庆司会(供奉七十六司)。其中以供奉神用、祭祀物品命名的香会数量居各会之首。从进献的物品看,“进贡者臆庆之尊拟之,以为神必冠也,则有冕;在神必服也,则有袍;在神必出入而仪从也,则有辇舆伞扇;在神必朝食而夕飧也,则有膳桌……在神职司阴教……则有纸簿公案笔墨刑绳……洒扫则有簸箕也,东西两司,前廊后庑,无不备极……体神之心,虑神之切,恐善心而不尽矣”^⑩。各香会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和人间的生活方式为神明构筑理想的生活环境,选择神明降临这样的特殊日子,进献供品,获取神的庇佑。用以通神的供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掸尘”、“净炉”意在净心修行;献“盘香”为上达钧天,下周九天;“献花”则为舞动阳气,熏沐金容;“金灯”意为灼透幽冥,照开泉路;“净水”用以洒涤冤魂,恢复真形;施“清茶”以为沉思默想、修心养性;“白纸”则为曹司簿书,焚烧后以散诸曹。

此外,还有以“顶”命名的香会,有二顶圣会、三顶圣会、四顶圣会、六顶圣会等。这些香会皆与碧霞元君香火有关。他们往往从东岳庙开始,依次到供奉有碧霞元君香火的各庙,亦被称为“顶”,朝顶进香。如六顶进供白纸圣会,每岁向东岳庙、弘仁桥、西顶、中顶、北顶及药王庙等6处碧霞元君懿前进香,此前必先达于东岳庙勾魂司以为神庆之祀典。^⑪

诸香会在到东岳庙进香的日子大多为

三月二十八东岳大帝诞辰之日,也有初一、十五等其他日子。进香前,各会都要在各街坊巷口,庙门前鸣锣,张贴“报单”,也称为“会启”,以告知诸位会员及香客。香会的办公处称为下处,庙内进香处称作安坛设驾。以下摘录清代东岳庙山门上贴的万善掸尘会报单^⑫:

兹因

京都顺天府大宛两县皇城朝阳门内外旗民众善人等公议重整万善掸尘进膳献茶圣会,三月二十日由本会暂移崇文门外北河沿门牌十四号本会下处,请驾前往东岳庙东岳大帝驾前各殿诸司掸尘散司焚化钱粮,当日迴香下处安坛,年例三月二十四日在三茅殿安坛设驾,二十五日传膳献茶修齐大众进香诚献香烛、云马、表文、疏词,交纳当年钱粮,各了心愿,讨佑均安,普请入会

右启

请

承办众等同侍
总管送贴求到

报单详细地介绍了掸尘会在东岳庙的进香活动安排。庙会的前一天会众们斋戒沐浴,在三茅君殿前安坛设驾。夜里子时,即为诸神掸尘。掸下的灰尘,则被当作治病的良药,散于众香客。第二天清晨,酬神拜礼,进献贡物。午间献供,作素斋一桌。该会在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会之后,便去京西妙峰山娘娘庙朝顶进香。

看守香炉、清理香灰的净炉会于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聚会。会众事先都要沐浴、食素、忌口,然后提着挂满铃铛和插着小旗的会笼,组成一支华丽的游行队伍,行至大殿前,叩拜、烧表。“表”上写着会众的名字,表明净炉的本意,以通神明。烧得好,表明大吉;如果点不着火,或烧得太快,来年的运气就不会太好。据传香灰能治病,还能除去头

上的虱子。会众们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瓷瓶,里面装满香灰,回家供在神龛上^⑭。清茶会于庙会当日“从正殿暨各配殿,并九天宫、慈尊庙献礼,毕于山门内鼓楼前,设立茶棚,为众善士止渴之需”。^⑮

四、香会成员的组成

从碑阴刊列的会众署名中,我们看到东岳庙香会成员上至宰官,下至凡夫走卒,网罗了北京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组成十分复杂。

由皇子、公主、嫔妃、太监、宫女共同组成,或由太监单独组织的香会,声势浩大,尊贵显赫,这些香会在明万历朝活动极其频繁。如1588年成立的“岳庙圣会”由乾清宫太监周宽、李坤、郭进等诸司太监200多人创立,敬侍夫人郝金凤、未封妃孔氏等嫔妃宫女30余人参加的香会^⑯。1634年立碑的“四处进贡老会”经信士刘继先发起,大明端妃周氏、康妃李氏、皇贵妃任氏、光庙妃傅氏、成妃李氏、良妃王氏、宁德长公主、太傅成国夫人常氏、司礼监太监、御马监太监、尚膳监太监、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刘崇正130余人及会众、信女人等近千人组成^⑰。1607年立碑,建会已有80余年的“神明圣会”由司礼监太监成敬等官,会首刘朝奉、党用、傅诚、刘大用、王祯等倡约会众800余官员组成。该会在东岳大帝诞辰之日延请道士、和尚,建醮迎神,进贡香楮、冠带、袍笏、朝履,并设坛有72坛。会众有诸司太监、大明神庙顺妃李氏、光庙选侍李氏、未封侍长胡氏、熹庙良妃王氏、光庙敬妃冯氏、荣昌大长公主、柱国太师关国公张惟贤、太保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杨光口、皇姑寺长老太存、原任宣镇挂印总兵官左都督黑云龙等600余人。^⑱此类香会财力雄厚,极尽奢华张显。1591年由乾清宫御马监太监创立的“东岳庙建立冥用什物圣会”在东岳庙立碑,碑阴详细记载了该会所献物品清单,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令人瞠目。礼单包括进献东岳大帝及帝后、色魂司及其他各司的十二旒珠平顶冠、珠翠凤冠、黄鞍玉带、袍帛、白绫袜、鞞、扇、

云马、攒香、炷香、茶、香炉、灯架上烛、白纸、黄绫靛白纸簿籍、水笔、金银笔架、判笔、黑墨、砚台等等一应俱全,甚至还准备了捆绑鬼魂的麻绳。

另一类是由行会成员组成的香会。在东岳庙,这类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晚期。从记载的资料推算,最早的行会应该是庆司老会,建会百年之后,先后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勒石立碑,该会由东四牌楼猪市会众组成,每于七十二司神诞之日,“凡与会之人,月为积贮香楮之资,资有余则时黝垩丹漆其殿堂,使无残敝”。^⑲计算下来,平均每隔5天就要到东岳庙来进香祭神。

香会中有不少完全由行业成员组成,具有典型的行会性质。势力庞大,活动频繁的应该算鲁班会、马王会。鲁班会碑集中在东岳庙西廊新旧鲁班二殿前。东岳庙原来只有一座鲁班殿,由于香会之间闹矛盾,于是1939年朝内森茂木厂及几家营造商又建了一座鲁班殿。鲁班会碑多达27座,在诸多行会碑中数量居于首位。信众由木行、瓦作、棚行、石行、陈设、彩作等所谓“五行八作”人士组成。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东岳大帝圣诞日到鲁祖殿进香搭台,酬神献戏,或在鲁祖诞日捐资修殿、塑像,以答神庥。马王会分别由骡行、马行组成,历年照例在东岳庙西廊马王殿圣前及诸圣神前行香,会众有朝阳门内东西牌楼骡市众善弟子^⑳、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㉑。此外,散司老会则由天源号等东四绸缎行组成,每年于东岳大帝圣诞严香设案^㉒。四顶圣会则是由正阳门外猪市口粮食店粮行会众虔立^㉓。元宝老会或羊行老会由来自京师的羊市弟子组成^㉔。而同一个香会往往包括不同经济背景的会众成员,如朝阳门棚行弟子修缮药王殿、酆都殿、鲁班殿,会众有各类药店、山货店、木材厂、粮店等数十家商号^㉕。1922年掸尘放生圣会重整,前来助善的有同利鼓铺、天增家伙铺、仁和棚铺及内外城各当铺^㉖。这些行会并不独立办会,而是附庸于某个香会,捐资出力,助善结缘。

香会的建会方式,大多以居住区域为背景。建会通常是由德高望众,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善士发起,约集同里志同道合者,具资量力,结缘建会,共成胜事。如朝阳门内外掸尘老会、天坛进贡白纸薄籍老会、东华门内小南城香会、东安门地安门皇城内外棚行等等。而区域的界定并不是完全的泾渭分明,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立的《子午进膳胜会碑》,两侧分别刊刻“西安门外关帝庙诚起子午进善圣会”,“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各城坊居住”,碑阴题名有信官、正副会首、善会人等400余人,题名中还包括本庙西廊住持、西安门外土地庙住持等,显然不完全是区域性的香会组织。与之类似的也有不少,如乾隆十五年(1740年)的《盘香会碑记》“弟子三人率众自雍正十三年始接续,以至于今。……吾会众男女长幼九十余人,住居各地,同心共意。……”

香会成员不只以汉人为主,入清以来,旗汉同立或由旗人单独建立的香会逐渐增多,如“精忠圣会”由居住在朝阳门内外的旗、汉民众组成,年例于岳飞诞辰之日,抵庙祭祀。同治六年(1867年)立碑的掸尘会、光绪十三年(1887年)立碑的净炉老会则完全由旗人组成。香会中还有按祖籍划分的同乡会,山东掸尘老会就是由旅居北京的山东人士、商铺组成^⑦。这是所有香会中惟一的同乡会,究其原因当然是东岳庙香火来自山东泰山的渊源。东岳庙往东一里处,就有一座山东会馆,“专为邑人之客都者,养病、停柩之所”。^⑧而主司阴间的东岳庙理所当然成为山东籍人士聚首的圣地。

此外,会众的组成也体现出家族的背景。如万善吉庆悬灯老会,会众名列多数为潘姓、朱姓两大家族。^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掸尘会碑,将“佛”姓会员归列一起,显然同属一族。会首的接替也是如此,如老善士牛永福建立“四季进贡白纸会”,领众40余年,之后转命其妻王氏、儿子牛应科接续领会。显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牛应科继承其父接管会事的5年,会众增加至百名。^⑩

妇女在香会中所占比例之大令人瞠目,有

些香会则完全由妇女组成。如顺治五年(1648年)的《敕建东岳庙四季进贡白纸圣会碑记》,碑阴妇女题名多达1300余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立碑的“四季年例进贡圣会”,全部由妇女建会,会首、会众约500余人。显示了传统社会中女性享有的至高的权力。

信众中还不时出现僧侣、道士、庙祝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如成立于1570年左右的施茶会,由崇文门外卧佛寺僧侣诚起,都城内外诸山住持参加,“但逢朔望之辰,聚集善众,云集海会,绕司行道,异口同音,称念弥陀”^⑪,20年不绝,会众达万人之多,盛况空前。1590年勒石嘱文,宣扬善举,尚膳监太监康道、道录司道官本庙住持刘正廉前来助善立碑。八顶进贡展翅老会,会众300多人,有本庙嗣教弟子武时辅、三元庵比丘真寿等,沿途寺庙264处助善。^⑫

在不少香会的会众里,屡屡出现东岳庙道士这些颇为灵异的人物。如钦安殿掌道录司印务,摄东岳庙正住持,提点龙虎山大上清领道教事娄近垣亲自为献花胜会、净炉会撰文,表彰其善行。净炉老会^⑬、万善掸尘放生会^⑭、献茶圣会^⑮将庙正真人华明馨、郑吉年、张吉荫的名字高列于众会首之上。而立于旧鲁班殿前19座会碑中13通都是由本庙住持或鲁班殿住持撰文。道士是具有法力的灵通人物,已故亡灵的超度和全体信众的祈福,全部经由道士祈达上天。因而道士的参与、认同,对于香会来说至关重要。连东岳庙当差的庙户也加入香会之列。^⑯

五、内部组织

一般香会少则数十人,一般由一个正会首,几个副会首、数十至百余会众组成。而东岳庙香会不少都是大香会,多达二三百人以上,甚至上万人,其组织比较周密,管事齐备,井井有条。一般而言,信众大多按照居住区域、从事行业或从属的社会阶层组建善会。首先由具备一定财产和声望的人捐资成立。男性会员称“信士”,女性会员称“信女”;如果是官员,则称“信官”,统称为“会

众”。香会的总负责人一般称作“会首”或“正会首”，下设副会首若干，这是最简单的组织形式。一些规模较大的善会组织比较周密，管理人员齐备。正、副会首之下有“都管”，下设各“把儿”，分司事务。负责祭祀仪礼，承办祭神用品的“神堂把”、“陈设把”；打鼓的“神耳把”；维持秩序的“中军把”；挑担仪仗和祭神物品的“钱粮把”、“水把”；做饭烧茶的“仲伙把”、“面把”等等。民国时期，“献茶老会”则将负责人称为“经理”了。同一香会里还会出现两组不同的会首、会众，通常是捐资出钱的内廷太监题名于碑阴的中央，而助缘、同缘的信官们则题名于碑阴的下角。

香会的经济来源，一般是由会众捐资，四方募化，或得到太监的捐助。香灯供膳窗纸会，在光绪年间得到长春宫总管太监刘得印等助缘太监前后一万两纹银捐助，广置田产，购置房屋，收租以为香火之资。^⑦献花胜会会首傅腾龙为弥补经费不足，将累年余存香资，于西华门外南池子路东立铺面房4间，每年所取租银交于接会之人。并委派傅栓柱、七十五、皂保韩、五十八等4人料理。^⑧

六、香会的历史

从已知资料看，东岳庙最早的香会碑是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岳行祠善会之记》，但香会的历史追溯并非以此为界。在东岳庙创建之初，就应该有香会活动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的掸尘老会就称“自有此庙即有此会……绵绵延数百余年，可谓善善相因，绳绳相继，一人作于数百年之前，累代述于数百年之后”。我们也可以从元朝人熊梦祥《析津志》对京师齐化门外东岳庙会盛况的描述中，窥见香会之雏形：

每岁自三月起，烧香者不绝，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后，道途男人□□赛愿者填塞。廿八日，齐化门内外居民，咸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东华门降，遣官函香迎入庙庭，道众乡老甚盛。是日，沿道有诸色妇人，服男子衣，酬步拜，多是年少艳妇。前有二妇人以手帕相牵阑道，以手捧

窑炉或捧茶、酒、渴水之类，男子占煞。都城北，数日，诸般小买卖，花朵小儿戏剧之物，比次填道。妇人女子牵挽孩童，以为赛愿之荣。道傍盲瞽老弱列坐，诸般棍丐不一；沿街又有摊地凳盘卖香纸者，不以数计。显官与怯薛官人，行香甚众，车马填街，最为盛都。^⑨

通常建会历史在百年以上的香会就可以称之为“老会”，否则只能叫“圣会”。上溯历史，明清时期的不少香会很可能成立于元代。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东岳庙香会达到鼎盛时期。立于此间的香会碑刻最多，最频繁，平均每隔一年就有香会立碑，连续长达133年之久。民国以后，香会渐少。30年代，东岳庙的香会还有20多档^⑩。这期间，行业性质的香会——鲁班会活动频繁。最后一块香会碑刻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新鲁班殿前立的鲁班会碑。建国以后，东岳庙先后被学校、机关占用，从此东岳庙香会在历史上消失。

七、结 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创建以来的几个世纪，东岳大帝香火已经成为凝聚北京民众社会生活的核心力量。他们定期焚香顶礼，结社酬神，共襄善举，全然摒弃了儒家传统社会所强调的等级制度。正如碑文所载“都城人，严事之典，无内外、无贵贱、无小大，觴□宴胪，祝若不谋”^⑪，封建等级制度在这里竟被突破。从年代跨度超逾600年之久的碑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东岳庙香会的盛况和其悠久绵长的历史，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主司阴间的东岳庙能在京城上千座神庙中独具规模，经久不衰。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从一个侧面折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一直不为学界所知晓的制度与原则。

半个世纪过去了，东岳庙重新开放，但往日庙会上盛况空前的热闹场面和鼎盛的香火只残存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和默默承载着这些非凡年代的碑刻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香火的京

西妙峰山香会的全面复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妙峰山庙会开始恢复,据当地管理处介绍,1999 年到妙峰山朝山进香的香会就多达 110 多档,香客多达 5.6 万。

东岳庙庙会已举办三年,在朝阳区文化文物局的组织下,团结湖万善同乐开路圣会、金盏乡高跷会、东城区舞狮舞龙圣会等相继到东岳庙进香表演。金盏乡高跷老会的会首刘大爷说,他们这个老会最早的时候就在东岳庙表演,现在回来了非常高兴。现在他们年年都去妙峰山进香。而历史上,东岳庙掸尘老会三月二十八日在东岳庙进香之后,便去妙峰山朝顶进香。关于东岳庙与妙峰山香会的历史渊源以及东岳庙香会的恢复等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①据郭子升《北京庙会旧俗》,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北京 1989 年,介绍 1958 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全市当时还有大小庙宇庵观 2730 座。

②崇祯七年八月(1634 年)《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

③顺治九年三月(1652 年)《东岳庙祈嗣善会题名碑》。

④⑬叶郭立诚《北京东岳庙调查》,北京大学《民俗丛书》第 46 卷,1970 年台北中国民俗联合会再版。

⑤[日]仁井田升《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四),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 1975 年至 1983 年刊行,第三十集。

⑥⑭⑯[美]Anne Swann Goodrich: 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the Tung - yu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 Janet R. Broeck; Description of the Tung - yueh Miao in Peking in 1927, 1964 年日本名古屋文物出版社出版。

⑦参见 1999 年 10 月 1~2 日法国巴黎“圣城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⑧参见《三教文献》第三期,2000 年。

⑨参见同治到光绪年间工部制造库关于东岳庙修缮需用工料的呈折,第一历史档案馆。

⑩清顾炎武《日知录》云“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

⑪崇祯七年(1634 年)《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

⑫崇祯十三年(1640 年)《六顶进贡白纸圣会

碑记》。

⑬见光绪十九年(1893 年)《清茶圣会碑》。

⑭万历十九年(1591 年)《岳庙会众碑记》。

⑮崇祯七年(1634 年)《敕建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

⑯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神明圣会碑记》。

⑰乾隆三十三年(1769 年)《东岳庙庆司会碑记》。

⑱乾隆十四年(1749 年)《马王圣会碑》。

⑲嘉庆二十年(1820 年)《马王庙会众奉祀碑记》。

⑳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散司老会碑记》。

㉑康熙二十年(1681 年)《四顶圣会碑记》。

㉒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羊行老会碑记》。

㉓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东岳庙重修药王等殿碑记》。

㉔民国十一年(1922 年)《公议重整掸尘放生圣会碑》。

㉕道光十七年(1837 年)《众善山东掸尘老会碑》。

㉖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重修海阳义园碑记》,该碑现立于山东会馆院内。

㉗嘉庆元年(1796 年)《万善吉庆悬灯老会碑》。

㉘天启四年(1624 年)《四季进贡白纸会碑记》。

㉙万历十八年(1590 年)《东岳庙碑记》。

㉚康熙四年(1634 年)《东岳大帝圣会碑记》。

㉛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公议重整净炉老会碑》。

㉜民国十一年(1922 年)《公议重整万善掸尘放生老会碑》。

㉝雍正九年(1731 年)《献茶圣会碑》,于民国丙子年(1936 年)重修。

㉞乾隆八年(1743 年)《集义献茶豆老会碑记》。

㉟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 年)《香灯供膳窗纸会碑》。

㊱乾隆六年三月(1741 年)《东岳庙献花胜会碑记》。

㊲参见《析津志辑佚》第 54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

㊳万历十三年(1585 年)《东岳庙供奉香火义会碑记》。

(作者为北京市民俗博物馆干部)

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

·刘之光

《北京文博》2001年第1期曾发表拙作《大护国仁王寺觅址》一文,第2期登载了包世轩同志《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一文(以下简称包文),第3期又登载了王世仁同志《关于元护国仁王寺位置及牛街礼拜寺年代二文的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今仅就包、王二君的文章涉及到的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位置,略述个人看法。

愚下一文,是探索元代的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应在今之石刻艺术博物馆(五塔寺)一带,这和包文是不谋而合。但是包文收西镇国寺定位于长河北岸,国家图书馆南侧则笔者有不同看法。包文也是引用了《析津志辑佚》的记载,即:“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碁,金所建也。庚午至元(至元七年)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包文为了认证西寺即西镇国寺而引用此段文字,却未再进一步理解,恰恰忽略了西寺在河之南岸的明确记载,从而得出西镇国寺和护国仁王寺同在河北岸的错误结论。

王氏文章认作西镇国寺位于高良河南岸,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析津志辑佚》所记距城的里数有出入,而将西镇国寺分裂成二,又将护国仁王寺安置在今紫竹院公园迤西,从而西镇国寺和昭应宫均相应的西移(见王文图示)。王氏似未见到拙作,因无一语涉及愚下有关护国仁王寺位置的看法,今再将个人观点列后,兼及西镇国寺位置的问题。

大护国仁王寺位置,王氏认同文献所载,“寺在广源闸东面的高良河北岸”,亦即

广源闸在护国仁王寺之西。可是又拘泥于“十里而近”,而将白玉石桥、昭应宫、西镇国寺,以及护国仁王寺均定位于广源闸东侧,比邻广源闸之处。忽略了《元一统志》(《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引)与《析津志辑佚》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的记载。关键就在“二”上。元代为了南粮北运,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修建了通惠河,水道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坝闸,每闸又分上、下闸或上、中、下闸。以便节制水流,使漕运粮船自通州到达大都积水潭停泊。

广源闸二,即意味着有上闸和下闸,广源闸即上闸,现仍存桥涵和新修的桥梁,位于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迤东。上闸以下为今紫竹院公园湖泊,元代时的水面比今日所见还要宽阔。水面自不能设闸,其下闸应即在下流水道瓶颈处设置,也就是今日尚存地名的白石桥迤西一带。《日下旧闻考》所载的白石闸(卷九十八、引自《水部备考》)当即广源闸下闸,它和通惠河同是至元二十九年修建的。现在南北通道上的新架桥,即白石闸(桥)西侧的小白石桥。下闸既可分晓,文献所载的广源闸二,在护国仁王寺西,护国仁王寺的位置自应还在下闸之东。以今日石刻博物馆(五塔寺)为中心的广阔地域为元代护国仁寺的遗址,应是可以肯定的,把护国仁王寺靠近广源闸上闸,是疏于考虑下闸的结果。

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大致确定,在河干南侧的西镇国寺,自亦应迎刃而解。王氏文根据《析津志辑佚》所载西镇国寺距城有3里、10里的不同,而认为是两座庙宇,则是太相信其记载了。《析津志辑佚》不等于《析津志》原书,它是从散见于各书中的记

载,辑录成册,再加辗转抄袭,难免有断间错简,缺字衍文的失误。就以西镇国寺的三、十里程之别,若有抄录错误,自然会导之错误的结论。但从另一角度观察,假定抄本无误,则是因句读造成的理解错误。诚如王氏文中所言“高粱河习惯上是指广源闸至西城墙外的一段,这段河约4公里多。”那么,《析津志辑佚》所载“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若将都城之西的逗号改作句号,将10里而近的句改作逗号,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10里和西镇国寺无关而是高良河的长度如此解释,也不无不通。西镇国寺就只有一座,别无分号。

西镇国寺为一,从元代以后志书的记载也可证实。如明代前期的《明一统志》,明后期的《宛署杂记》、《万历顺天府志》等书,在京西同一方向,均只有一镇国寺。其实《析津志》所载的虽有3里、10里之差,也是指的同一镇国寺。不过是在编著《析津志》时,根据民间对里程不同的说法信笔而就,所以有矛盾之处。就以《宛署杂记》所记各寺的里距差异,是很明显的例子。如:

“镇国寺……极乐寺、真觉寺(五塔寺)以上俱在白石桥。”

“万寿寺……以上在广源闸,俱离城五里。”

“昭应宫在西直门外……混元宫在广源闸,以上离城三里许。”

《宛署杂记·街道》又载:

“自西直门五里曰白石桥,又三里曰豆腐闸(广源闸)。”

从以上所记里程比较,可知差异之大,无论是原来所录还是刊误,总之是不能尽信,不能为其束缚,只能供作参考。《析津志》所载西镇国寺的里距,虽有3里和10里而近之差,也都是同一西镇国寺。

既可认定西镇国寺只有一座,其相对位置亦可锁定。《析津志》已言其在高良河干之南,《宛署杂记》和《日下旧闻考》引《顺天府志》俱言在白石桥。《析津志》和《大典

本顺天府志》又俱言西镇国寺在昭应宫西。昭应宫也是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皇后察必后所建。系供奉北方大帝真武的殿宇,既和西镇国寺为邻,当亦在白石桥一带。据《帝京景物略》卷五载:双林寺西为昭应宫明正德八年重修。双林寺在今紫竹院公园的东部,建国后尚存寺后的数座砖塔,建公园时将塔全部拆除。双林寺万历时始建(可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其西即为昭应宫,可知在元代,双林寺所占地域属于昭应宫,元代皇家寺庙占地之广,非明代庙宇可与比拟(可参见《北京文博》2001年1期拙作《护国仁王寺觅址》)。明代重建的昭应宫应只是原址的一部。

西镇国寺在昭应宫东。《帝京景物略》无载,只言:“昭应宫……西又二里,三虎桥亦曰神虎桥。”可能镇国寺明末已废。但是提到的三虎桥,也为镇国寺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元代高良河南侧自西向东有一道专为皇家供水的金水河,明代时废弃,逐渐湮没。三虎桥或即金水河上所架之桥梁。今紫竹院公园迤南、白塔庵(画院)北侧,尚存三虎桥的地名。镇国寺既在昭应宫迤西,也应在三虎桥不远之地。《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金绳桥在西镇国寺前。”金绳桥也应是跨金水河的桥梁。因而元代的金绳桥可能即明清时的三虎桥。

综合以上看法,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元代时高良河南岸有昭应宫和迤西的西镇国寺,俱属于白石桥广阔区域。明代时昭应宫和西镇国寺俱为重修,范围有所缩小,西镇国寺也只称镇寺。明末,昭应宫西侧的镇国寺已无存,但有三虎桥和西镇国寺前的金绳桥位置大致相当,故而可认定镇国寺在此带。亦即元代西镇国寺的所在地。

以上,诚如王工所言,仍是从文献到文献。从文献记载来判知它的大致方位,若欲知其确切地点,还须通过实际调查和发掘来确定。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退休干部)

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关键柱”保护报告

王 丹 卢迎红 董玉刚

2001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技术室工作人员在敦煌保护所专家的指导下,对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的金中都水关遗址“关键柱”实施了加固保护工程,该工程采用敦煌保护所开发配制的土遗址加固材料:高模数的硅酸钾(简称PS),通过低浓度、多次渗入方式,改变关键柱体胶结泥质的微观结构,提高柱体强度,使关键柱体沙粒石层得到加固。现报告如下:

一、价值评估

金中都水关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今凉水河以北70米处。1990年在此建筑施工时被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此发现被评为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水关遗址的发现,确立了“金中都”城自城西“西湖”水进入中都城,至“鱼藻池”过龙津桥向南,穿过“丰宜门”和“景风门”之间的南城牆下,流入金代护城河的确切水源路线;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水利设施的重要实物例证,同时可以看到金中都城规模及建筑工艺水平。而由考古发掘中特地留下的地层“关键柱”直接的反映了水关被废弃后的地层堆积状况,完整保存这一考古遗迹,将为全面了解水关遗址的历史起到积极作用。(见图版1)

二、现状调查

1. 概述:关键柱为2.1米见方,高1.61米,位于遗址南部。目前,关键柱虽然处于

室内,可以避免风、雨的直接破坏,但是由于遗址位于凉水河畔,地下水毛细现象较严重;同时,由于遗址所处的展室为半地下形式,通风设备不够完善,每年雨季时,展室湿度可达到80%~90%以上;冬季又异常干燥,湿度在40%以下。在常年干湿交替的影响下,关键柱体多处出现裂隙、表层剥离,尤其是柱体下部风化剥蚀严重。

2. 地层结构:关键柱是水关遗址运行过程中堆积的一套沙粒石层冲积物,其中还夹杂有陶片等遗物,最大砾径达30厘米,松散、胶结极差,易脱落。(见图版2、3)

3. 存在的病害:关键柱现存的病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柱体东、北端各有一条大裂隙穿过(见图1~4);

二是东北角柱体下部风化剥落,使其上部悬空这也是裂隙发育的主要因素(见图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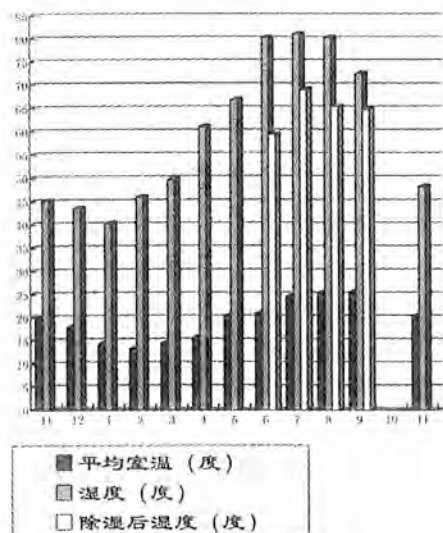
三是表面风化严重,小块剥离时有发生。

4. 过去进行的保护工作:关键柱在考古发掘后没有进行及时的加固保护,从而产生了上述三类病害。1995年曾用有机高分子材料(成分不详)进行过表面防风化加固。由于出现柱体的开裂,2000年1月又用厚10厘米的玻璃罩对柱体实施了围护,并对柱体悬空部位进行了支顶。对于关键柱土体上发生的大裂隙,采用三甲树脂-丙酮溶液,浓度由20%多次递增至50%,滴渗方式加固裂隙两壁,最后用浓度为20%的三甲树脂调和原遗址土成灌浆液,对裂隙进行灌浆填补。为

了克服有机材料的不透气性,在裂隙灌浆处还用铅丝从上至下插了数个通气孔。

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柱体裂隙的进一步扩展,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由于所用的有机材料透气、透水性极差,柱体内的水分无法自由扩散,使得表面产生剥离,造成柱体下部风化剥蚀严重,从而影响了柱体的结构稳定性。另外,临时加的玻璃罩一方面影响了柱体的外观,另一方面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柱体的稳定问题。(见图版 5)

5. 遗址区温湿度调查:根据 2000 年 11 月至今博物馆对遗址区内环境纪录,一年中 4~10 月遗址区内的相对湿度大于 50%,1~3 月遗址区内的平均气温低于 15°C。因此,实施保护的时间定在今年 10~11 月。(见图表 1)



图表 1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1 月关键柱所在遗址区月平均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及夏季除湿后相对湿度对照表

(2001 年 10 月由于遗址区内基建施工,区内小气候受到扰乱,未做记录)

三、加固步骤

1. 撤去北面玻璃护板

首先试探柱体的强度,感觉暂时撤去北面玻璃护板,不会带来柱体的倒塌。东北角的石膏支顶,对柱体东北角悬空部位有绝对的支撑作用,在对东面大裂隙加固之前,不能撤去。(见图版 6)

2. 开裂柱体的锚固

用手工成孔的方法,在开裂柱体上裂隙距临空面最近的一侧钻两个孔(自北向南方向),穿过裂隙,孔径 15 厘米左右、深度为 95 厘米。灌注浓度为 8%~10% 的 PS 材料加固孔壁,固化后灌入水泥砂浆将锚杆(取材于现场的楼梯钢管扶手,直径为 3 厘米,长 90 厘米)插入注满水泥砂浆的孔中。(见图 5、6、7,图版 7、8)

水泥砂浆的水灰比为:

浓度 8%~10% 的 PS:水泥:小粗砂 = 0.8:1:1

锚杆在孔外的十字钢板(即锚固部位),用 PS 砂浆、原地点散土、砾石做旧覆盖,使其色调、砾石形态与柱体统一。(图版 9)

3. 柱体东北角悬空部位的支顶

清理基础,用现场的青石垫底,置一长度合适的钢管于上,并与上部的悬空体紧密接触,接触部位置以 5×10 厘米的钢板分散向上的支顶力。(图版 10)

4. 东南角缺损部位的修补

东南角的悬空部位得到支撑以后,先用浓度为 8%~10% 的 PS 材料喷涂数遍,使柱壁得到加固。柱壁固化以后再用 PS 砂浆、碎石块、原地点散土将缺失部分填充实,表面仿柱体原样做旧处理,最后喷涂 PS 材料。(图版 11、12、13)

5. 裂隙灌浆

锚固和支顶工作结束后,开始封闭裂隙,并预留灌浆口。两天后实施裂隙灌浆。

裂隙灌浆为以西南角裂隙加固步骤为例:

i. 沿裂隙走向,向裂隙内部喷渗 10% PS 液,使其得到充分加固。(见图版 14)

ii. 向裂隙内填充粉煤灰(F),随后喷渗 10% PS 液。重复多次直至裂隙被水灰比为 1:2 的 PS-F 灌满。(见图版 15、16)

iii. 整个西北角用 10% PS 液多次喷渗加固, 裂隙表面纹路采用遗址原土做旧处理。(见图版 17)

6. 柱体表面防风化加固

1995 年所做的有机材料封护层, 由于所采用的具体材料不详, 决定不对其采取全面剔除, 只以达到增强透水为基本目的, 小心清除了柱体下部 50~70 厘米段的有机材料, 并对有轻微开裂的部位, 先用 PS-F 灌注, 等 PS-F 固结后再进行表面的渗透加固。具体办法为低浓度多次渗透。(见图版 18, 图 8)

7. 加固后的柱体整理

关键柱加固干燥以后, 对锚孔、裂隙封闭、支顶体和 PS 材料加固后出现的“翻白”现象的部位进行做旧处理: 用低浓度的 PS-细泥浆混合液喷涂柱体表面翻白处, 使柱体外观色调和谐。(见图版 19)

四、留下的观测工作

1. 柱东面的大裂隙走向原样保留, 没有做旧处理, 在其上钉纸条做标记, 2001 年 11 月 4 日记录裂隙宽度 5 毫米。日后应注意观察其宽度上有无增大趋势, 一年后比较对比数据, 对大裂隙加固的稳定性给予评价。

2. 柱体上部未去除的原加固材料仍存在老化问题, 需常年观察。如出现加固层与柱体剥离现象, 表明加固已经失效, 可小心去除这一薄层(经测得此加固层仅平均有 0.5 厘米厚), 代替以 PS 加固, 采用的方法同前。

3. 柱西北脚下部, 经查为原地层堆积时代水生贝类、螺蛳, 土壤结构胶结成分少, 目前采用的 PS 加固效果不能理想, 强度不够, 容易造成类似原东北脚下部的剥落现象。因此, 需留意观察, 一旦发现有剥落现象, 可用 PS-泥浆封护, 以阻止其继续脱

落。

五、结 论

1. 裂隙灌浆和锚固, 使柱体主要存在的大小裂隙、东北角上部悬空部位得到固定和支撑, 提高了关键柱整体强度。长期以来, 因为温湿度交替变化、地下水运动及外界施工振动带来的关键柱土层松散、坍塌险情得到有效控制。

2. 加固材料采用高模数的硅酸钾(PS), 具有无机材料的特性。通过低浓度、多次渗入方式, 改变关键柱体胶结泥质的微观结构, 提高柱体强度, 使关键柱体沙粒石层得到加固。加固层的通透性能远远优于使用有机材料, 对于地下水分的散发, 极为有利。同时又由于无机材料不存在老化问题, 因此可以有效避免以往用有机材料加固时因有机材料老化发生的加固层与主体剥离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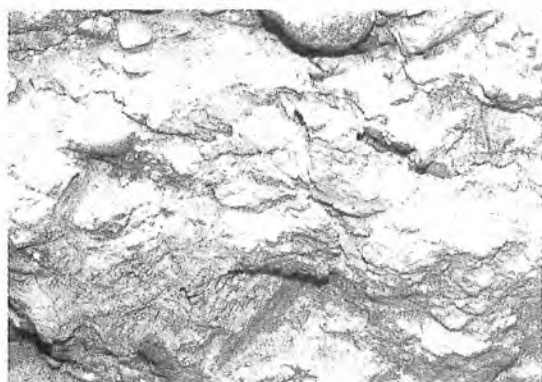
3. 对东北角悬空部位的支顶、做旧工作, 不仅加固了柱体强度, 而且复原了柱体的方形外观。

4. 对 2000 年所作的玻璃外罩的拆除, 使参观者观察地层状况更为直接, 恢复了关键柱的使用价值。

5. 多年以来, 博物馆坚持在遗址区内所做的环境监测工作, 为加固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利的依据。根据环境温度变化曲线和湿度变化曲线发现: 遗址区内每年 6~8 月湿度达 80% 以上, 甚至有时高达 91%, 而 12 月、1 月、2 月湿度又下降到 40% 以下, 水分的干湿交替变化, 造成遗址区内文物尤其是木制文物的严重受损, 土遗址的干裂情况也是其中一种。我们虽然已经对关键柱体实施了加固保护, 但仍应保持环境监测, 这将对今后土遗址病情的发展和提供提供一个预警机制。



图版 1 水关遗址及关键柱位置



图版 2 关键柱表面

关键柱是砂粒石层冲积物,砾径较大,胶结极差,组织松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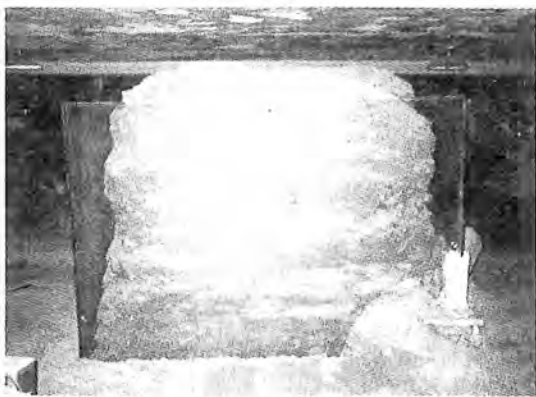
图版 3 关键柱地层出土的瓷片和残骨片



图版 4 关键柱东北角病害极为严重

由图片可见一宽约 0.7 厘米、总长达 1 米的大裂隙自上至下贯穿关键柱的东北角，且该角下部由于长年风化作用，土体剥落严重，造成上部呈悬空状态。

2000 年初为防止其发生脱落，临时采取了机械支顶办法，虽然缓解了险情发生，但外观极不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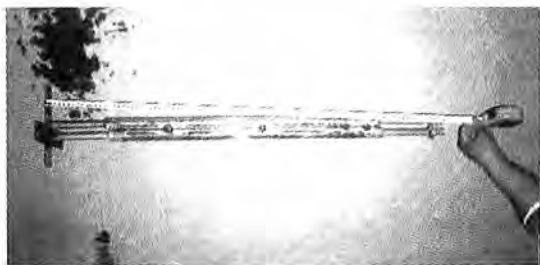
图版 5 关键柱用 PS 加固前的外观(东面)

2000 年 1 月用玻璃罩对柱体实施了围护。



图版 6 北面玻璃护板去除以后

图片中地上横放的风钻钻头用于手工打孔。不能用机械方式打孔的原因是防止柱体因受到强烈震动而崩塌。



图版 7 锚杆

锚杆钢质,长 90 厘米,一头含有 5×10 厘米的钢板。



图版 8 锚杆深入柱体后留在表面的十字形钢板具有固定作用。



图版 9 锚固手段实施以后的北面

锚杆在孔外的十字钢板(即锚固部位),用 PS 砂浆、原地点散土、砾石做旧覆盖,使其色调、砾石形态与柱体统一,一般情况下难以分辨。图中颜色深的地方为喷涂的 PS 未干。



图版 10 支顶柱体东北角悬空部位

用现场搜集的青石垫底,置一长度合适的钢管于上,使其与上部的悬空体紧密接触,接触部位置以 5×10 厘米的钢板分散向上的支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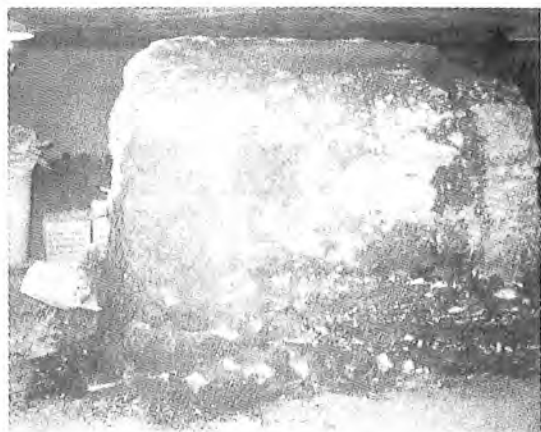


图版 11 修补东南角缺损部位

用 PS 砂浆、碎石块、原地点散土将缺失部分填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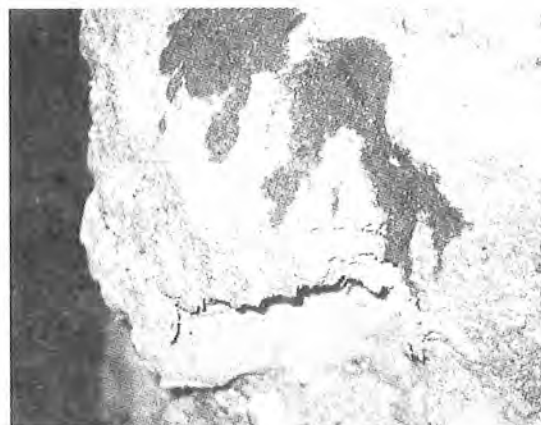


图版 12 修补处表面仿柱体原样做旧,最后喷涂 10% PS 液加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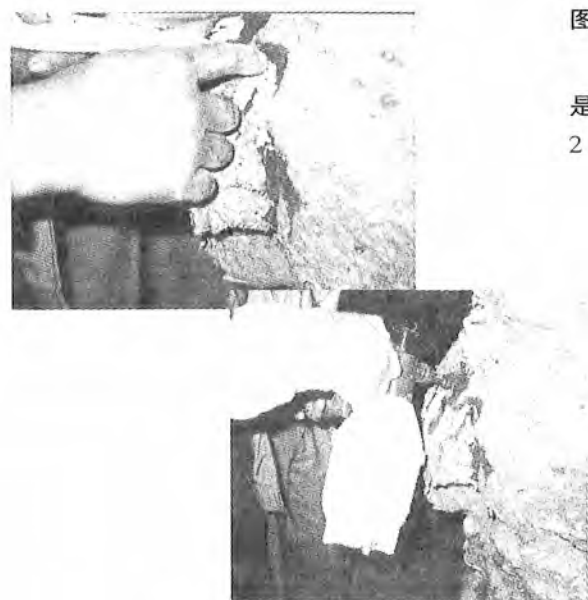
图版 13 修补后的东北角

图中颜色深的地方为喷涂的 PS 未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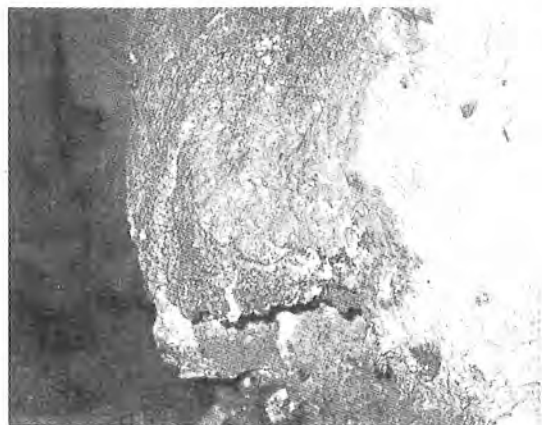
图版 14 西南角小裂隙灌浆加固

沿西南角小裂隙走向,向裂隙内部喷渗 10% PS 液,注意多次喷深,使其充分渗透。



图版 15 16 裂隙内填充粉煤灰(F)

粉煤灰的填充与随后的喷渗 10% PS 液是多次交替进行的,直至裂隙被水灰比为 1:2 的 PS-F 灌满。



图版 17 裂隙表面纹路采用遗址原土做旧处理,痕迹消失。随后对其进行全面的 PS 喷渗加固。



图版 18 关键柱南面 PS 加固部位

图中柱体下部深色部位为喷涂 PS 后未干。



图版 19 加固工作完成以后的关键柱(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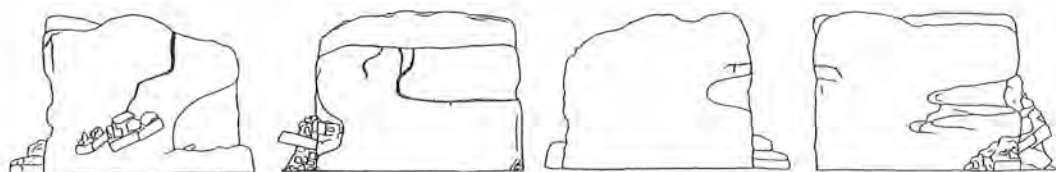


图1 东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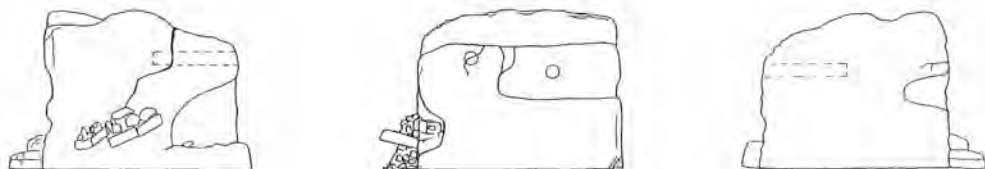
图2 北面

图3 西面

图4 南面

图1~4 关键柱展开图(比例尺:1:80)及大小裂隙的分布

图中红色线为关键柱身上存在的主要大小裂隙,其中东面、北面的两条大裂隙急需加固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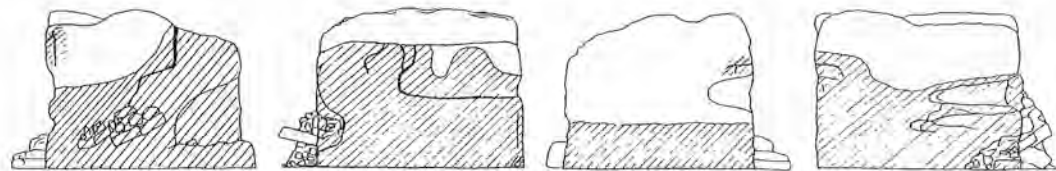


东面

北面

西面

图5~7 手工成孔位置及深度示意图



东面

北面

西面

南面

图8 PS材料喷涂部位标注图

图中阴影部分为已喷涂PS材料处。

(作者:北京文博交流馆馆长
辽金城垣博物馆馆长
北京文物研究所)

绘图:张秀云 白云燕

照相:王殿平 董玉刚 王丹)

在北京文物建筑保护工程中 应重视传统工艺和 恢复传统规制

王效青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基本国力的逐年增强,政府和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投入也以较大幅度的加大,仅北京地区每年的开复工项目就在百余项,所投入的人民将近3亿元。其修缮规模和资金投入是空前的。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在专项审批和管理中未雨绸缪,制订了招投标管理办法和采取了施工队伍岗位技术培训以及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等措施,为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质量监督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遵守传统操作工艺和使用传统建材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新旧传统建材在质量和规制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人们的认识也不一样,存在着非常大的矛盾。比如在恢复传统

搓光油的工作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证明搓光油是我国古建筑施工中的一项独特的传统工艺,其质量远比使用调和漆要好得多,而且其表面光洁度强,耐氧化,比调和漆的使用年限提高了十几年,确实是一项良好的传统工艺。但有的施工人员却认为搓光油对温度、光线、时间等的要求比较高,少有疏忽就可能“超亮”,产生类似“霉斑”的现象。而使用调和漆,比较稀释,好操作,用普通的刷子就能涂刷,不仔细看的话表面的色泽也不差。事实上调和漆仅仅是近十几年来才使用在古建筑的外檐油饰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物对比表明,经阳光的日晒,凡使用调和漆的工程最长二三年,最短二三月就会褪色,油皮表面

产生细微的龟裂,造成地仗干缩,减少了对木结构保护的功能。还有的施工人员,即便使用了搓光油的工艺,也不用传统的施工方法,而是自作主张,往光油内兑煤油将其稀释,不是用丝头搓、油控顺,仍然用刷子刷,还是保证不了质量。再如,施工中大量使用的传统砖瓦材料,也存在着规格尺寸不统一、质量不能保证的严重问题。颁行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清工部《工程做法》武英殿本,卷五十三“瓦作用料”中就已经明确规定了清官式建筑砖瓦、琉璃瓦等的名称和规格尺寸。由于缺乏必要的介绍,许多砖瓦厂甚至不知道我们老祖宗还有一套严格的规制和准确的尺寸要求。近十几年来,砖瓦窑厂在经营生产中,随意将其他地方的砖瓦运到北京销售,造成砖瓦尺寸混乱,致使官式建筑和地方手法鱼目混杂,破坏了传统的规制。而主管部门和设计单位也没有刻意要求,只是让按传统的砖瓦尺寸去加工订货。结果事与愿违,即使要求按原建筑的砖瓦尺寸去加工订货,时间根本来不及,工程不可能停下来等砖瓦,施工单位为赶工期,只好买来什么用什么。就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传统的规制。在清工部《工程做法》卷六十七“各项砖瓦用工”中,对砍制砖瓦也有明确的规定,记录了砍砖的人工定额,因为过去砖的强度较大,砍磨费力,所以

对每个工砍多少是有规定的。现在我们的施工队伍在买砖时,专门挑强度不太高的,价格偏低的,为的是省钱省力。而砖瓦厂也投其所好,将砖瓦泥的质量降低,生产一种便于砍磨、体轻质差的“桃酥”砖,这种砖容易砍磨,施工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前。用这种砖铺地,非常不耐磨,一两年就要换一批砖;用这种砖砌墙,由于砖体内有气泡和颗粒,往往造成砖的横向断裂,直接影响到墙体的承载力。

其他的实际事例还有很多,这里仅举以上几例。为克服这些弊端,我们要强调在文物工程的监督管理中进一步恢复传统的工艺和传统的规制,进一步加强对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的管理,将传统砖瓦建材的质量检测工作提高到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在文物建筑工程中真正保留和提高文物建筑的文物价值含量,将文物保护工作做的更好。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北京地区文物建筑旧砖瓦的调查,同时收集了已经发表的书籍和文章中有关砖瓦的尺寸,结合故宫博物院王璞子先生主编的《工程做法注释》的内容,并经过征求专家、匠师们的意见,筛选出符合传统规制的砖瓦尺寸,将清营造尺换算成公制单位,整理了一份《北京市传统砖瓦尺寸对照表》,供砖瓦生产厂家和设计、施工单位参考。列表如下:

北京市传统建筑砖瓦尺寸对照表(单位:mm)

清《工程做法》所列砖瓦尺寸		目前社会流行砖瓦尺寸	
名	称(长、宽、厚度)	名	称(长、宽、厚度)
一、金砖类:			
二尺四金砖	760×760×120		
二尺二金砖	700×700×112		
二尺金砖	640×640×96		
二、方砖类:			
足尺七方砖	544×544×80	570×570×60	
行尺七方砖	512×512×80	550×550×60	
		苏州尺七 480×480×65	
足尺四方砖	448×448×70	470×470×60	
行尺四方砖	416×416×70	420×420×55	
		苏州尺四 440×440×70	

续表

清《工程做法》所列砖瓦尺寸		目前社会流行砖瓦尺寸	
名	称(长、宽、厚度)	名	称(长、宽、厚度)
足尺二方砖	384×384×64		
行尺二方砖	352×352×50		400×400×60
三、城砖类			
大停城	480×240×128		470×240×120
大城样	464×234×120		480×240×130
临清砖	448×224×106	(砍净尺寸)	
二城样	416×208×90		440×220×110
地扒子	400×200×100		420×210×85
停泥砖	390×190×90		320×160×80
沙滚子砖	304×151×64		
	272×128×58	(砍净尺寸)	
沙碾子搪白	288×138×58	(砍净尺寸)	
小停泥	280×140×70		280×140×70
大开条	280×140×60		260×130×50
小开条	250×120×45		245×125×40
斧 刃	240×120×40		240×120×40
四、瓦件类:			
头号筒瓦	352×144×12		210×130×11
二号筒瓦	304×122×12		190×110×11
三号筒瓦	240×103×12		170×90×10
十号筒瓦	144×80×6~8		90×70×8
头号板瓦	288×256/231×14		200×200×10
二号板瓦	256×224/200×14		180×180×10
三号板瓦	224×192/165×14		160×160×10
十号板瓦	138×122×6~8		110×110×8
一号勾头	250×144×12		
二号勾头	250×122×12		
三号勾头	200×103×12		
一号滴水	250×256/231×14		
二号滴水	250×224/200×14		
三号滴水	200×192/165×14		

注:

(一)表中清式营造制与公制的换算为1营造尺=0.32米=32厘米,1米=3.125营造尺。板瓦和滴水有口宽和尾宽之分;清式勾头宽与筒瓦同;滴水宽、厚与板瓦同。

(二)根据文物建筑修缮的要求,在修缮前要按照文物建筑的时代特点选择砖瓦,并应对砖瓦的耐压、耐磨、抗折、抗剪等物理性能进行检测。

(作者为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文物工程监督站站长)

析传统材料

在文物建筑修缮中的使用

付卫东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而作为这些古老文明的载体——我国的文物建筑更是以其精巧、华丽、自成体系而闻名于世。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民族乃至世界的文化遗产,使之延年耐久流传于世,就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维护、保养及修缮。因此,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有着与新建工程所不同的本质区别,即为了保证文物的价值应尽可能地保留原状及历史痕迹,在施工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原工艺、原材料、原做法的原则,简而言之,也就是必须保留传统。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加之过去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甚清晰,往往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形成了现代的工艺及材料使用于文物建筑工程之中要比传统的东西强一些的错误理念,并在有意无意地去进行尝试及普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思想、行为有悖于文物保护的原则,仅就其产生的目的及达到的效果来看,不但未能更好地进行保护,反而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下面仅以文物建筑修缮施工中油饰材

料为例来予以说明:

在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之中,油饰施工是一个重要环节。通常人们只认为它起着装饰建筑外立面,使之色彩绚丽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保护木结构的功能。中国的古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而外露的木构件如不充分的保护,就会因自然界风、霜、雨、雪及人为的因素造成破坏。因此在完成木结构的制做及安装后,就要对其上施以地仗并以油皮封护。很明显,地仗是对木材的直接保护,油皮则是对地仗的直接保护而又间接地保护着木材,如果油皮产生问题则直接暴露地仗进而侵害木构件。所以油皮的质量好坏是保证建筑耐久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油皮的形成简单地说是即涂刷油漆,这里必须指出,文物建筑中的“油漆”并不是新建工程所理解的油漆为一类材料,它代表着两种传统材料——光油及大漆,在北方地区主要使用光油。对于光油的概念既可理解为是一种传统材料,同时“光”又可作为动词代表着传统的光油工艺。光油为棕黄色粘稠的油质体,是以桐油为主要原料,配以苏油及

其他辅料经高温熬制聚合而成的纯植物油料,在加入各色颜料后则成为色油而涂刷于地仗之上,最终以光油罩面成活。其成膜的特点为光亮、平整、色泽柔和,油膜质感明显,即颜色附于油内,因而不易褪色,而且其油膜在具有一定硬度的同时,又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及弹性,从而使油皮可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收缩、回复,不易产生开裂、暴皮及脱落,另外又因其本身为纯植物油,无任何化学合成成分,性能稳定,不易受日晒雨淋风吹的影响及大气污染的侵蚀而失亮、老化,耐久延年功效显著。尽管光油有着上述诸多优点,可是其施工工艺却是极为严格的,并且在涂刷中对环境、气候、温度等自然条件的要求很高,如操作不当难于成活和确保观感质量的要求。因此自 60 年代后期,在化学油漆的冲击及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局限性影响下,光油逐渐退出了油饰施工,直至 90 年代发展到几近失传的地步。带之而来的是这一时期,化学油漆充斥市场,大量使用于文物建筑油饰施工当中,醇酸调和漆、磁漆遍布各个文物建筑之上。虽然,化学油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光油在操作中的一些缺陷,可是却未能将其优点更好地保持及发扬,反而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质量问题如易褪色、失亮,由于漆膜较脆极易产生开裂、暴皮、脱落,加上化学成分的稳定性差,极易老化、耐久性差,无法保障延年效果,造成了修缮周期缩短、资金人力投入加大的不利局面。正是基于这种状况,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建筑,有效地控制文物建筑油饰施工质量,文物工程监督站在上级主管部门市文物局的领导下,经与有关部门及单位密切配合,在反复研究、论证、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自 1998 年提出恢复传统光油工艺的倡议,经过不断的试验,总结出影响光油施工质量的技术关键,并逐步推广实施,先后在端门、颐和园、北海、天坛等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中予以使用,获得了成功经验及文物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一致认可,逐步扭转了文物保护施工中的不良倾向,使工程质量得以进一步控制及提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国家、政府对文物保护投资的加大,使多年来受资金困扰的文物建筑市场得以激活,引得众多日益萎缩的施工企业纷纷招兵买马参与竞争,濒临倒闭的传统材料供销、生产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材料投放市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但是在这一良好局面到来的同时,古建行业多年来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施工、材料等方面管理落后及不健全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严重地影响及阻碍着文物建筑修缮工程质量的保证与提高。其中传统材料的产品质量已成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木 材

众所周知,我国的古建筑多为木结构承重体系,木材的质量及选用将直接影响着建筑结构的安全。由于文物建筑长年受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因此在修缮施工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木构件进行更换、修补及添配。这就要求所用木材的种类、材质、受力及变形性能必须满足建筑结构安全及文物保护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的匮乏及大量砍伐造成的恶果,致使许多树种不断减少以至绝迹,很难保证古建修缮中对原材料的要求。因此现行施工中多采用一些近似的替代材料,而就这些替代材料而言,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木材供销渠道中国有企业相继倒闭,个人及私有企业垄断着市场,不能预先投入资金对木材进行储备及处理,往往是市场有什么就用什么,选择余地及可比性很小,且价格居高不下,优劣难辨,材质根本达不到国家等级木材标准,节疤、虫蛀较多,含水率大大超标,无法满足结构对木材的受力及变形要求。

二、砖瓦产品

目前我国古建砖瓦产品的生产基本沿用传统的烧结工艺,从制坯、阴干、入窑烧制

大多以手工作业为主,虽然近年来使用了一些辅助机具,也远未能改变落后、陈旧的生产模式,反而出现了一些所谓“机砖”、“机瓦”等变异的畸形产品。由于这一生产行业所占市场份额小加之文物的局限性,因此古建砖瓦(琉璃制品除外)至今仍没有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这体现在砖瓦的规格尺寸不统一,强度、密实度、吸水率等各项力学及物理指标无明确规范,再由于生产企业现多为私人所有以及管理、监管工作的空缺,使得这一行业长时间是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存在,在没有市场及规范的约束下,造成土质选取的随意性大,含碱量高且未经熟化;加工工艺流程控制不严格,生产精度不够,方法简陋;烧制不均匀,对温度及成品出窑的判断过多依赖于生产者的经验,产生的结果是同一类砖、瓦产品对于不同厂家规格、颜色不一致,强度、密实度相差极大且变形严重,即便是同一厂家同一窑的产品也不能作到质量上的统一。这样的产品使用于文物建筑之中,不仅损害着工程的质量,同时也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石 料

古建筑所用石料均为天然石材,受产石地区的限制,生产厂家过于集中,造成了大量不合理的过量开采。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原料资源不断减少且无法再生,使得生产加工企业以假为真、以次充好,又因为石作工程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较强,使得非专业人员对石材的种类、性能等知识了解不够,在工程上只是对石材颜色等一些表面性质进行要求,致使古建修缮中所用石料出现风化严重,强度、质地较差,甚至有以外观不易区分的低档石材代替高档石材现象的发生。

四、油饰彩画材料

油饰彩画在古建筑中,可以形象地比喻

为建筑的外衣。它既起着保护木结构的功能作用,同时又具有满足建筑外观等审美方面的要求。因此可以说是古建筑中最易为人们注意的部分。在古建筑施工发展过程中,油饰彩画所用材料变化较少,最能体现传统的特点,从血料、砖灰、桐油,到灰油、油满、光油等材料的生产加工均是秉承了过去传统的工艺及要求,以手工小作坊式的生产来完成的。而正是这一特性,制约了油画材料加工、生产及调配质量的提高,无法达到科学、系统、正规化的要求。首先从血料、桐油、铜(金)箔等组成单一的材料来看,血料由于其主要来源猪血受生猪饲养及饲料结构的改变,粘度及品质急剧下降;桐油受产地、生产工艺及流通环节中掺假行为的影响,出现了蜡质含量高、杂质多、等级降低等问题;而铜箔乃至赤金箔亦相继出现易氧化变色,不耐久等问题。其次从砖灰、灰油、油满等需要加工合成的材料来看,砖灰普遍存在粒径偏小,加工成品的各类砖灰不符合目数及配比要求;灰油熬制不按原料配比,并以半成品油代替成品使用;油满调制不按固定配比,油水比例明显不足。这些材料质量的问题反映在油画工程中,则使地仗强度不够,出现开裂、脱落;油饰暴皮;贴金部位光泽变暗,使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及控制。

面临以上诸多问题,为了更加科学地保护好文物建筑,使文物建筑修缮这一传统行业继续得以生存、发展,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事这一行业的有关人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传统材料在文物建筑修缮当中的使用问题,制定规范、标准,优化市场供销环节,统一产品规格,完善及改进生产、加工工艺,规范企业行为,加大检测、试验手段及力度,强化质量管理及监督,同时提高人员素质及专业知识水平,从而使文物建筑的修缮质量得以提高,真正体现出当今社会对文物保护修缮的特点及水平。

(作者为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文物工程监督站工程师)

北京市文物局2001年四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10月9日 纪晓岚故居修缮工程开工仪式举行。这是市政府文物建筑抢险修缮工程2001年项目之一。

10月10日 梅宁华局长就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及德陵修缮之事去昌平现场调研。

10月11日 西城区克勤郡王府修缮工程举行招投标开标会,北京市长城建筑工程总公司中标。

10月16日 新华社礼堂(原民国国会议场)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同日,市文物局组织协调公安、工商部门共同对华艺古典家具公司、通云阁、慎德阁3家文物经营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暂扣封存监管物品130余件。

10月20日 首都博物馆与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合作举办《旧京影像——持久的幻影?》摄影展在北京孔庙开展,展出了81幅拍摄于20世纪初的老北京照片,其中还包括50幅黑白立体照片。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阿尔贝·肯恩博物馆馆长苞索蕾女士、孔繁峙副局长等3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10月23日 大兴区团河行宫翠润轩景区修缮工程举行议标。万兴古建公司中标。

10月25日 石景山慈善寺修缮工程举行招投标会。北京市大龙建设集团古建工程公司中标。同日,梅宁华局长、孔繁峙副局长就关岳庙修缮事宜进行调研。

10月30日 中国电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是一座通信专题博物馆,是全国电信文物的主要收藏、宣传、研究机构,是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座集文物陈列、科技演示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全面展示我国通信历史文化和电信领域最新发展成果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同日,石景山承恩寺修缮工程招投标举行开标会,北京市中兴文物建筑设计工程公司中标。市文物局派人参加市政府阎仲秋秘书长主持召开的天坛神乐署住户搬迁工作协调会。

10月31日至11月28日 北京市文物局系统16家博物馆参加了北京市第五批首都创建文明行业规范化服务达标的考评

工作。行业达标考评组采取听汇报、听讲解、召开座谈会、暗访、发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了实地考评,认为各单位的共同特点是领导重视、态度认真、制度健全,职工教育工作落实到位;博物馆内的环境卫生、绿化、展陈及硬件服务设施等参观条件有一定改善;博物馆观众服务接待意识有普遍提高;对观众和考评组提出的工作改进意见能及时采纳;博物馆的精神面貌和服务质量有明显改善,已达到了规范化服务达标的要求。这为在全市其他博物馆更广泛地推行文明行业规范化服务达标奠定了基础。

11月2日 丰台区宛平城南城墙及角楼修复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11月6日 大兴区无碍禅师塔议标会召开,万兴古建公司中标。

11月7日 孔繁峙副局长去市规划委参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会议。

11月10日 经北京市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实地考察和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办公会审核,我市正式批准陆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北京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金台艺术馆三家民办博物馆和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的注册资格。至此,我市注册博物馆已达118座,其中民办博物馆8座。

11月14日 市文物局召开远郊区县文物执法工作会。

11月15日 《清华工美杯首届北京地区博物馆参观纪念品设计制作大奖赛》召开,这是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服务内容,提高北京地区博物馆参观纪念品的设计水平,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北京旅游局、清华工美集团等单位共同举办的,12月份主办单位聘请设计专家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3场辅导讲座。同日,市文物局召开北京市文物局国家安全小组会议。

11月16日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圆明园含经堂遗址。同日,西城区涛贝勒府修缮工程招投标开标,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中标。

11月21日 通州区通运桥修缮工程议标会召开,恭王府古建园林建设公司中

标。同日,市文物局对历代帝王庙二期修缮工程方案进行审批。

11月25日 经文化部批准,《旧京影像——持久的幻影?》展览移至新东安市场“老北京一条街”继续展出至2002年3月31日。

11月27日 应香港康乐文化署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邀请,首都博物馆与辽宁、内蒙古等省博物馆合作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长城文化展》,展览是了解中华文化、了解长城文化的极好课堂,舒小峰副局长出席了开幕式。

11月28日 石景山区承恩寺修缮工程进行开工交底。

11月29日 市文物局参加宣武区召开的法源寺二期危改方案涉及粤东新馆文物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李准、罗哲文、谢辰生、王世仁等专家出席了论证会。同日,房山区郊劳台修缮工程开工仪式举行。同日,市文物局组织协调公安、工商部门共同开展对和合行、华生天桥市场、可乐马等8家文物经营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暂扣封存监管物品100余件套。

11月30日 市文物局召开城八区文物执法工作会。

10~11月 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完成对万隆、中国书店、中鸿信、荣宝、翰海公司的秋季拍卖会文物拍品的鉴定工作,共审鉴拍品3000余件。

12月4日 市政府副秘书长戴卫主持召开先农坛坛墙维修协调会。

12月5日 3.3亿专项经费管理办公室召开会议,对2001年的文物建筑抢险修缮项目进行总结。

12月5日至7日 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在昌平区南口召开“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教工作研讨会”。此次大会的议题为博物馆社教部门工作职责和博物馆讲解员分级标准。故宫、革博、历博、军博、鲁博、科技馆、毛主席纪念堂、中国航空馆、北京自然

博物馆等 24 家博物馆的 30 余位馆领导及社教部主任参加了此次会议。市委宣传部宋贵伦副部长、市委宣传部宣传处沈强处长、北京文物局副局长舒小峰、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长马希桂到会并讲话。

12 月 10 日 北京市文物局系统 16 家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含白塔寺),对持有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的《老龄证》来馆参观的观众,统一执行免首道门票入馆的政策(举办特殊活动期间除外)。这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结合文物系统行业达标工作考评组的意见,经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决定的。

12 月 11 日 国家文物局等四部委文物市场联合检查组检查我市的文物市场,共检查了报国寺、古玩城和红桥 3 家文物市场。同日,法源寺邀标开标会召开,市房修二公司中标。

12 月 14 日 市文物局向政府上报《“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

12 月 18 日 刘敬民副市长主持召开东便门城墙搬迁腾退动员会。同日,由市文物局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中国民族服饰展》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开幕。展期 3 个月。

12 月 18 日到 20 日 北京市规划委召开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审查会,市文物局派人参加会议,并就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北京传统文化的发扬作了发言。

12 月 20 日 “2001 年北京文物工作新闻记者答谢酒会”在市文物局会议厅举行,参加酒会的有市外宣办副主任王惠、市委宣传部新闻处胡春净,以及我局各业务处室的处长等。同日,西黄寺东西配殿修缮工程开工充分交底。

12 月 22 日 根据市政府建设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指示,东便门明城墙遗址腾退保护工程全面启动。市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有 10 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到城墙腾退、拆迁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12 月 24 日 历代帝王庙二期修缮工程招投标会举行,怀柔建筑集团总公司中

标。

12 月 25 日 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正式开工。此项工程是经国家计委报请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北京市重点项目,建筑工程投资预算为 7.8 亿元,建筑施工方案为中法联合设计。建成后的首博将具有造型别致、新颖大方、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特点,将成为北京市投资规模最大的文化公益设施,也是新世纪北京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龙新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工仪式。20 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到场。同日,香山勤政殿复建工程专家认证会召开,罗哲文、杜仙洲、赵崇昌、王仲杰、耿刘同等专家出席了会议。

12 月 26 日 昌平都龙王庙抢险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12 月 27 日 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协调会召开。同日,大觉寺抢险修缮工程招投标会开标,北京文物古建工程公司中标。

12 月 28 日 位于东方广场东方新天地第一街地下三层的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隆重开馆。1996 年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的施工中发现了远古人类活动的遗物和遗迹,经鉴定,该地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文化遗存,距今 2.4 ~ 2.5 万年,这是在北京地区继周口店之后远古人类的遗存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首次在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发现如此久远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12 月 29 日 2002 年度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用年票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

12 月 30 日 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论证会召开。

12 月 市文物局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历时两个月初步完成了《“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工作汇报片的拍摄和制作,并制作了与之相应的 POWER POINT 幻灯片。

市文物局召开北京市文物监管旧货市

场 2001 年度年终总结工作会,北京市 10 家文物监管市场的领导和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孔繁峙副局长出席并讲话,会议由傅公钺处长主持。

四季度 为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关于整顿和规范文物市场秩序的通知》精神,市文物局先后组织召开全市范围内的文物监管市场、国营文物经营单位、拍卖企业经营单位的工作会议,坚决学习贯彻国家的指示,并分阶段地对合法经营单位进行规范市场经营行为的指导和督促工作。

市文物局对局属各单位的安全保卫规范化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共进行日常检查 30 余次,夜间清查(含节假日检查)65 人次。完成国保单位巡视检查 15

家,抽查市保 9 家。完成元旦放假前的重点安全清查工作。完成对我市 19 处地下埋藏区的巡视检查。检查中共发现各类隐患 20 余处。共查处违法违章案件 9 起,张义祠违章修缮、七王坟违章建设、北大违章修缮、西黄寺违章修缮、日本公使馆旧址违章修缮等。现有 1 起案件已经结案,罚款 4000 元。1 起案件现已移交区县文物管理部门处理。其他案件正在处理中。共接到举报电话 10 余次。

市文物局完成了《关于整顿和规范文物市场秩序的通告》的起草工作,联合工商、公安、海关在全市范围的文物场所发放和张贴。

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 2001 年四季度参观人数表

2001 年第四季度	成人含外宾	学生	总数	其中外宾约	其中购票入馆者(含通票)
徐悲鸿纪念馆	2000	4000		400	1500
首都博物馆	46320	6695		11946	33412
大觉寺	23880	2473		34	22993
正阳门					
智化寺					
辽金馆					
西周馆	2776	1499		19	1800
艺博	31228	1249		17174	20289
团城演武厅	2000				1142
大葆台					
大钟寺	19001	1726		7755	17843
古建馆	15000	711		6581	6377
白塔寺	25000	400			
老舍纪念馆					
德胜门	1800	200		40	630
石刻馆	全年闭馆				
总计	169005	18953		43949	105986

(本表由局博物馆处提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2002. 1/张展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5

ISBN 7-5402-1463-5

I. 北… II. 张… III. ①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 C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312 号

北京文博(2002 * 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延庆明代摩崖造像重现天日



摩崖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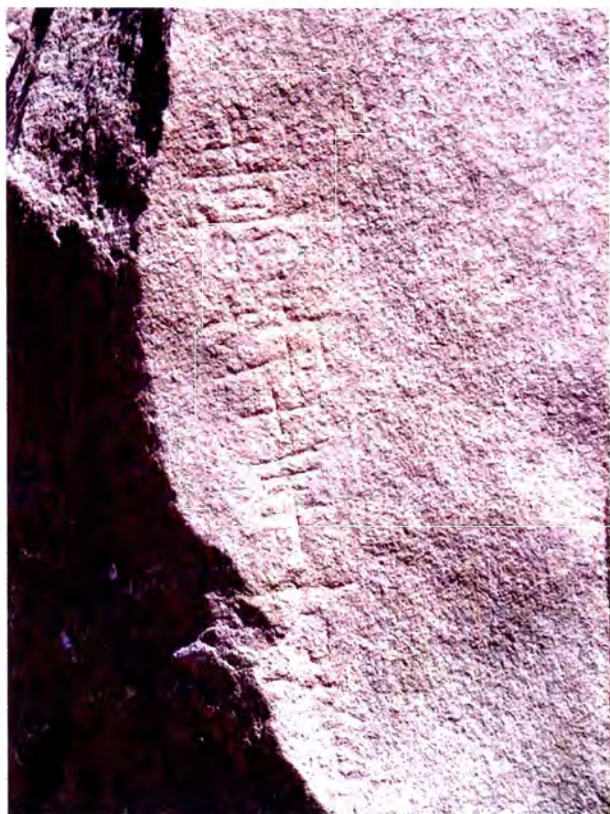


摩崖造像远景

2001年7月，延庆水利局佛峪口水库管理处施工过程中，发现明代摩崖造像一处。

该造像位于佛峪口水库大坝南40米处的一块花岗岩巨石上。石高5.4米，宽7米，南侧呈一平面，上刻三尊造像，佛峪口一带历史上曾多次暴发山洪，为害地方。百姓为了祈求平安，兴修寺院，造佛镇洪，佛峪口也因此而得名。

(文：刘满利，图：范学新)



刻于造像石上的明嘉靖十年款



ISBN 7-5402-1463-5



9 787540 214630 >

定价: 10.00 元

